

星火

本期
导读

P09 丁咚:韩寒的革命观与中国的前途

P57 阳月:年初,我们一起看台湾选举

P68 于淼:与帕共舞,用灵魂在呐喊

P86 杨银波:王佩英之警示

P95 袁本初:他救赎了自己,背井离乡

P99 关尔:其实,苦逼的我们都要像小强一样活着

2012年2月 第2期 总第3期

李妍:春运如何打通乡愁的出路

魏英杰:网络购票,想说爱你不容易

何清涟:民主政治离中国有多远

李悔之:“告别”韩寒,人人皆成为韩寒



星火编委会

张翔/文

不知何时起，“自由”先是被加上了一个“主义”的后缀。在中国特色的语境下，被主义化的“自由”又继续被阉割扭曲，直接成了散漫、为所欲为的代名词；自由不堪重负，被加之其上的各种包袱弄得面目全非。因此造就了那个传世名篇《反对自由主义》和80年代那场轰轰烈烈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

自由这个存在—前伦理意义的与人生在世耦合着的处于本源处的缘构发生，却首先被形而上学化了，自由沦落成概念甚至是教条。要复归自由的真意，重唤其隐蔽亦是开敞处伟大的光辉，就要不断地剥掉其上各种“包袱”，先是去中国特色语境，再去西方形而上学语境，直退到自由缘构发生的源头，听自由在幽暗的本源处寂静的轰鸣，听其自由地道说着自身。

要做到这后一步，恰恰需要积聚起足够的自由力量，如东方的老庄，西方的海德格尔那般，只有这足够的自由的力量才能冲破各种“意识形态”的藩篱，才能与真正的自由等深的对应。当今中国思想界又有几人可以做到？我们还差得远着呢！不过我们至少可以去掉中国特色语境下的自由之迷思。《星火》也想做这个层次上的努力。

说到这，或许不少人觉得自由过于玄思，是有闲阶层的专利，是奢侈品。在“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中国，在物质—资本的威力刚性显现的当下，有个声音必然会说“自由”能当饭吃吗？这样的想法应该不在少数，好的，就让我们看一看在当下“自由”的意义。

第一，中国的经济发展首先仰赖于自由积聚的力量——市场经济。没有改革开放，没有自由市场、自由贸易的因素就不会有今天中国经济的发展。当然不代表说市场经济就必然是发展经济的唯一路径，这个需要各种研究的继续推进。但是就目前中国经济的事实看，对中国经济贡献最大的因素无疑是在经济中引入了自由因素。

第二，再看看当今中国存在的某些问题，尤其是政治领域的问题，专制、法治不彰、公正公平缺失等等，这些问题其实说到根子上也与“自由”有很重大的关系。一个好的或者说正义的体制，一方面是保障每个公民免于不法侵犯的自由（消极自由），一方面也是保障每个人的正当权利得到合法行使的自由（积极自由）；公权力则是众多个人权利委托或者同意提供公共服务的自由。因此这每一种自由都是有边界和定义域的，这也是法治的意义。这是公平公正的前提，是经济可持续发展，良性发展的前提。在这个意义上，自由换个说法就是权利，群己权界中的“群域民主，己域自由”就是这种状况的经典说法，每一方的自由都不能任意损害其他方的自由，属于己域的事就不能用民主原则干涉，属于公共的事就不能谁想怎么干就怎么干。

仅考察至此，在这个各种侵权，各种侮辱大行其道的当下，自由与大家尤其息息相关。

自由与法治也从来都是一体两面，没有自由的法治（法制）是法家的术权，没有法治的自由是文革式的全民恐怖。

那种试图严重歪曲自由的意义而达到淋漓尽致批判的做法应该收手了。自由是对自己的尊重，也是对他人的尊重；自由是权利与义务的平衡，自由是创造力的源泉是好生活的保障；自由需要良善，需要包容，需要不同的声音。

《星火》希望努力积聚起自由的力量，吸纳各方声音，以期唤醒和重树中国青年对人性的信心，对社会的希望，为青年投身社会建设提供原始动力。

《星火》欢迎各种观点，各种批评，大家的支持是《星火》得以延续的动力。《星火》所努力要做的就是提供一个平台，积聚自由的力量。






2012年 第2期 总第3期

星火简介

1、《星火》是由一群青年人志愿创办的，提倡思想自由、兼容并蓄、理性关注、人文情怀的一份电子期刊。

2、《星火》是独立、非营利的，提倡原创，尊重版权，遵循“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的“CC版权声明”，本刊转载文章，除特别声明外，均已取得原作者授权，另有少量的图片和文章取源于网络，若涉及到版权纠纷，请相关责任人及时与本刊联系，我们将会尽快做出处理。

3、《星火》所刊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并非杂志立场，旨在为大家提供一个思想交流的平台，仅供内部学习交流使用，严禁用于任何商业用途。

4、《星火》初步定位为月刊，每月10日左右发布，但在初创时期，可能发布时间会有延迟，在此向大家表示歉意。关于杂志的最新消息，请关注相关的QQ群、微博及人人主页。

5、《星火》是一个开放的团队，杂志实行编委轮流负责制。我们提倡轻松、愉悦、志愿的工作方式，真诚欢迎各地各界朋友加入。同时，《星火》杂志面向社会长期征稿，欢迎大家踊跃供稿。

星火新浪微博：星火杂志

读者交流QQ群：185334613

投稿邮箱：xinghuo54@126.com

友情合作媒体

《书人》杂志、电影一周酣

目录 CONTENTS

卷首语

积聚自由的力量

01 星火新闻眼

- 01 论点争锋 2012新年致辞
- 03 每月要闻 汕头海门事件、蔡英文辞职等

05 语录广场

07 星火聚焦

- 08 韩寒：谈革命、说民主、要自由
- 09 韩寒的革命观与中国的前途 丁咚/文
- 12 革命需要啄木鸟 笑蜀/文
- 15 中国的革命恐惧 薛涌/文
- 18 谁说韩寒不读书 杨早/文
- 21 也谈革命 叶匡政/文
- 23 韩寒要的是自由还是枷锁？ 李钟琴/文
- 24 “告别”韩寒，人人皆成为韩寒 李梅之/文
- 26 民主政治离中国有多远？ 何清涟/文
- 29 期待全民素质的质变 不过又是一种新的“专制” 顾晓/文
- 31 对宪政民主的一点思考 张翔/文

36 社会观察

- 36 票价与房价
- 37 一位民工致铁道部的一封信 黄庆红/文
- 38 农民工岂能被剥夺购票机会 锡太子/文
- 39 网络购票，想说爱你不容易 魏英杰/文
- 40 火车票实名制实施后的五大弊端 王潘生/文
- 42 实名制让我更怀念“黄牛党” 何华/文
- 43 春运如何打通乡愁的出路 李妍/文
- 45 中国地产的末日传说 杜君立/文

57 星火评论

- 57 年初，我们一起看台湾选举 阳月/文
- 58 实名制崇拜下就应该官员财产透明 华阳杨/文
- 59 学术研究需要谨防被政党利用 马庆云/文
- 61 贫困女生卖血记，6百元换来半年刑期 贾也/文
- 64 年年高喊“取消农民工称谓”价值几何 雒送/文
- 65 实名制滥用比避孕药滥用更可怕 朱四倍/文



目录 CONTENTS

参与本期杂志工作的人员

编委	刘卫华	张翔	金笛
	吴昊天	赵觉成	徐存栋
	耿柯嘉	郭颖莉	张斌
	田源	于森	倪婷
	张斌	倪君	顾骁
版编	潘莎莎	赵觉成	江屏宣
	吴晟强	刘亚东	伍碧波
	李欣阳	李潇	倪婷
	萧墨	李鲲	郭峰
美工	郭颖莉	徐存栋	董宇轩
	贾天雨	余小舟	刘卫华
	韩雨馨	邱刚	杨正
宣传	吴昊天	胡正华	王申
	李淑贞	张娇娇	萧墨
	张小五	王召峰	徐振
校对	江屏宣	丽贝卡	小熙
	贺成名	李欣阳	罗钊
	胡钰雪	熊磊	陈荣
	云御风	于森	大佑
	王海云	吕凌	王虎

纳新启示

我们的团队，对着这个国家有着最为深沉浓厚的感情，一直持之以恒地在寻找着同样拥有如此豪情的朋友。对于一个停滞于世界大流中伫立凝望的时代，或许并不紧缺几十年如一日锤炼出的技能，也不急需日复一日缜密策划出的蓝图，这个时代，渴望的是一颗永不熄灭的火种，迫切而耐心地等待着。心中同样奔流着热血，胸中同样酝酿着豪气的你，相信属于我们的团队。现在就参与到我们之中来，或者让最自由的灵魂在荡气回肠的文章中显现，我们答应你，只要仍然屹立，我们绝不会辜负一颗呐喊着的心。

今日，星星之火，明天，火凤

67 星火公益

67 张伟：与帕共舞	赵觉成/文
68 与帕共舞，用灵魂在呐喊	于森/文
69 “与帕共舞”：龙城的“保尔”	寒鸦戏水/文
70 点滴爱心 浇灌希望	蔡一品/文
72 生命的力量	季梦凡/文
73 我们一起 与帕共舞	倪君/文
75 《与帕共舞》序言	张伟/文
76 给湘乡市市长的一封信	张伟/文
77 张伟公益救助基金募捐倡议	星火杂志/文
77 祝福寄语	

79 散文随笔

79 相见不如相望	醉仙望月/文
82 城市的夜归人	刘洋/文
84 人的理由	张志华/文

86 人物

86 王佩英之警示	杨银波/文
-----------	-------

91 诗歌

91 海鸥之歌	林昭/文
94 诗词五首	

95 读书

95 他救赎了自己，背井离乡	袁本初/文
96 评《社会契约论》民主还是暴政？	King Blade/文

99 影评

99 其实，苦逼的我们都要像小强一样活着	关尔/文
101 建党伟业一触即破的漂亮气球	酣高楼/文
102 走着瞧：王小波精神维度里的电影挣扎	马庆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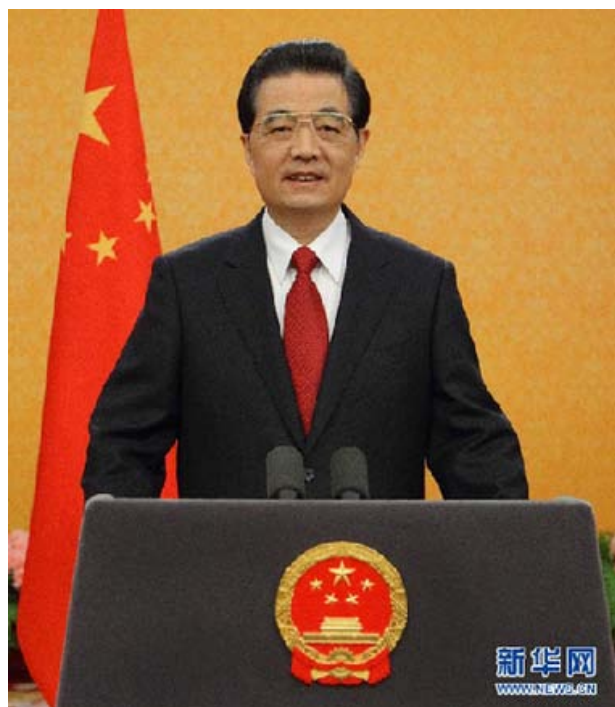
104 影像

106 星词榜

108 微小说

110 众言堂

2012 新年致辞



共同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

2012年的新年钟声即将敲响。在这辞旧迎新的美好时刻，我很高兴通过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向全国各族人民，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向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向世界各国的朋友们，致以新年的祝福！

2011年是中国“十二五”时期开局之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中国人民同心协力、锐意进取，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取得新进展。中国加强同各国的交流合作，积极参与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完善全球经济治理、解决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等国际合作，为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作出了新的贡献。

在新的一年里，我们将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管理通胀预期的关系，加快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着力保障和改善

为下个世代点亮蜡烛

今天是民国101年的第一天，两个多小时前，中华民国第二个一百年的第一道曙光照射在玉山主峰。百年交会这几天，英九的心境非常清澈，自己像是站在一个历史的分水岭上，过去一百年，历程清晰在目；未来一百年，理路明确可循。

回首后望，我看见先人筚路蓝缕，以血泪缔造今日的中华民国；引颈前瞻，我想像一百年后的国人，也将检验着我们这一代，我们替国家创造了什么、引领了什么、解决了什么、留下了什么？

今日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将决定未来的历史。

身为中华民国总统，深感责任重大；当一百年后的国人回顾我们这一代，会不会像我们想起林献堂、蒋渭水、胡适、孙运璿、李国鼎等人一样，发自内心由衷地说：「台湾有你们，真好」。

我们这一代人，要让下一代记住什么呢？

在此，我想引用严长寿先生写的《教育应该不一样》书中的一段话：「教育不是装满一壶水，而是点亮每个孩子心中的蜡烛，让他发光、发亮」；领导一个国家亦复如此。一个民主国家总统的挑战，不只是如何去实现自己的理想，更是如何能丰富人民的选项，如何点燃下个世代人民心中的蜡烛，让他们发光、发亮。

我们要点燃下个世代人民心中文明的蜡烛，就像百年来赖和、杨逵、锺理和、邓雨贤、吕泉生、钱穆、林怀民、侯孝贤等人，燃起台湾人民心中美丽的文明



民生，努力巩固经济社会发展良好势头。我们将坚持“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同广大香港同胞、澳门同胞携手努力，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我们将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继续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维护中华民族根本利益，增进两岸同胞共同利益。

和平、发展、合作是时代的呼唤，是各国人民共同利益之所在。当前，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各国相互依存日益加深，但世界经济复苏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上升，国际和地区热点此起彼伏，世界和平与发展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中国将继续恪守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同各国的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积极参与应对全球性问题的国际合作。

我相信，只要各国人民戮力同心、同舟共济，我们一定能够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困难和风险，在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征程上不断迈出新的步伐。

最后，我从北京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幸福安康！



1月2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2012年春节团拜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同首都各界人士亲切交谈，祝贺新春。（新华社发 鞠鹏/摄）

之火。锺理和记录在这片土地上踏实生活的勇者；林怀民的《薪传》让噙着中美断交眼泪的人们，重拾唐山过台湾的勇气。

我们也要点燃下个世代人民心中慈悲的蜡烛，一如一百年来北台湾的圣严法师、东台湾的证严法师、南台湾的星云法师、兰大弼传教士、单国玺枢机主教、急公好义的身障英雄罗重盛、捐出毕生积蓄的荣民伯伯胡寿宏，以及法鼓山、中台禅寺、一贯道与天主教、基督教等教会团体在救灾与济贫的长期贡献。他们的点点滴滴，唤起了台湾人民心中不灭的慈悲心。

在民国一百年的最后三年，中华民国跟全球都遭遇了上世纪大萧条以来最大的金融海啸。下一个百年的初始，我们也得在欧债危机的威胁下颠簸上路。英九不愿粉饰太平，而选择诚实面对人民，民国101年将是关键的一年，我们必须加倍努力。

从三年多前英九就任总统以来，念兹在兹的都是国家建设，都是社会公义；所思所愿的莫非安和乐利，莫非土地人民。三年多来的执政团队，有些事也许做得不够好、不够快。

为了点亮下世代人民心中的蜡烛，不够好的，我们要更加努力；不够快的，我们将加速脚步。过去一百年，先人为中华民国奠定坚实的民主基础；展望未来，我们能不能为下个世代，奠定和平、繁荣、和谐、进步的基础呢？

下个一百年的台湾人民，有权利期待一个和平而非战乱的年代，一个繁荣而非萧条的年代，一个和谐而非对立的年代，一个进步而非倒退的年代。我们该努力的，就是要实践他们的期待，让他们在下个民国一百年里，也能以我们今日同样的心情，欢喜感怀。

站在百年与百年的分水岭上，我深深体认到一己的微小、短暂，只愿更谦卑地面对下个一百年。在历史的长河里，每个人、每一代都是沧海一粟，都是感念的后辈，都是谦虚的学生。

我们要让一百年来中华民国自由、民主、正义、文明、慈悲的烛火，持续在下一代心中发光、发亮。我们有信心，将来，下一代提及亚洲崛起、中国大陆崛起的惊叹，也必然感受台湾崛起、中华民国崛起的光荣。再一百年后，当那时的国人回想起我们，如果能说一句「曾经有你们，真好」，那该有多好！

在民国101年元旦，我想与全国人民一齐许愿，让我们共同努力，为中华民国下一世代点亮蜡烛。

祝大家新年快乐，谢谢大家！

（有删节，[点击阅读原文](#)）

■BRIEFING/每月要闻

《财经网》 2012 年 01 月 16 日

广东省乌坎村党总支部成立

林祖恋任党总支部书记



1月15日，乌坎村党员大会召开，宣布村党总支部正式成立，村委会重新选举筹备小组也同时宣布成立，林祖恋被任命为乌坎村党总支部书记及村委会重新选举筹备小组组长。

广东省乌坎村工作组村委换届选举问题小组组长王叶敏表示，希望广大村民在村党总支的组织、主持下，选举出公道正派、能真正代表群众利益的村委会，以配合省工作组落实相关问题的解决方案，带领乌坎村民共谋发展。

他表示，对村民普遍关心的土地问题，已查实部分未办理土地审批手续、涉嫌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的问题。对有关部门和单位截留或挪用乌坎村项目建设资金的问题，已对有关责任人进行立案调查和处理。

凤凰卫视 2012 年 01 月 16 日

蔡英文批准辞呈

将留任党主席至 2 月底



台湾 2012 大选落幕，现任领导人马英九连任成功，蔡英文也在

败选当天宣布辞去民进党主席一职以示负责，民进党十六号召开内部会议检讨败选原因，同时讨论人事问题，而绿营重要干部同时递交连署书全力慰留蔡英文。而经过中常委讨论蔡英文已批准辞呈留任至二月底。

台湾大选胜负底定，民进党主席蔡英文照惯例宣布辞职一肩扛起败选责任，选后第一个上班日民进党召开内部会议，党内重要干部齐聚头，讨论蔡英文的人事案以及代理党主席的人选，但党内出现留住蔡英文的声音。但消息指出，蔡英文留任党主席机会不高，由前行政院长苏贞昌接任呼声最高。

深圳晚报 2012 年 01 月 17 日

汕头市长谈“海门事件”：

少数人用心叵测非抓不可



16日下午，省人大十一届五次会议召开记者会。汕头市长郑人豪回应记者有关“海门事件”问题时表示，海门华电项目还需走科学环保论证程序，还需经过海门群众的公开听证程序。“华电建不建，不由我说了算。”

他透露，在“海门事件”中，部分闹事情节较轻的群众目前已经得以释放。郑认为，事件中有少数人受境外媒体影响，用心叵测，完全与群众的合理诉求相违背，对此，郑人豪语气坚定地强调：“这些人是非抓不可！”

去年 12 月中旬，汕头市海门

镇群众因担心即将动工的华电集团发电厂对环境造成污染，而聚众抗议，部分村民冲进政府大楼打砸破坏，后市委市政府向村民回应“立即暂停华电项目”，事件才得到平息。

中国新闻网 2012 年 1 月 12 日



广东首个民间智库组织揭牌

广东省首个民间智库组织南方民间智库咨询服务中心 12 日在广州正式揭牌，专家称此举是广东管理的又一创新，也是广东推进社会改革的又一次突破。

据介绍，“南方民间智库”自 2009 年开始建立民间交流平台，近年来其以 57 名正式智库成员，上千名活跃参与者为基础力量，在政府官员的引领下，参与策划各种重要活动，为广东转型升级、社会建设、加快建设幸福广东的步伐提供了智力、助力和活力。

广东省民政厅副厅长王长胜表示，“民间智库”作为一个新兴的社会组织，并由民政厅登记管理机构登记成立，这在广东可谓第一次，在中国国内也很少见，它是广东管理的又一创新，也是广东推进社会改革的又一次突破。

南方日报 2012 年 1 月 15 日

缅甸再次释放至少 200 名政治犯

缅甸政府 14 日宣布大赦，释放至少 200 名政治犯。欧盟、英国和美国对缅甸政府的做法表示欢迎。



缅甸政府当天宣布大赦决定，释放 651 名在押人员，含至少 200 名政治犯，名单涉及一些长期遭受指控的政治人士和颇具影响力的民族领袖。这是缅甸政府 4 个月来第二次大赦。去年 10 月 12 日，大约 230 名政治犯获释。

西方媒体解读，这次大赦有助于反对派扩展实力，推动缅甸的政治变革。近几个月来，缅甸政府与反对派多次互释“缓和”信号。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 13 日宣布，美国将与缅甸互派大使。

网易科技报道 2012 年 1 月 21 日
**谷歌等公司抗议迫使国会暂停
网络反盗版法提案**



由于谷歌和维基百科等网站发起全球性的网络抗议，美国参议院和众议院领导人已将好莱坞鼓动的反盗版法案搁置多日。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哈瑞·里德周五取消了定于 1 月 24 日举行的对《保护知识产权法》（PIPA）提案的程序表决。而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拉马尔·史密斯也表示，他的委员会将暂停考虑众议院的《反网络盗版法》（SOPA）提案。

这些反盗版法案要求司法部获得法庭禁令，迫使互联网服务提供商、搜索引擎、支付处理机构和在线广告网络，阻止与盗版

有关的非美国网站的业务或停止与之做业务。这些提案将授权私人版权持有人获得法庭禁令，迫使支付系统和广告公司切断与这些网站的联系。

中国新闻网 2012 年 01 月 26 日
苏格兰首席部长公布独立公投具体计划



苏格兰地方政府首席部长萨蒙德 25 日公布了有关苏格兰独立的公民投票具体计划，列出了他将在苏格兰独立公投中所提的问题。

苏格兰国家党的领导人说，苏格兰人在独立公投中面对的问题是：“您是否同意苏格兰应该成为一个独立国家？”。他希望公民投票能够在 2014 年举行。苏格兰独立公投将受到选举委员会的监管。

英国政府反对苏格兰独立，但由于支持独立的苏格兰民族党在去年苏格兰议会选举中获得多数选票成为执政党，英国政府表示“不会阻止对独立一事进行公民投票”。

环球时报 2012 年 1 月 5 日
**匈牙利上万民众示威抗议新宪法
要求总理下台**



为庆祝正式实行新宪法，匈牙利政府 2 日举行庆祝仪式，当晚

又在国家歌剧院举行晚会。而在歌剧院外聚集了上万的人群，他们举行了反对新宪法的示威活动，抗议持续了将近 5 个小时，抗议者要求总理欧尔班·维克多辞职。

对于新宪法，反对者认为，新宪法过分强调基督教价值和国家利益，破坏了匈牙利的宗教自由、忽视了个人权利，并对非基督教信仰者、单亲家庭、未婚同居者、同性恋者等社会少数人群存在不公平对待；新宪法加强了对媒体的控制、对独立于政府之外的宪法法院和中央银行的权力进行限制，扩大了政府权力，威胁到匈牙利的民主制度。

美国之音 2012 年 1 月 14 日
突尼斯民众庆祝推翻本·阿里一周年



突尼斯民众星期六庆祝赶走长期在位的前总统本·阿里一周年。突尼斯人的起义掀起了阿拉伯世界各地的革命。数千人在首都突尼斯通过和平游行的方式庆祝起义周年，人们挥舞着突尼斯国旗，高呼推翻本·阿里的独裁统治之后获得自由。集会的主要地点是布尔吉巴大道，这里是突尼斯起义时示威者聚集的地点。

本·阿里在起义近一个月之后，于 2011 年 1 月 14 日逃离突尼斯。他目前流亡在叙利亚。

当日，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赞扬突尼斯人民自革命开始之后所取得的进步。他承诺联合国将继续支持突尼斯民众。

（以上内容均摘自互联网）

■QUOTES/语录广场

语录广场

【国家与朝廷】今夫国家者，全国人之公产也。朝廷者，一姓之私业也。国家之运祚甚长，而一姓之兴替甚短。国家之面积甚大，而一姓之位置甚微。

——（梁启超）

【反对不等于背叛】政府、党、国家、民族这四者是不能打通的，我反对某一届政府，并不一定反对某一个政党，我反对某一个政党，并不意味着我反对这个国家，我就是反对这个国家，也不意味着我出卖本民族的利益，我没有叛国。

——（陈独秀）

【民族主义是掺了地沟油的老汤】民族主义如果与宪政民主结合，置于宪政民主之下，就是一种口味纯正的老汤，挥放出浓香。民族主义如果与权力结合，置于宪政民主之上，民族主义就如同放了地沟油一样，味变了质，害人，使人得精神之癌。

——（木然）

【国有资产流失的尺蠖效应】在不受制约的权力之下，一会儿“左”，一会儿“右”，同样依托专制强权，先以“左”的名义抢劫，再以“右”的名义分赃，以“社会主义”之名化平民之私为“公”，以“市场经济”之名化“公”为权贵之私。

——（秦晖）

【权利要由自己去争取】别人都是靠不住的，靠得住的，唯有你自己。转型是每个人的自我救赎，像韩寒那样，从自己开始争取公民权利吧。你自己不争取，这世上没谁会为你争取。而如果每个人都开始争取自己的公民权利，即争取自己为自己做主的权利，革命自在其中，民主也自在其中。

——（笑蜀）

【是时候督促美国改革开放了】西方国家一直没有进行和中国一样的改革。1、美国应考虑改革现

美式两党制，这个制度衰老和疲惫已暴露无遗。2、应开放思想和言论领域真正自由。中国推崇“有容乃大”，应成为美国为人处事理论基石。3、美国的金融、经济管理体制更需改革开放。

——（环球时报评论文章）

【简化的汉字】一位台湾朋友说：“汉字简化后，親不见，愛无心，產不生，厰空空，麵无麦，運无车，導无道，兒无首，飛单翼，湧无力，有雲无雨，開閤无门，鄉里无郎，聖不能听也不能说，買成钩刀下有人头，輪成人下有匕首，進不是越来越佳而往井里走，可魔仍是魔。”

——（鲁国平）

【什么是民主】什么是民主，就是你的事你自己作主，我的事我作主，国家的事，我们一起投票来决定。就这么简单。可这么简单为什么人类几千年的历史都无法实现民主。很简单，第一，人类的财富没有那么丰富；第二，资讯不发达，老死不相往来；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人们没有那个意识，也就是没有民主理念，没有被启蒙。现在不同了，地球上除了北朝鲜等少数地方外，每个人都希望为自己的事作主，等到大家都认同了这个理念，就要民主了。

——（杨恒均）

【澳门施行官员财产申报】澳门所有公务员都要申报财产，非常细，车子房子存款，超过一定额都要报，不管境内境外。这要牺牲个人利益，彰显的是你是不是廉洁的人。如果官员认为个人财产是私隐，他唯一的选择就是离职。

——（澳门政府个人资料保护办主任接受南都专访时表示）

【不批评就不要做知识分子】现在中国讲真话的人太少了，太多的知识分子都是犬儒主义，我认为犬儒主义是社会进步的头号敌人，甚至比贪官还可

怕。贪官是加速体制衰落，犬儒则让体制得以残存。

——（许小年）

【吊诡的基尼系数】自从2000年公布中国基尼系数为0.412之后，国家统计局再也没有对这项统计公布过具体数字。专家估计，2010年基尼系数早已突破0.40的国际警戒线，达到0.50的水平。不少学者坦言，中国的收入差距已经堪比某些因贫富不均常年动荡的国家。

——（时代周报）

【给思想一个市场】中国的思想市场是先天不足的。在中国历史上，秦始皇“焚书坑儒”是一次典型的破坏思想市场，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清代的文字狱冤案迭出，都是对思想市场一次又一次的雪上加霜。新中国成立以后，经过“反右”和“文化大革命”，逐渐的，中国大陆只有了一种思想，就是毛泽东思想。一种思想是不会有市场的，而没有市场的思想，不会是好的“战无不胜”的思想。

——（周志兴）

【什么导致贫富差距？】我认为有两项：第一，腐败；第二，垄断。这都和政府权力有关。我们的垄断，不是经济自由竞争的结果，而是行政权力造成的。中石化2009年盈利第一名，原CEO陈同海因受贿被捕，之后查出他每天花公款4万元用于个人享受。按原来的改革计划，不应这样。

——（吴敬琏）

【中国教育的失败源于欺骗】在普世文明国家中，教育是中立的，不给任何党派作广告。我们的大中小学反其道而行，恰恰成了党派的广告牌，还在牌下公然打出政治课的招牌，把欺骗灌给学生洗脑。我上学时就是这套骗人的玩艺儿，现在仍是！欺骗的荒唐啊！

——（冯骥才）

【年度恶人】经网友提名推选，2011年度恶人为：1、临时工。当选理由：什么丧尽天良的事情，都是

他们干的！2、农二代。当选理由：没田没地没“铁饭碗”，双亲没社、医保，子女没机关学校，严重地拖了祖国后腿。

——（网帖）

【不丹国王辛格】“自废”世袭君主制，带领国民走入民主国家行列。不但搞多党制和两院制，还允许国会弹劾自己。面对国民，他说：“我可以努力做个爱民的国王，但我无法保证不丹代代都有好国王，为了不丹人长远的幸福，我们必须推行民主，一个有效的制度比王位更重要，君王一爵矣。”

——（徐昕）

【台湾不能没有反对的声音】我们承认败选，愿意接受台湾人民在这次选举所做的决定。你们真的不要怀忧丧志。台湾不能没有反对的声音，台湾不能没有制衡的力量。未来这四年，虽然我们没有办法以执政者的角色，来实践我们的理想。但是，这并不代表，在野就没有力量。

——（蔡英文败选感言）

【改变，由自己开始】在天鹅绒革命之前，哈维尔已深刻地意识到，改变是从每个人自身开始的，而不是一厢情愿地指望官方的改变。改变并不只是取决于当权者，同样取决于无权者。无权者需要承担责任。每个人能承担的分量是不同的。分担责任，也就是分享未来的希望。

——（傅国涌）

【村长与总统】我当驻华大使几个月来，接触不少中国普通百姓，给我的感觉中国普通百姓根本无法监督官员，官员决策随意性很大，村长的权力有时比美国总统权力还大。我很吃惊。

——（骆家辉）



与韩寒一起 谈革命、说民主、要自由

圣诞节几日，韩寒连发三文，“谈革命、说民主、要自由”，激发了知识界乃至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争论，从多个角度对长年尘封的话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与解读。韩寒是谁也许已经不再重要，不管是赛车手还是作家，不管是玩世不恭的少年还是一位父亲，他都无可否认地改变了这个国家历史的航程。一次也许心照不宣的细微突破，引发的是一场公众广场上的思想运动，锻炼着民主协商寻找共识的能力，碰撞中历练着论战各方的意志。这场“话题作文”中每个参与讨论的作者，包括韩寒，都是这场中国式考试中的胜利者。辛亥百年，知识分子的迷思与追求都在这场真理标准大讨论中百花齐放，讨论的深度广度都令人叹为观止，在共和国历史上共铸了一座思想的丰碑。或许我们多年后回眸时才发现它的轮廓在历史中投下的长影，于是抬头仰望一个平庸时代的不凡，和一个懦弱时代的勇敢。



韩寒：谈革命、说民主、要自由

谈革命

(原文链接)

★ 革命是一个听上去非常爽快激昂并且似乎很立竿见影的词汇，但是革命在中国未必是好的选择。

★ 好的民主必然带来社会进步，更加法制，这势必让大部分并不在乎文化自由的人们觉得有些不自由，就像很多中国人去了欧美发达国家觉得浑身不自在一样。

★ 没有领袖的革命一定是失败的。

★ 民主是一个复杂，艰难而必然的社会历程，并不是什么革命，普选，多党制，推翻XX，这些脱口而出的简单词汇可以轻易达成的。

★ 中国没有一个具体的个人能成为被革命的对象，城市，人口众多，而且各种千奇百怪的灾难都发生过，G点已经麻木，更别提爆点了。

★ 革命不保证就能带来民主。现今中国是世界上最不可能有革命的国家，同时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急需要改革的国家。

★ 这样的国家，也不需要任何的革命了，国民素质和教育水平到了那个份上，一切便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说民主

(原文链接)

★ 相信天鹅绒革命其实就是选择相信了民众的素质，执政者的忍让，文人的领袖，这三者的共力才能形成天鹅绒革命，我认为这三者在中国全部不存在。

★ 改革和民主其实就是一场讨价还价的过程，你不能盼着执政者看了几本书忽然感化把东西全送给你。

★ 民主不是适合不适合的事情，它迟早会到来。国民素质低并不妨碍民主的到来，但决定了它到来以后的质量。

★ 一切能用钱解决的社会矛盾都不算什么矛盾。我不认为在分歧和割裂这么大的国家里能有一场美好的革命。

★ 因为党组织庞大到了一定的程度，它就是人民本身，而人民就是体制本身……改变了人民，就是改变了一切。

★ 民主的质量就是由国民的表面素质决定的。

★ 好的制度以及好的民主有两个到来方式，一种是有一个纪念日，一种是没有一个具体的日子，但要一两代人的努力。

★ 暴力或者非暴力革命只能是督促改良的筹码，但不能也不可能真正的操作起来。

要自由

(原文链接)

★ 作为一个文化人，在新的一年里，我要求更自由的创作。

★ 文化繁荣其实是最省钱的，管制越少必然越繁荣。

★ 如能达成，从我而言，我承诺，在文化环境更自由之后：不清算，向前看，不谈其在执政史上的敏感事件，不谈及或评判高层集团的家族或者相关利益，只对当下社会进行评判和讨论。如果文化界和官方能各让一步，互相遵循一个约定的底线，换取各自更大空间，那便更好。

★ 如果两三年以后，情况一直没有改善，在每一届的作协或者文联全国大会时，我将都亲临现场或门口，进行旁听和抗议。蚍蜉撼树，不足挂齿，力量渺小，仅能如此。

★ 我不会用他人的前途来美化我自己的履历。同样，我相信我们这一代人的品质，所以我相信这些迟早会到来，我只是希望它早些到来。因为我觉得我还能写得更好，我不想等到老，所以请让我赶上。

★ 愿所有的年轻人都能像这个圣诞一样不惧讨论革命，改革和民主，担忧国家的前途，视它为自己的手足。

避免革命的唯一办法，就是适应形势的发展和人民的诉求，主动地及时地彻底地改变自身。不主动改革，将会导致被动的“革命”；不及时改革，也将导致仓促的“革命”；不彻底改革，更将积聚“革命”。

韩寒的革命观与中国的前途

丁咚 / 文

逼近年尾，韩寒写了几篇不是文章的文章，开场篇谓“谈革命”，感觉很操蛋。但就是这么操蛋的文章，引来众议一片，缘何？大概就因为他是广受关注的“公共知识分子”。但从文章本身来看，他离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只差五十米了。一些善良的人们为他辩护，觉得他在“抛砖”，可是他的砖引来的很可能不是“玉”，而是更硬的砖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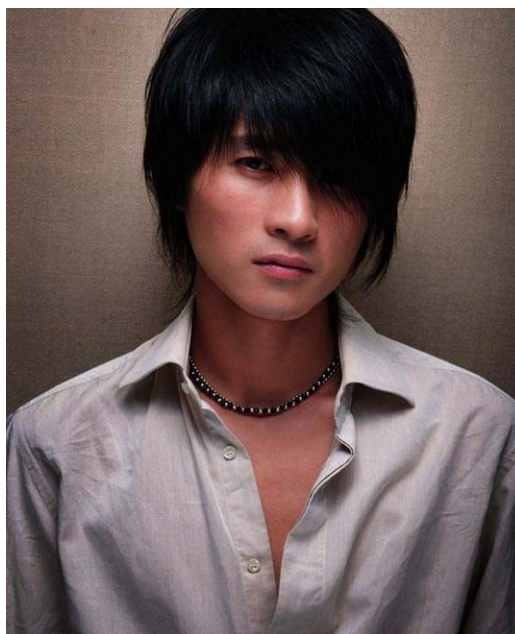
首先，我得肯定，他的观点是有市场，也能引起一些共鸣的，其中一部分观点甚至还很有道理。

比如他说，“革命和民主是两个名词，这两个名词是完全不等同的，革命不保证就能带来民主。”从我们所知道的中国历史上的几次革命实践来看，革命并不一定带来民主，这句话似无不妥。即使是最靠谱的一次民主革命，也是经历了长期动荡和政治妥协后才逐步建立了比较成熟的民主制度的。大家都知道，这里指的是辛亥革命。而革命可能带来的非民主的恶果，想必中国人都有刻骨铭心的感受，无需赘言。

又比如他说，“革命是一个听上去非常爽快激昂并且似乎很立竿见影的词汇，但是革命于中国未必是好的选择。”同样，我也认为，那种爽快激昂的“革命”，在当代中国真的未必是好的选择，但原因并非如同韩寒所说的：反腐败诉求不能持久，而“自由”、“公正”又没有市场，特别是东方革命的收获者必定是心狠手辣者。至于是何理由，下文我们再阐述。

再比如，他不无深刻地指出，“最关键就是大部分中国人一副别人死绝不吭声，只有吃亏到自己头上才会嗷嗷叫的习性，一辈子都团结不起来。”中国人不团结，遇事一盘散沙，缺少携手合作、矢志不渝干事业的一股劲，地球人都知道，这也是为什么中国作为如此地大物博的国家，却被比自己小很多的日本长时间侵入的重要原因。只管自家门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是中国国民的普遍民族心理，这一点几乎可以成为共识。在一个相互关联的世界，如此自私和隔膜的民族，想要达成共同目标，的确存在难度。

他还说，“民主是一个复杂，艰难而必然的社会历程，并不是什么革命，普选，多党制，推翻XX，这些脱口而出的简单词汇可以轻易达成的。”的确，民主是个伟大的目标，在实现它的过程中，需要无数的牺牲和努力，而且确实不是革命、普选、多党制和推翻XX等等元素的简单叠加，就可以



在社会构成越复杂的国家，尤其是东方国家，革命的最终收获者一定是心狠手辣者。（韩寒：谈革命）

达成的。

可以说，在上述几个观点上，我和韩寒都有着相同或者类似的看法。

但更多的是分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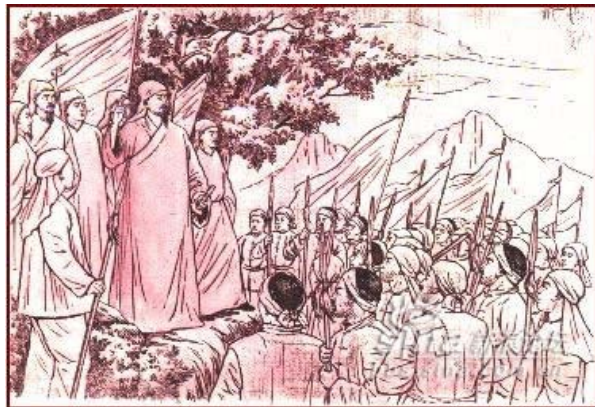
韩寒给出的反对革命的理由是，反腐败难以持久，自由、公正无市场，革命最终将导致暴君统治。和他相反，我认为，反腐败是革命最有力、也最立竿见影的武器，最能激发公众的痛恨和意志，同时自由、公正，是所有中国人历来的普遍的愿望。历史上起义或者革命成功的，都是有效利用了民众对统治者骄奢淫逸的反感，同时提出了公正或者自由的理想，太平天国运动、辛亥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都如是。现实中泛滥的贪污腐败、妨碍公民自由和新闻自由、法治不遵和贫富悬殊现象，都使得廉洁政治、自由和社会公正，成为民众强烈的渴望。当这些渴望无法满足时，就会引发民众反弹，乃至触发革命，当革命被野心家利用时，就会产生新的暴君。

韩寒故意割裂民主和自由的关系。他从所谓的公共道德出发，认为民主将带来不自由。在他眼里，除了文化人，普通中国人想要的自由，就是自由地喧哗、自由地过马路、自由地吐痰、自由地违章、自由地钻各种法律法规的漏洞、自由地胡作非为。他的这种观点，无疑是站在精英的立场上来说的，在他眼里，是鄙视普罗大众的，觉得他们除了那些劣质的自由之外，不需要任何政治上的自由；他们所关心的，只是自己的眼前的享受，而非全社会的共同利益；中国普通人对自由有着自己的定义。由此他得出结论，既然民主这么坏，导致这么些“自由”，中国人还有必要追求民主和自由吗？我很惊讶于他竟然会有此种观点，想必他已经从一个为公众利益仗义执言的“公共知识分子”，蜕变为一个卫护自己的阶级利益的有产者了。

关于这一点，他进行了更进一步的论述，他认为，革命将导致新的掠夺式的“均富”，通过劫富济贫，实现革命的目标。众所周知，韩寒是这个社会的“成功人士”，拥有大量财富，早已不是纯粹的知识分子了。为了提醒人们革命将带来可怕的后果，他不无恐吓性地强调，“在革命的洪流里，你拥有一个苹果手机，你是开摩托车的，甚至你会上网，你平时买报纸，吃肯德基，你都算是有钱人，甚至是有能力在互联网上阅读到这篇文章的人，都是充满着原罪的被革命对象。”通过这段话，他奉劝这个社会的多数人，不要再相信革命，而要明哲保身，满足于现有的物质享受，而不是去多管闲事，追求什么普世价值或者公众利益。

“埃及，利比亚是被一个人独裁统治几十年，城市也不多，一个事件作为爆点，一个广场用来演讲，就可以革命成功。”不知韩寒对埃及和利比亚“革命”究竟了解多少，才妄出此言。事实上，在这两个国家，革命，都不是轻易成功的，都是民众作出大量牺牲、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才达成他们的目标的。特别是利比亚，卡扎菲当局和反对派武装，在经历了惨烈的战争洗礼后，才最终决出胜负，又岂是韩寒轻描淡写就完结了的？

“一人一张选票选主席，其实这并不是中国最大的急迫。相反，一人一张选票，最终的结果还是共产党代表获胜。”韩寒干脆运用了诡辩术。他从选举依赖金钱，而共产党拥有大量资金，得出了共产党必然获胜，因此普选不是中国所需要的奇怪结论。



1853年，太平天国起义军攻克南京，革命者洪秀全满足于半壁江山到手，贪图享乐，从41岁进南京，到1864年6月52岁时自杀，11年中从未迈出过京城一步。只有一次坐64人抬的大轿出宫，去探视生病的东王杨秀清。

“如果你对司法和出版都从来没有关心过，你关心普选有什么意义呢。无非就是说起来更拉风一点。”“如果你硬要问我在中国，什么时候是个革命的好时机，我只能说，当街上的人开车交会时都能关掉远光灯了，就能放心革命了。”在他眼里，中国人显然素质不高，开车交会时会忘记关掉远光灯，甚至连司法和出版都从来没关心过，又如何有资格革命，并享有直接选举权？

从韩寒的文章可以看出，他认为中国人不缺自由和公正，中国人很自私、不团结，中国人中很多人有钱也有很多人没钱，中国人没素质，因此，中国不需要革命，不需要民主，不需要选票，也不需要利益调整。大家各安天分，等到国民素质和教育水平真到了那份上，什么事都自然而然发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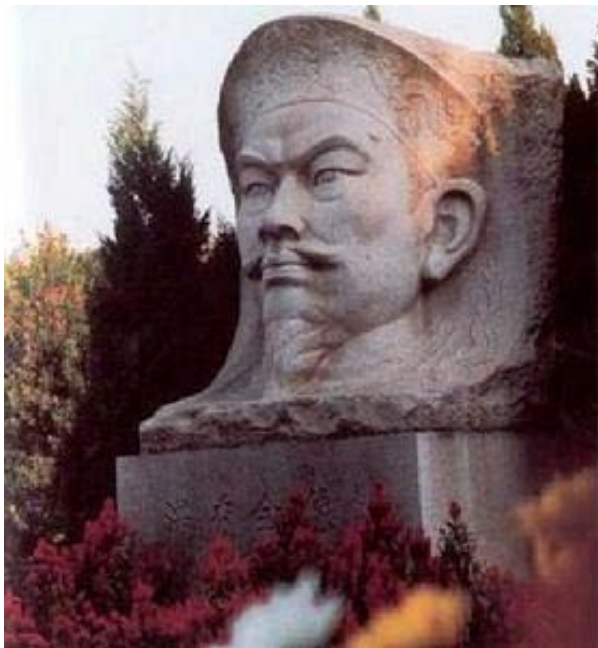
韩寒以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就当前敏感问题，提出集中国特色论、中国阶段论和民众素质论的大杂烩为一体的“革命观”，在中国社会并不孤立和孤独，也以其特殊影响力迷惑了一批人，拥有一批支持者和同情者。尤其是他迎合了既得利益集团的想法，说了别人想说而不便说的话，做了别人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他的言论危害性比通常的要大，即在于此。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而不是从韩寒个人想法的角度，当这种革命观按照利益集团的意图，渗透到国民包括社会精英的精神世界中时，对中国前途的影响，可谓更加深远。

就像韩寒反复想说明的，我总体上认为，解决当代中国的问题，革命可能不是最好的办法，或者，即使发生革命，真正的弱势者和普通大众，未必是主要受益者。革命后势必重新进行利益调整和分配，那些在革命中居于领导地位的阶层有可能将攫取革命的果实，使得普通人无法从革命中获得利益。但革命将带来社会动荡和混乱的风险，则毋庸置疑，至于它能延续多久，取决于多方面因素。不管怎样，在一个动荡和混乱的社会，处在多数的民众的利益将无法获得有效保障。

相对于风险造成的民众生存的困难、更大的不公正、不自由乃至“换汤不换药”的腐败而言，我更倾向于主张采取改革而非革命的方式，改变现实政治和社会，满足民众诉求。

然而，革命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当条件累积到一定程度时，它就会发生。在一个社会深入转型、矛盾多发和群体性事件此起彼伏的国度，革命无时无刻不在我们身边。我们可以从理论上



洪秀全雕像



太平天国末期的女囚犯（图）

有数据显示，太平天国使中国的人口由原来的4亿减到了2.4亿。太平天国运动期间，仅苏、浙、皖、赣、闽五省，人口过量死亡就多达7000万。中国当时最富庶的地区，经济受到极惨重的打击。太平军所到之处，文化受到无法弥补的破坏，被称为史上伤亡最大的战争，人类历史上伤亡最大的战争是太平天国，其次才是一战、二战。

论证革命的诸多危害性和不必要，但无法否认，当一个国家在面对民众强烈的诉求却缺乏改变的意志和举措时，将诱发和导致革命从不经意中产生，就像发生在中东很多国家的故事一样。

而避免革命的唯一办法，就是适应形势的发展和人民的诉求，主动地及时地彻底地改变自身。不主动改革，将会导致被动的“革命”；不及时改革，也将导致仓促的“革命”；不彻底改革，更将积聚“革命”。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没有不经过斗争，就可以轻易获得的权利和利益。当民众无法通过合法化途径取得利益集团的让步和支持，争取自身权益的时候，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采取极端方式。

无数的例子说明了这一点，暴力并不是冲突的必然形式，但当冲突无法和平地解决的时候，暴力就是冲突的必然延伸。革命亦然。

（来源：作者授权。文章地址：<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220380>）

作为一个独立的批评者，韩寒有权批评一切，既有权不留情地批评政府，批评体制，也有权不留情地批评社会，批评革命。批评的对错是一回事，但批评的自由不容置疑。不容批评革命，无非出于一种革命崇拜。这革命崇拜本身就是传统革命情结，就是落后的乃至野蛮的。

革命需要啄木鸟

——兼论韩寒《谈革命》

笑蜀 / 文

革命应该是向着自由的革命，即革命的目标，应该是以自由立国。所谓立宪，宪者何谓？限制权力保障自由是也。革命乃革暴政之命，暴政何以必须扑灭？也仅因为其侵犯自由是也。所以，自由之于革命，如睛之于龙。无睛之龙不是真正的龙，那不过是龙尸；不向着自由的所谓革命，叫政变，叫叛乱，叫暴乱，叫改朝换代，都可以，就是不能叫做革命。

但自由不只是革命的目标，不只是龙之睛，它更应该是革命的灵魂，而贯穿于革命的全过程，贯穿于所有的革命手段。即，革命不是别的什么，抵抗暴政保卫自由而已。不是等到革命完成才让人自由，而是革命的全过程，所有手段，都直接为着自由抵抗暴政，不只抵抗来自外部的暴政，尤其要警惕和抵抗来自内部的即革命本身的暴政。

来自革命本身的暴政，史上不绝如缕。以至革命往往成了绞肉机，成了对于自己营垒的大规模杀伤武器。这里的原因当然很多很多，但最根本的原因，则是自由的丧失。法国革命如此，俄



罗莎·卢森堡（1871-1919），波兰女革命家。曾撰文指出列宁关于党组织原则，是“极端的集中主义”。一战爆发前后，她坚决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和社会沙文主义，1919年1月15日，由于叛徒告密，她和卡尔·李卜克内西一起被捕，后遭秘密杀害。列宁曾誉其为一只搏击长空的鹰，“鹰有时飞得比鸡低，但鸡却永远不能飞得像鹰那么高”。

国十月革命亦复如此。十月革命之前，卢森堡与列宁有过一场激烈的论战，革命与自由的关系，则是论战的焦点。卢森堡断言：列宁把“布朗基密谋集团的运动的组织原则机械地搬到社会民主党的工人群众运动中来”，最终结果，必然是革命的蜕变：“自由受到限制，国家的公共生活就是枯燥的、贫乏的、公式化的、没有成效的，这正是因为它通过取消民主而堵塞了一切精神财富和进步的生动活泼的泉源。”

仅仅如此也就罢了。而最惊心动魄的，是卢森堡如下一段预言：

“随着政治生活在全国受到压制，苏维埃的生活也一定会日益瘫痪。没有普选，没有不受限制的出版和集会自由，没有自由的意见交锋，任何公共机构的生命就要逐渐灭绝，就成为没有灵魂的生活，只有官僚仍是其中惟一的活动因素。公共生活逐渐沉寂，几十个具有无穷无尽的精力和无边无际的理想主义的党的领导人指挥着和统治着，在他们中间实际上是十几个杰出人物在领导，还有一批工人中的精华不时被召来开会，聆听领袖的演说并为之鼓掌——这固然是一种专政，但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一小撮政治家的专政，就是说，纯粹资产阶级意义上的专政，雅各宾派统治意义上的专政；不仅如此，这种情况一定会引起公共生活野蛮化：暗杀，枪决人质等。这是一条极其强大的客观规律，任何党派都摆脱不了它。”

显而易见，卢森堡不幸言中。革命的长虫一旦没有自由的灵魂驾驭，就跟其他暴力机器没有了区别，而退化到野蛮状态，不分青红皂白地吃人就成了它的本能。即，所谓革命已蜕变成彻头彻尾的暴政。它比普通的暴政不过多了一样东西：所谓革命的神圣光环，因而可以高踞于图腾位置，一边享受血流成河的吃人盛筵，一边享受千万善男信女的欢呼和膜拜。

这种模式的革命，我把它称之为传统革命。传统不仅表现为暴力性质，更表现为内在的精神气质，即反自由的精神气质。它号称为了自由：砸烂的只是锁链，得到的将是整个世界。但它把自由的目的跟革命的过程和革命的手段割裂，把自由看作是自由进程的绊脚石。这种怪诞逻辑最经典的体现，就是名篇《反对自由主义》。

一切为了胜利，哪怕牺牲自由也在所不惜。革命对自由的侵犯，对人的压迫，就这样被赋予伦理上的正当性，不容质疑。质疑革命侵犯自由的卢森堡，到了斯大林时代，竟成了敏感词，谁引用她的话便是反革命。独断，排他，不择手段，不计代价，这一切跟自由背道而驰的丛林哲学，都成了天经地义。目的是争取自由的革命，反倒以不断牺牲自由为代价，以反自由的手段来推动。

但毒果怎么可能开出善之花呢？目的跟过程、目的跟手段怎么可以分开呢？也就无怪革命胜利后，所建立的体制往往是反自由的体制。这样的传统革命太可怕，不堪回首。固然如卢森堡所称，革命是人民最后的武器，告别革命的鼓噪过于轻佻。但，我们的确需要一场告别传统革命的革命。不告别传统革命，普世文明照耀下仍奉行反自由之传统革



大嘴乌鸦伴着罗莎·卢森堡在雪中漫步。

命，这本身就是对革命的伦理正当性的消解，毋宁说，这本身就是侮辱革命。

新时代的革命，与传统革命最重要的分别在精神上，即它不是反自由的，而以自由为灵魂，以自由为最高尺度去丈量革命，看它的全过程、所有手段、所有细节，是否真的兑现了它所承诺的自由。而所有自由中最重要的自由，是意见市场上质疑革命的自由、批评革命的自由，乃至反革命的自由。如果革命能够充分包容质疑、批评和反对，那么还有什么病变不会被发现？还有什么异化不会被遏制？革命又怎么可能偏离自由于分毫？

这即是说，新时代的革命不是强拆，不是遇到质疑、批评和反对就势不两立，就你死我活。章太炎有骂孙中山的自由，叶德辉有骂农会的自由，辜鸿铭有留辫子的自由，尊重每个人都拥有这样的自由，尊重文明社会的一切自由规则，这本身就是对不自由的传统秩序的反叛，这本身就是对传统革命的革命，这本身就是最彻底因而最健康的革命。

回过头来说韩寒。他近日发表了一篇引起巨大争议的文章：谈革命。在我看来，这文章的本意并非反革命，而不过反映了他个人对革命的担心和忧虑，至多不过是对革命的质疑。具体观点有对有错，可批评可反对，但无论批评还是反对，都该就事论事，不能动辄上升到人格，贴上这样那样的标签。

作为一个独立的批评者，韩寒有权批评一切，既有权不留情地批评政府，批评体制，也有权不留情地批评社会，批评革命。批评的对错是一回事，但批评的自由不容置疑。不容批评革命，无非出于一种革命崇拜。这革命崇拜本身就是传统革命情结，就是落后的乃至野蛮的。除了生命和爱，世上没别的神圣可言，革命更谈不上神圣，因为说到底，作为人民抵抗暴政最后的武器，革命不过工具而已。人哪有神化工具、自己拜倒在自己工具面前的道理？

岂止不能神化革命，反而要管理好革命。毕竟革命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工具，它是武器，武器可以杀人的，因而是绝不允许失控的。不具备相应管理能力的人，必剥夺其武器。而提升对于革命的管理能力，没别的法子，只有毫不留情的批评，毫不留情的监督和制约。这就是说，对待革命就应该像对待公权力那样，以防止其作恶为第一原则。在这意义上，当下最需要的是像卢森堡那样的思想家。论对革命的忠诚，论英勇献身，没几人能跟卢森堡比。但论对革命的深刻反思，更没几人能跟卢森堡比。韩寒对革命的批评，仅仅是抛砖引玉，比卢森堡差了不知几万里。他还需要成长，最好是成长为卢森堡那样的双向啄木鸟：既啄公权力之树，亦啄革命之树。只有当这样的双向啄木鸟愈来愈多，才能把对传统革命的革命进行到底，才能真正开启新时代的革命即实质意义的转型。

而所有这一切，都必须以自由为条件。必须充分自由地聚焦革命的全过程、革命的所有手段、革命的一切疑点，才能保证革命真正向着自由，而不再偏离乃至背叛。



只给政府的拥护者以自由，只给一个党的党员（哪怕党员的数目很多）以自由，这不是自由。自由始终是持不同思想者的自由。（罗莎·卢森堡）

（来源：引自共视网。<http://www.21ccom.net/articles/sxpl/pl/article-2011122650894.html>）

中国的许多“文化人”并非像韩寒那样想入非非地要扮演哈维尔，而是越来越认识到民主是一场漫长、深刻的社会革命。所谓“公正”的理念及其确立，靠的不是养尊处优的“文化人”的启蒙，而要从地方草根社会的脉络中去寻求。

中国的革命恐惧

薛涌 / 文

韩寒年底写了三篇博文《谈革命》、《说民主》、《要自由》，在中国引起一阵文化骚动。细读下来，引起争议的主要是《谈革命》。《说民主》不过是对之的补充而已。《要自由》最无新意，基本不出 80 年代初知识分子的思想，只是说得更大胆些而已。

韩寒是年轻一代反叛的象征，就像是童话中那个说出“皇帝没有穿衣服”的小女孩儿。所以，他不仅是青年的偶像，在知识分子中也很受尊重。《谈革命》之所以引起那么大的震动，一大原因就在于许多过去非常尊重他的知识分子，觉得这个反叛人物突然接受了“招安”，乃至对他的动机生出种种猜测。

这些猜测动机的“噪音”，当然不利于思想的讨论。但是，韩寒本人对此并非没有责任。在《谈革命》这篇自问自答的博文中，是他以“最近中国群体事件频出”的问题开始，并且也是他对自己提出“你的观点非常的五毛党”这样的问题。他显然清楚：这篇文章基本上是为现实而辩护的，所以等不及别人攻击就要先自辩一番。

之所以要先讨论这些背景，是因为它们和韩寒的核心论点有着重要的关系。以下是他的论述：

革命的最终收获者一定是心狠手辣者。很坦率的说，革命是一个听上去非常爽快激昂并且似乎很立竿见影的词汇，但是革命与中国未必是好的选择。首先，革命需要有一个诉求，诉求一般总是以反腐败为开始。但这个诉求坚持不了多远。“自由”或者“公正”又是没有市场的，因为除了一些文艺和新闻的从业者，你走上街去问大部分人，你自由么，他们普遍觉得自由。问他们需要公正么，他们普遍认为不公正的事情只要别发生在我自己身上就可以了，不是每个人都经常遭受不公待遇，所以为他人寻求公正和自由不会引发人们的认同。在中国是很难找到这样一个集体诉求的。

文化人普遍将民主与自由联系在一起，其实对于国人，民主带来的结果往往是不自由。因为大部分国人眼中的自由，与出版，新闻，文艺，言论，选举，政治都没有关系，而是公共道德上的自由，比如说没有什么社会关系的人，能自由地喧哗，自由地过马路，自由地吐痰，稍微有点社会关系的人，我可以自由地违章，自由地钻各种法律法规的漏洞，自由地胡作非为，所以，好的民主必然带来社会进步，更加法制，这势必让大部分并不在乎



指责韩寒“读书少，学术差，不专业”，是很无聊的。正因为韩寒“读书少，学术差，不专业”，他才用不着硬要找件时装披在身上。他的新衣就是什么都不穿，坦然地裸露出自己的真实。（易中天：韩寒的新衣）

文化自由的人们觉得有些不自由，就像很多中国人去了欧美发达国家觉得浑身不自在一样。所以，民主和自由未必要联系在一起说，我认为中国人对自由有着自己独特的定义，而自由在中国最没有感染力。

他最后的结论是：

现今中国是世界上最不可能有革命的国家，同时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急需改革的国家。无论中国发生暴力革命或者非暴力革命，文人所处的地位和角色远远比他们想象的要低得多，更别说能作为领袖了。而且国民素质越低，文人就越什么都不是。你也不能用完美的民主，完美的自由，完美的人权从字面上解释应该什么样子的来逃避中国的现实……你不能天天盼着天鹅绒革命，再由你来扮演哈维尔，并瞬间让每个中国人有一张选票……

读到这些文字，先抛开其中的诸多谬误不说，最让我吃惊的是，韩寒作为青年偶像，思想却很老，似乎更接近40后50后。他所谓的“文化人”，在80年代初叫“知识分子”。这些人那时大力推崇普及民主自由的观念，自有其历史功绩。不过，这些人的知识成长期大多在1949年以后，虽然从现实的痛楚中感受到自由民主之必要，但很少有机会对自由民主有细致真切的研究。因此，他们有意无意地秉承了传统士大夫“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之精神，坚信民主自由的前提是广大民众接受他们这些“知识分子”的启蒙。有了充分的启蒙，知识分子登高一呼，即万众相应，于是中国在一场摧枯拉朽的革命中有了民主。这就是韩寒所说的文化人总想自己扮演哈维尔的情景，是他对以民主自由为目标的“革命”观的解读。只不过现在他要说：老百姓尚没有被启蒙，素质还差得远，不是文化人想象的那样，所以中国还不能民主。文化人高素质、老百姓低素质这种从鲁迅到80年代初一直在知识分子们心中根深蒂固的信念，还是韩寒的基本思想预设。他自己“作为一个文化人”，字里行间也充满了这种优越感。

其实，自80年代后半期，中国知识界已经开始对这种启蒙主义进行反省。其中一个兴奋点，是林毓生的《中国意识的危机》的翻译出版。林教授研究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反传统主义，结论是：这些人反对传统的思想内容，但依然未经反省地接受了传统的思想模式。具体而言，他们虽然要引入西方思想，但依然固守着“以思想文化来解决问题”的士大夫文化模式，觉得中国的所有问题都可以被化约为老百姓的思想意识形态问题，即所谓现在所说的“素质”。国民素质如此，还谈什么民主？于是他们就把“改造国民性”作为首务。

此书出版后，包括笔者在内的一批当时还比较年轻的人，开始批判“启蒙心态”，挑战知识分子的道德优越感。我后来撰写一系列文章，称中国需要一定的“反智主义”，以破解“知识分子”的独断，其思想来源也可以追溯到《中国意识的危机》。事实上，最近十几年许多知识分子被网民以“砖家”、“叫兽”相称，早已丧失了启蒙者的光环，成了“带路党”。在知识界本身，也发生了严重的分裂，大家不再以“社会良心”相标榜，而更多地分



林毓生，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校区历史系教授、当代著名学者，著有《中国意识的危机》《从公民社会谈起》等。

成各派、彼此指责对方为“既得利益集团”。笔者对大呼“文学是个屁，谁也别装逼”的韩寒之所以推崇，恰恰在于他嘲弄了知识分子这种自以为是的心态。

不过，韩寒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知识界许多人走出“启蒙心态”后，开始探索新的路径。地方自治这种基层民主权利，已取代了以知识分子（文化人）为中心的启蒙主义，成为这些人的思考核心。大家都知道，小岗村的农民开启了整个中国的改革，乃至使韩寒有条件成为闪亮的文化明星。这并非因为他们接受了知识分子的启蒙，而是他们通过“群体事件”掀起了一场革命。如今的乌坎，也被当作小岗村式的“群体事件”，大家希望由此能引起一场同样深刻的政治革命。

在这个背景下，韩寒的《谈革命》当然就成了对这些草根“革命”的诋毁。他口口声声“在中国是很难找到这样一个集体诉求的”。那么小岗村和乌坎的老百姓难道没有鲜明地表达并捍卫、实践自己的“集体诉求”吗？韩寒说街上的中国人“普遍认为不公正的事情只要别发生在我自己身上就可以了，不是每个人都经常遭受不公待遇”。看看小悦悦的命运，他确实观察到了大多数中国人观察到的事实。但是，中国人为什么对他人的利益那么漠不关心？为什么那么自私？简单的一句“素质低”是最廉价的解释。韩寒没有想到的是：人情冷漠、谁都觉得别人的死活和自己没关系这些现象，跟一个社会没有给“群体事件”提供充分的空间有关。在“群体事件”中，参与者之间彼此的连带感和责任往往特别强。在乌坎你就能够看得清清楚楚：几乎每个参与者对其他参与者都负有责任。当有这么多人冒着身家性命的危险为一个死去的人讨公道时，一个能玩儿得起赛车的城市年轻贵族，有什么资格在那里指责别人不在乎“公正”？

所以，我劝韩寒多读点书。西方民主自由的形成，可谓千头万绪，但其中重要的一端，就是地方一系列的“群体事件”所酿成的制度模式。这种地方自治体（commune），被学者们称为中世纪一场“静悄悄的革命”，最终塑造了现代西方发达国家的制度。公民的概念首先从市民开始。这些市民的身份，则又是起源于类似小岗村那样的共同体成员的“盟誓”。即使在日本，中世纪和江户时代乡村的一系列“群体事件”（包括“越诉”，略相当于我们所谓的“上访”），为草根社会打下了坚实的自治的基础，也为后来日本的现代化和民主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也正是基于这些认识，中国的许多“文化人”并非像韩寒那样想入非非地要扮演哈维尔，而是越来越认识到民主是一场漫长、深刻的社会革命。所谓“公正”的理念及其确立，靠的不是养尊处优的“文化人”的启蒙，而要从地方草根社会的脉络中去寻求。乌坎证明的，也恰恰是这一点。



1978年，安徽凤阳县小岗村18位农民以“托孤”的方式，冒着极大的风险，立下生死状，在土地承包责任书上按下了红手印，创造了“小岗精神”，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

（来源：引自作者博客 <http://xueyongblog.blog.163.com/blog/static/132521424201111271032093>）

立宪派要君主立宪，韩寒要文化自由，其实都是要改参数，看看能不能改善一点是一点，是不是可以不让中国堕入周期律的轮回。这是一个公共领域的话题。所以我说，不管读不读书，概念对不对，这种恐惧是真实的，这种要求也是真实的。

谁说韩寒不读书

杨早 / 文

(一)

先说说韩寒的观点。

韩寒的观点一点都不新，总括起来一句话“革命不如改良”。掰扯革命有暴力非暴力之别，在这个问题的语境下没什么意义。在“革命-改良”的二元对立结构里，是否有意识地使用暴力，是否以推翻现政府为目的，就是二者的分野。

有人说，天鹅绒革命呢？是啊，还有光荣革命，也叫革命。说清这个问题需要使用到语源学，讨论译词的变迁，我看就算了吧。既然革命已经像起义、小姐一样，在公众脑海里形成固定印象，你要干什么跟历史不一样的事，不如另外起个名字。

在中国一百来年的历史中，革命还是改良，一直是非常纠结的问题。今年大家都说，你看辛亥革命挺好，没死多少人，帝制终结，共和建立，政权也转移了，国家也没有分裂。但是想想辛亥后的历史，就不太能高兴得起来。这段历史的尴尬，就在于民主试验遭遇惨败，暴力革命又贻害无穷。

转到了今天，大家一看，今天跟一百年前，好像啊。这就好比上次你打关没打过去，复活了重启了又来到这儿，怎么打？参数设置要不要变？要不要去哪儿装备个血包？这是现在最纠结的问题，我们可以向历史要什么？我们的现实比百年前有什么进步？

“中国人素质不适合民主”，一百年来不断有人说。孙中山后来搞出军政、训政、宪政几个时期，也是觉得中国社会不可能一蹴而就普遍民主。有人说这是精英对民众的低估，又有人反过来说“立即民主”是对民



“天鹅绒革命”中的哈维尔与杜布切克



1989年“天鹅绒革命”时期的瓦茨拉夫广场。“天鹅绒革命”，狭义上是指捷克斯洛伐克于1989年11月（东欧剧变时期）发生的民主化革命。从广义上讲，天鹅绒革命是与暴力革命相对比而来的，指没有经过大规模的暴力冲突就实现了政权更迭，如天鹅绒般平和柔滑，故得名。

众的高估。现在村绅自治也是热门的话题。总之讨论还在热烈中。

韩寒从生活感受出发，觉得中国人还没法适应大民主，也是很容易引起共鸣的。有人说你看香港台湾怎么就文明了？这个问题也很复杂。文明进程与之前的统治秩序是有关系的。香港、台湾的社会文明程度，不能说全是殖民的结果，但也跟殖民社会的强制文明脱不了干系。以中国现在互相投毒、老人不敢扶的伦理状况，要说突然无政府了，社会能自发建立自治秩序，以最小成本穿越过渡期，我是不太敢相信。

韩寒的意思，是中国跟捷克没法比，所以天鹅绒革命不现实。这就是个观点，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但这种想法比较符合一般人的直觉。当然这样说比较泄气，不过一百年来中国经常从某某国那里汲取经验，获得曙光，到现在反倒什么都成了中国特殊国情。这也是很吊诡的事。

总之，历史如果能说成小葱拌豆腐，那指定是不可信的。可信不可爱，可爱不可信，你要是想忽悠民众，那肯定拣可爱的话说。如果大家都说真话，那么凭感觉说话，虽然不够严谨不够学术，但不是坏事。讨论问题最好都像搞历史研究一样，分“信”“疑”“释”三派，允许人去尝试破冰，也允许人站一旁悲观怀疑——各自的片面深刻达到相对平衡。



1688年，威廉三世在英国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协助下，发动政变，兵不血刃的推翻了詹姆斯二世的统治，史称“光荣革命”。

（二）

韩寒的《论革命》、《论民主》写得没有以前的文章好，写得有问题。这一点我没有异议。为什么没有以前好？因为他以前的文字大多是反讽，是消解，或就事论事，属于常识写作，容易叫好。而这两篇因为要提出一些观点，属于建构，这就超出了常识写作的范围，再用韩寒习以为常的笔调，就容易露破绽。

我注意到这两篇文章的特别之处。以前韩寒几乎不使用“大词”，更不提及历史。这倒不意味着韩寒真不读书——一个聪明而求智的人不读书，我才不信哩。只不过一来韩寒之前讨论的话题不一定需要引入理论与历史，引入反而可能造成阅读障碍，二来韩寒娴熟的“闲话腔调”跟理论与历史之间比较互斥——因此说韩寒是“当代鲁迅”简直是鬼扯，二人的下笔就完全不同。

然而《论革命》、《说民主》用到了理论与历史，笔调还是韩寒习用的问答式闲话，这几乎就注定了这两篇文章的力不从心。不过，排除各式各样的阴谋阳谋论，就韩寒个人而言，倒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不信你去读沈从文的早期议论文字，连舌头都捋不直的感觉，到老这人也没能写好论说文，所以你也可以放言“可惜从文不读书”。可是你不能说一个人擅长什么，就只能去干什么。一盘生意我们或许应该追求效益最大化，一个人，还是有权也应该探索各种可能性。韩寒过去基本不谈书不谈历史，可能是天性厌恶引用，也可能是配合受众的策略，很成功。但一个而立之年老是重复自己，跟拒绝长大的郭敬明有何区别？

不管如何，韩寒圣诞几篇文章让人看到了他作为一个写作者的复杂。说实话，我已经看厌了教主每出一文，粉丝皆举手赞颂附和的“自我红卫兵化”景观，更看厌了各方老年中年拼命要招安年轻一代，恨不得颁给韩寒一个中国脊梁奖的急切嘴脸。被神化或符号化的韩寒，就会变成说不得的韩寒，一点儿错误都不能犯的韩寒，也就是停止生长的韩寒。这种景象本身就既不民主，又不多元（按

照桑德尔的说法，中国人如刘瑜嚷嚷的“自由”，其实应该被称为多元）。

（三）

我们要牢记鲁迅的判断句：专家多悖，通人多浅。常识表达而今大行其道，所以不少公众看见砖家叫兽们就烦，似乎知道常识就知道一切。而大部分的“公共知识分子”，看似百姓的代表，社会的良心，其实他们的见识，只足以保证在某些具体个案中获得如愿以偿的启蒙效果。说白了，如果不是某党某政府的颀颀无能相配合，他们哪能凭借敢言就暴得大名？这一点又跟晚清极度相似。

当敌我分明的时候，反对总是有效的、大快人心的。但当对手一旦消失，光是敢言就很麻烦。自辛亥至五四，言论自由基本无问题，各派人马，包括在清末最受欢迎的，民初最受欢迎的，还有努力成为最受欢迎的年轻一代，都在给中国开药方。深受实验主义影响的胡适觉得不对味，要求多讨论问题，少谈点主义。被李大钊等迎头痛斥，那意思也是嫌胡适之不读书：纲张才能目举，主义没讨论明白，怎能解决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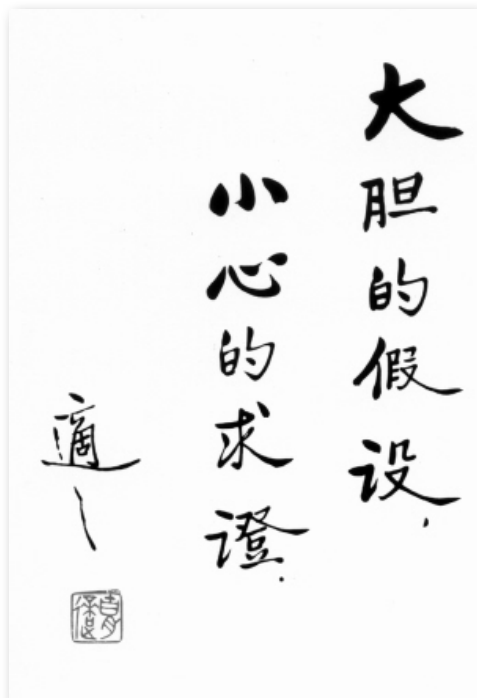
事实上从这之后，中国的政治环境越来越糟，什么主义都不起作用。现在很多人羡慕香港、台湾的人口素质。香港有什么主义？有自由没民主的殖民地，照搬“祖家”的制度。台湾今年大选辩论，谁也不拿意识形态作文章，都在讲民生经济。只有这块土地上，才出现过“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老百姓打死不明白的玄妙口号。

说到底，还是不同场域的问题。在公共领域，任何问题都必须化约为公众的切身感受与常识，民主不民主，自由不自由，一是每个人的感知（我自由吗？这个国家民主吗？），一是经得起拷问的程序正义。不读书也能要求民主，不懂法也能主张自由。

至于在知识场域，不读书确实有问题，不要说没资格发言，有时脚都伸不直。问题是公共领域原则不要加诸知识领域，事事必须常识化表达，知识领域的傲慢，也没有必要带进公共领域来。韩寒《说民主》提到文人要扮演“一颗反向墙头草”，最多也只适用于公共领域。

今天韩寒发表了第三篇《要自由》，李承鹏也发表了《民主就是不攀亲》。韩寒的前两篇文章，和李承鹏这篇很不认同的回应文章，都有点高举高打，谈到中国现实就缠夹不清。缠夹不清是对的，因为历史与现实是如此复杂残酷，一篇短文就能说明白，只有两种可能：（1）这是理论到理论的智力推演，仅限于共享背景的攻受双方；（2）这是为了忽悠民众做点什么。如罗家伦揭示的那样，发动民众，一要简单，两句话说明白，二要容易，一举手就能做到。

《要自由》的所谓“讨价还价”，要自由的动机很个人“我，和我的媒体朋友”，列举的理由很国家：“文化的限制却让中国始终难以出现影响世界的文字和电影，使我们这些文化人抬不起头来。同时，中国也没有在世界上有影响力的媒体——很多东西并不是钱可以买来的……愿执政党阔步向前，可以名垂在不光由你们自己编写的历史上。”



胡适总结“实验主义”的十字箴言：“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

这看上去很像清末立宪派的进言：世界大势，浩浩荡荡，反之则两伤，顺之则两利，伏乞皇上皇太后垂察。立宪派要君主立宪，韩寒要文化自由，其实都是要改参数，看看能不能改善一点是一点，是不是可以不让中国堕入周期律的轮回。这是一个公共领域的话题。所以我说，不管读不读书，概念对不对，这种恐惧是真实的，这种要求也是真实的。

这就足够了，不是吗？

（来源：引自爱思想网 <http://www.aisixiang.com/data/48589.html>）

革命，从本质上讲是人类对自由的实践，它的目标就是寻求免于压制的自由，以及与自由相适应的制度。中国历代的革命者，多是把民众的苦难当作革命激情的源泉，对建立自由政体这类政治目标，思考得极少。因为民众并没有通过革命获得自由地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最终会导致权力的扩张，及对自由的败坏。

也谈革命

叶匡政 / 文

最近微博上，很多人争议韩寒《谈革命》一文。对一个作家来说，在此问题上被绊跟头，并不奇怪。韩寒的观点，代表了当下一些知识分子对革命的看法。“革命”一词，由于对中国历史曾经造成的伤害，让我们今天不敢轻言这个词。从某种程度上说，革命一词在今天已经蒙羞，甚至生锈。

多年来，我也对革命一词充满疑问。直到前几年，读到阿伦特对革命的论述，我才对革命的某些悲剧之源有了一些认知。在阿伦特看来，革命真正的动力是人类对自由的渴望，这种渴望催生了革命这种创新的能力。然而所有的革命都有缺陷，我们衡量革命是否成功的主要标志，是要看它能否创造和扩展人的政治自由空间。

革命失败了不可怕，可怕的是革命的畸型，这不仅会败坏我们对革命的理解，甚至会让人们反感和排斥一切革命。革命绝不是以一种专制权力代替另一种专制权力，也不是以一个阶层的专政取代另一个阶层的专政，而是要创造一种全新秩序的政治空间，让所有人都能自由平等地参与到公共事务中，这才是革命的真正意义所在。

所有的革命，在开始时都会包含着大量的自由意识，但随着它的进展，结果才慢慢显示出来，它可能创造自由，也可能带来奴役。从早年苏联等一些革命的结果看，带来的是后者。能否实现政治自由，才是衡量革命是否成功的唯一标准。在革命的进程中，如果最初的自由诉求，被其他的意识形态所取代，或受制于政党利益及社会财富的增长，都有可能导导致革命的失败。当以政治自由为目的的革命，退化为反对政治自由的专制权力，就是对革命的最大败坏。



汉娜·阿伦特(1906-1975)，原籍德国的政治理论家，以其关于极权主义的研究著称西方思想界。著有《极权主义的起源》《论革命》等著作。

阿伦特有个重要观点，认为失败的革命，往往是因为将政治问题与社会问题混为一谈。她通过分析美国革命发现，虽然在革命进程中存在着社会歧视、奴隶制等等的社会问题，但革命者仍然坚持解决的是政治问题，所以为美国民众的自由奠定了宪政基础。而失败的革命，往往把解决贫困、经济争议等一些社会问题，当作革命目标，把社会问题当政治问题来解决，最终使得宪法、权利、自由等这样一些政治问题反而被悬搁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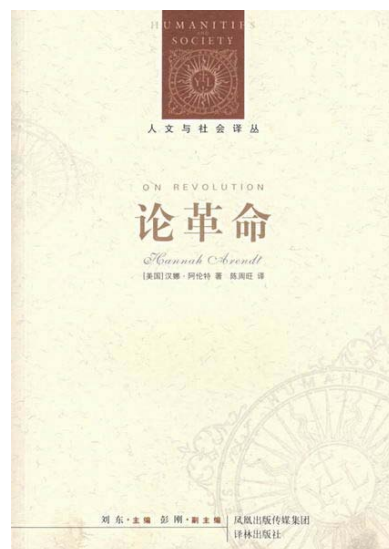
中国历代的革命者，多是把民众的苦难当作革命激情的源泉，对建立自由政体这类政治目标，思考得极少。因为民众并没有通过革命获得自由地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最终会导致权力的扩张，及对自由的败坏。革命要求革命者杀人，革命者就杀人；革命要求革命者撒谎，革命者就撒谎。于是，革命演变成一群人对另一群人的镇压，而不是为了实现所有人的自由，革命走向了它的反面。在中国历朝历代，革命总是与暴力连在一起的，但真正的革命却可以是非暴力的。革命是要革去坏制度的命，而非革掉某些个人的命。

当下很多人所以怕谈革命，多是把现代民主革命与传统儒家所言的“革命”混淆了。“革命”一词最早出自《周易》。《周易》有“革”卦，彖辞说到“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意思是商汤和周武王的革命，是顺乎天命而合于人心的。

“革”卦是离下兑上，也就是火下泽上，表明已呈水火相对之势，或火灭，或水涸，所以要革命。“革”卦还说“文明以说，大亨以正”，意思是革命的目的是促进文明，让民众喜悦，这样才是通顺和正当的。它的象辞则说，革命只有取得了三次成就，才能得到人民信任。这些观点虽质朴，但先秦时代能有这份认知，实在难得。

儒家显然是有革命精神的，中国历代也有革命的事实，但儒家所言革命，多是指改朝换代，也即顺应天命与人心的变革，对政治制度的根本改变论述极少。包括孟子和荀子，对革命也多有论述，如《孟子》说“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荀子》说的“诛暴国之君”以及“臣或弑其君，下或弑其上，人主自取之也。夺然后义，杀然后仁，上下易位然后贞”，都肯定了“弑君”“诛君”的合法性。近代中国的革命，虽和西学东渐有关，但实质体现的仍是儒家的革命精神，所以总以失败告终。

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不需要革命。革命，从本质上讲是人类对自由的实践，它的目标就是寻求免于压制的自由，以及与自由相适应的制度。如阿伦特说的，革命意味着人类能在任何逆境下重新开始并自由行动，让所有人能自由地进入到公共事务中。人类要获得这种伟大的自由，希望仍然在革命。



汉娜·阿伦特在《论革命》一书中，反复比较了法国革命与美国革命。其认为，革命的唯一正当目标是自由，以此为标准，法国革命是一场失败的革命，美国革命则成功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汉娜·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认为极权主义的兴起来自于精英和暴民的共同支持。精英和暴民的相互吸引、相互认同，甚至渴望成为对方，是极权主义运动里的奇异景观。

(来源：作者授权。原文地址：<http://blog.sina.com.cn/s/blog-489ab6b00102dw7j.html>)

所要的“自由”空而又空，给自己戴上的枷锁却是结结实实！这是在“要自由”吗？分明是在代表作家们（包括媒体的朋友）表决心嘛！只不过这决心表得非常巧妙，乍看像是讨价还价，再看有点像撒娇，其实是在主动自阉。

韩寒要的是自由还是枷锁？

李钟琴 / 文

12月26日，就在韩寒发出《要自由》的那天，我写了篇《三篇文章看完，我才看清韩寒》。如今仍意犹未尽，想再说几句。

韩寒反对暴力革命，引起很多人的共鸣，毕竟中国人的观念是“宁为太平犬，不做乱离人”，人之常情，情有可原。但是，韩寒忽略了一点，就是各个时期的革命，都带有时代特色。当代革命的主流，是推翻专制的民主革命，这是浩浩荡荡的时代潮流。看不清这一点，说明他的思想还停留在洪秀全时代。

至于韩寒认为中国人素质低的问题，我在前文中已作了辩驳，在此不赘。

在此想重点说说他的第三篇博文。因为他大大方方向官方要起了“自由”，所以迷惑了很多，网上有篇文章的题目竟是：《要自由》奠定韩寒必将镌刻在争取自由的丰碑上。

韩寒要的自由，只是创作自由，而且善心大发——“顺便我也替我的同行朋友——媒体人们要一些新闻的自由。”

韩寒表示，如果能得到他要的“自由”，那么，他将承诺：“不清算，向前看，不谈其在执政史上的敏感事件，不谈及或评判高层集团的家族或者相关利益，只对当下社会进行评判和讨论。”

我发现，韩寒要的所谓“自由”，只是一个空泛的名词，他并没有说出实实在在内容。比如说，他要的创作自由包含哪些方面，如何来保证这些自由，等等。

而他作出的承诺，倒是很具体。虽然只有两句话，内容却极为丰富。

一是“不谈其在执政史上的敏感事件”。什么事件敏感什么事件不敏感呢？这当然得由执政者说了算。人家感到敏感，那你就不能写！记得韩寒有言：“这个国家浑身都是G点。”也就是说，你们搞创作的，只要涉及近百年来历史，就极有可能犯忌。

二是“不谈及或评判高层集团的家族或者相关利益”。前一条承诺是历史的，这一条则是现实的。也就是说，凡涉及高层及其家族利益的，一律不能写！多高的层是高层？对生活在一个县城的作家来说，县里的书记副书记县长副县长就是高层；对生活在农村的乡土作家来说，镇上书记副书记镇长副镇长，甚至村书记村主任就是高层。韩寒还不如说：凡涉及上上下下官员以及有损其家族利益



《革命年代》，高华著。书中收录了作者近20年来的一些文章，内容涵盖国民革命、共产主义革命、“继续革命”，故以命名。作者自称：我等有幸或不幸生长在这个年代，……守着某种信念，以及可能已是陈词滥调的所谓“知识分子的责任”，开始摸索着观察、研究逝去的年代。这本集子既不是对革命的呐喊，也不是对革命的批驳与诘难，而是作者对生活其中的那个已经远去的革命年代的一份思索和纪念，或也可当作另一种形式的党史来读。

的题材都不能写！

请问，作家们还能写什么？写童话？写童话也有可能犯忌，君不见《皇帝的新衣》，分明涉及了“高层”。

所要的“自由”空而又空，给自己戴上的枷锁却是结结实实！这是在“要自由”吗？分明是在代表作家们（包括媒体的朋友）表决心嘛！只不过这决心表得非常巧妙，乍看像是讨价还价，再看有点像撒娇，其实是在主动自阉。

官方不便于明令禁止的，韩寒凭借其巨大的影响力出来禁止了。不知文艺界、新闻界的朋友响应否？

（来源：作者授权。博客地址：<http://blog.sina.com.cn/s/blog-48c1769b0100ygfb.html>）

所谓“人人皆成为韩寒”，并非指每个人都像韩寒一样“少年辉煌”，而是指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位有独立思考能力，有健全人格的正常人。中国的民主进步事业任重而道远，不能把中国未来的前途和命运，寄托在少数精英名流或英雄身上。公民运动，才是推动中国走向民主进步的最强大动力和最可靠的保证。

“告别”韩寒，人人皆成为韩寒

李悔之 / 文

韩寒的《谈革命》、《说民主》、《要自由》三文推出后，这些天在网络上刮起了一股不小的旋风。斥为“五毛言论”者有之，痛心疾首者有之。更多人则陷于迷茫之中……有网友一再问我对韩寒三篇文章有何看法，我的看法就是“告别韩寒，人人皆成为韩寒”。

所谓“告别韩寒”，就是不再把韩寒当偶像，只把他当一个有独立思考能力，有健全人格的正常人。鄙人有一儿一女，小女与韩寒同年。但我也是一位“韩迷”。我之所以成为“韩迷”，并非羡慕韩寒之少年早成，也非仰慕“韩少”既是文人又作赛车手之风流倜傥，而是赞赏他“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赞赏他对功名利禄的淡泊：“不参加研讨会，交流会，笔会，不签售，不讲座，不剪彩，不出席时尚聚会，不参加颁奖典礼，不参加演出，接受少量专访，原则上不接受当面采访，不写约稿，不写剧本，不演电视剧，不给别人写序”——仅这一点，当今中国的精英名流又有几人能做到？

如果把一个人当偶像，就很容易迷失自我。经常读韩寒博客的人，相信都会有这样一个印象：前排好几十位的读者，都表露出一副红卫兵见到伟大领袖毛



全民狂欢——伟大领袖接见红卫兵

太阳时激动万分的神态“激动，竟是沙发啊”、“这是真的吗？”、“天啊，第一次靠这样前！”……而后面的跟帖评论中，真正有独立见解者同样少之有少。大多“韩迷”们围观韩寒，很难说是欣赏他的“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很难说他们究竟为什么为韩寒的高兴而高兴，为韩寒的叹息而叹息，为韩寒的悲怆而悲怆……总之，“韩少”的喜、怒、忧、思、哀、乐、惊，也是他们的喜、怒、忧、思、哀、乐、惊。韩寒俨然成了他们的人生风向标。这种现象是令人遗憾的。也是非常悲哀的。事实上，韩寒自己过去也曾经撰文，对这种现象发出“难于承受之重”之感叹。

更值得警醒的是：“韩寒不能承受之重”，并不只存在于年轻人之中。有些年长者虽然并不盲目崇拜韩寒，但却太在意韩寒的言论——韩寒言论合乎自己的观点时，他们则把他视为“同一战线”的同志，或“同一战壕的战友”。一言不合，他们又痛心疾首认为“背叛”了，“被收买”了。而事实上，坦言“不讲立场，只论是非”的韩寒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而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是永远不属任何“战线”的。同时，真正的自由主义者，绝非“永远正确”者。就如韩寒《谈革命》、《说民主》、《要自由》三篇文章而言，无论是文笔还是思想，都难说是上品。有些观点可能是正确的。有些观点也可能是模糊的，有许多观点甚至可能是十分错误的。对其观点的质疑乃至批评都十分正常。也是十分有必要的。但痛心疾首地认为“背叛”了，“被收买”，却是莫明其妙的。甚至是十分错误的。

事实上，韩寒三篇文章的真正意义，在于它引发了广泛的讨论——虽然在此之前，有太多的文人学者提出过太多更精辟的观点或见解，但因为缺乏“巨星效应”，所以，未能引发广泛讨论。就此而言，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这时，有人或者说：老李，你是否有点酸溜溜的？谁叫你不是巨星？鄙人的回答是：我并没有“酸溜溜”，但确实有一种怅然若失的遗憾：这些年，就“革命”、“民主”、“自由”的话题而言，包括鄙人在内的太多文人学者，不知发表过多少不乏精辟的见解。而且，不乏付诸于行动者。然而，却从来没能引起类似韩寒的关注。而对“革命”、“民主”、“自由”从来讳莫如深的韩寒，只一次谈及这个话题，而且是涉嫌“悲观失望”的话题，却引起高度重视。面对这样的现实，令人“怅然若失”也就在所难免了。

所谓“人人皆成为韩寒”，并非指每个人都像韩寒一样“少年辉煌”——每个人的成功模式都是不可复制的。而是指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位有独立思考能力，有健全人格的正常人——中国的民主进步事业任重而道远，不能把中国未来的前途和命运，寄托在少数精英名流或英雄身上。公民运动，才是推动中国走向民主进步的最强大动力和最可靠的保证。

“告别”韩寒，人人皆成为韩寒，这个民族，这个国家就会发生具有伟大建设意义上的“革命”。而“民主”和“自由”也就水到渠成了。



陈寅恪（1890-1969），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他所说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成为中国一代学者的人格理想。

（来源：引自“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220521>）

这次韩寒革命、民主、自由三论在网上遭到强烈批评，并非韩寒的思想发生了急转弯，而是中国的社会条件正在发生急剧变化，网上舆论的主流由过去那种轻松的讽刺调侃，正悄悄演变成沉重的愤怒与绝望。

民主政治离中国有多远？

——兼评韩寒《谈革命》、《说民主》与《要自由》

何清涟 / 文

中国必须实行民主，而且越早越好，这点已渐成国民共识。但如何实现？即国民愿意付出多大成本来达成民主政治，却莫衷一是。原因也简单，各阶层都有自身的利益考量。

感谢韩寒。有关革命、民主与自由的讨论，终因他的三篇博文而在中国互联网上闪亮登场。与中国 80 年代思想启蒙时期讨论革命与改革的关系，以及 90 年代后反思六四引发的“告别革命”思潮不同，这次讨论并非概念对决，没有陷入理论迷宫，讨论者的立论几乎都是对现实的一种直接回应。

是韩寒“蜕变”还是大众原本就误读了韩寒？

在此先廓清革命、民主与自由三者的关系。三者有关联，但其中只有民主政治是目的；革命只是实现民主政治的一种手段，而且是比较激进的手段；

个人自由既是民主政治奠基于其上的基础，也需要依靠民主政治加以保护。对韩寒文章的批评以及为其辩护的文章很多，但我认为上海财经大学副教授李健在微博中的点评最为精当：“韩寒的三篇博文《谈革命》、《说民主》、《要自由》，思想脉络很清晰：反对革命，担忧民主，讨要自由。”

有人认为韩寒发生了蜕变。我认为不是，多年来中国大众对韩寒一直有严重的误读。韩寒对中国这块社会土壤及其国民性有着一种可称之为绝望的感悟，也被迫学会了在极权统治下机智地生存，这次他只是将自己筹思已久的想法在这三个题目之下稍作归纳而已。他的某些结论，我与他看法一致，比如他说“相信天鹅绒革命其实就是选择相信了民众的素质，执政者的忍让，文人的领袖，这三者的共力才能形成天鹅绒革命，我认为这三者在中国全部不存在”。事实上，除了民众素质可以讨论之外，中国的执政集团对权力的肆意伸张之程度绝非本·阿里与穆巴拉克能比；知识精英对社会的影响近六、七年以来日见减弱。一些不缺少现实关怀及社会责任感的学者，其作用也被少数行动者与口头行动者大肆贬低。



2011 年 1 月，突尼斯街头防暴警察发射催泪弹，驱逐示威人群。由突尼斯城管“粗暴执法”，而引发的波及中东、北非的茉莉花革命，已直接导致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也门 4 个国家元首下台。

韩寒虽然是以个人身份在发言，但他的思想其实就是中国中产阶级的基本共识。现阶段，中产阶级大多依附于体制或者部分依附于体制。他们对自身缺乏自由深感压抑，对于政治腐败深感绝望，但对草根民主仍保持有少许肯定的怀疑态度——因“革命”在中国人的历史记忆里，就是以共产革命为模本的杀人如麻且以掠夺私人财与公共财为目的之农民革命。最近乌坎事件被广东总督汪洋用太极云手暂时化解之后，国内对汪督的风评甚佳，其声望一时大涨。从这点就可以看出，国内居于主流的意见还是希望中国实施开明专制，即韩寒期盼的有一定言论空间与个人自由的威权统治。

韩寒多年来对现行体制及诸多弊端的讽刺批评，始终就在这个范畴之内。韩寒言论之所以在中国广受欢迎，有其时代原因。那几年，中国社会矛盾还未全面激化，生活还处在上升通道的中产阶级正喝着卡普其洛、营造小资格调，畅想着未来的美妙生活。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社会，都对未来能自然演进至民主政治充满期待。只有在这种社会氛围中，韩寒才有可能因其那种哀而不怨的讽刺散文，成为21世纪零年代后期中国文化的一个符号。

这次韩寒革命、民主、自由三论在网上遭到强烈批评，并非韩寒的思想发生了急转弯，而是中国的社会条件正在发生急剧变化，网上舆论的主流由过去那种轻松的讽刺调侃，正悄悄演变成沉重的愤怒与绝望。与此同时，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态度也在改变。比如美国政界过去一直期望中国能够在对外开放与经济改革中“和平演变”至民主政治，但今年以来，美国政界也开始怀疑自己的这种期望不切实际，对中国能够“和平演变”这一预设打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这个问号的颜色正在变浓。

这一阶段大众对韩寒的误读，以及中国受众在与精英的互动中如何塑造精英的社会过程，是一个很有观察与研究价值的时代课题。

关于韩寒，我不同意他的观点基于两点，一、我认为，眼下的中国，使用任何可能的手段尽快结束一党独裁的专制政治，都有其道义基础。二、我知道，自由不是免费的，他则希望少付费甚至不付费。今年被卷入“阿拉伯之春”中的国家，除了突尼斯较为和缓之外，其他国家的革命（包括现在埃及正在发生的“二次革命”），在政治角力的同时，“剑对剑的谈判”从未缺席。

中国政治语境下的革命、民主与自由

检视中国十几亿人的希望与要求，应该说根据其所居社会层次的不同，占有的社会资源不同，各阶层与群体之间的希望与要求有所侧重甚至有很大的差别。比如现阶段普罗大众最需要的是社会分配的相对公正与公平，最急迫的事情是保障自己的生存权利；知识群体及中产阶级则希望有相对宽松一点的言说自由与结社自由。而在现有体制下，普罗大众得不到公正与公平，更无法保障生存权，他们这些权利也根本无法在虚拟世界里找到替代品；中产阶级及知识群体得不到的言论自由与结社自由，但在网络这一虚拟空间里，却可以找到部分的替代品，比如微博上有限的言论空间与虚拟的同类相聚。

但是，随着社会矛盾的积聚与爆发，当局维稳的缰绳在不断收紧。除了坚持“五不搞”的执政



“阿拉伯之春”，又称“阿拉伯觉醒”、“阿拉伯起义”，是指自2010年年底在北非和西亚的阿拉伯国家和其它地区的一些国家发生的一系列以“民主”和“经济”等为议题的社会运动，这些运动多采取公开示威游行和网络串连的方式，其影响之深、范围之广吸引了全世界的高度关注，从2010年底开始至今尚未完全结束。图为突尼斯示威者焚烧执法人员帽子以泄愤。

者及中毒太深者之外，但凡脑筋还不糊涂的人都程度不等地知道，只有民主制度能够保证普罗大众渴求的公正与公平，才能够满足中产阶级及知识群体希求的个人权利与自由。国人的意见分歧，主要集中在通过什么渠道建立民主政治。说白了，即大家愿意为建立民主政治付出什么样的成本。看清楚这点，才会弄清楚哪个阶层是中国求变的主力，以及这个阶层具有的求变能力。

中国的中产阶级显然现在不是革命诉求的主体。在中国现行体制下，进入中产行列与保住中产的位置，几乎是权贵之外的国人奋斗一生甚至拼上两代努力的结果。

中国人熟悉的共产革命以及太平天国革命是以洗劫社会、颠覆人类社会秩序为特点。如果有人能够成功说服国人相信中国革命只需要付出突尼斯那样死上百人的代价，革命也许不会让国人望而生畏。但在中国已有的革命经验观照之下，中国的知识人及中产阶级的主体在骨子里只能是权力的同盟者，即以要求社会稳定为其主诉。

中国的普罗大众有没有革命诉求？当然有，只是在不少人那里，这种诉求还比较模糊。由于中国社会严重缺乏正常上升通道，权力与资源近年来更是形成了代际传递的趋势，普罗大众通过读书改变命运的希望几乎全被掐断，在这一社会背景之下，这种诉求只要被引导，一遇到外在诱因则会形成爆发力。广东省副书记的谈话已经表明他认识到这种爆发力的可怕。与当年中共革命时需要“运动群众”，即向群众灌输革命理念时有很大不同，中国现行教育为了论证中共得国之正，灌输的全是“马克思+毛泽东”那套“剥削有罪”、“造反有理”的说教。

在开明专制体制（比如突尼斯与俄罗斯）下，民众有结社自由，这就能够让民众通过自组织整合其利益诉求，形成压力，逼迫执政者改弦易辙。中国的黑暗专制却用尽一切招术消释民众的自组织能力，各阶层连讨论交流的平台都相当缺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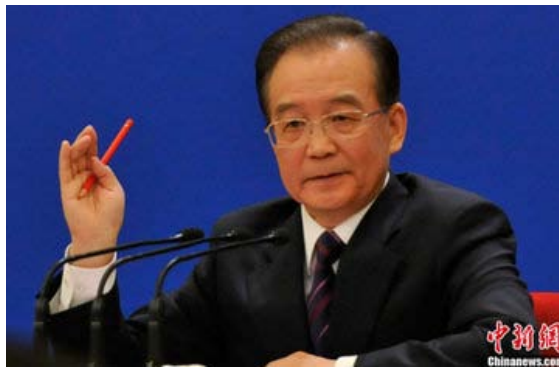
可能的前景与唯一可行的国家避险策略

国人期待（或者曾经期待）的“改良”一途，至今看不到希望。早在2008年，我就在“改革30年：国家能力的畸型发展及其后果”一文中谈到，中国政府早已经堕变成自我服务型的自利型政治集团。这种政治的特点是政府有如一架正在按惯性运作的巨大机器，每个成员只是机器上的一个部件。集团内部的部分清醒者虽然意识到危机逼近，也知道根源在哪里，但他们没有足够的能力去阻止机器的惯性运作。从去年以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曾数次就政治体制改革发表讲话，但对现实政治毫无影响，就是因为他个人没有能力阻止这架机器的疯狂运作。正因为看不到这种改良的希望，中国的精英及中产阶层才热衷移民，将其作为个人及家庭必备的避险策略。

这种以自我服务为目标的自利型政治统治不可能



毛泽东名言：“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只有一句话：造反有理。”图为文革时期宣传画。



2011年3月14日，温家宝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回答中外记者问时指出，改革是历史永恒的主题，政治体制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保障。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成功，已经取得的成果也有失去的危险。（中新网）

长久持续下去。目前大概也只有冬烘才相信“经济发展会促进民主化”这一假设。观诸历史，革命的爆发得依赖三个因素的成熟且交合：经济危机（尤其是政府的财政危机）的全面爆发；人心思变且对变革路径的看法大体达成共识；国际社会（即中共警惕的“外部势力”）的持续推动并在关键时刻强力介入。对于中国来说，非常残酷的前景恐怕是在革命到来之前，这种“溃而不崩”之局，已经将社会重建的资源消耗殆尽，掉入“失败国家”行列。

中国共产党虽然还未失去权力，但正在失去它的人民。在时间表允许的前提下，中共自救且救中国的最理想方式是：先通过局部放权建立开明专制，让社会拥有相对自由的言论空间与结社自由，渐渐放开党禁，在有条件的地区实行地方自治。只要有了这些条件，中国社会成为暴力温床（不止是革命，包括刑事犯罪的暴力蔓延）的可能性就会降低，中共退出历史舞台的方式也会温和得多。

（来源：引自中国改革论坛 <http://www.chinareform.org.cn/gov>）

很多人希望的集体性的启蒙，集体性的公民意识和素质的提高，其本身是对每个个体权利的不尊重，因为，每个人的理性的成长水平与其特殊的生活情境息息相关。换句话说，这种集体性启蒙的期待本身就怀揣着对个人权利的破坏，也就是一种“知识的专制”。

期待全民素质的质变 不过又是一种新的“专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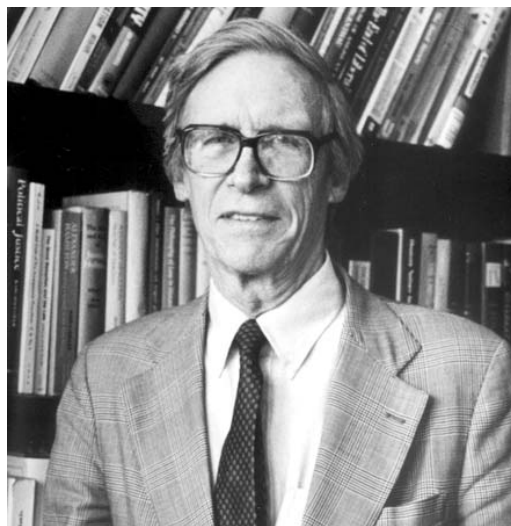
——韩寒博文引发争论后的一点思考

顾晓 / 文

韩寒博文一石激起千层浪，已是家常便饭之常事，这次关于“革命”、“自由”、“民主”之声即便不是振聋发聩，亦可谓掀起了中国文化界不小的波澜，而关于“素质与民主”，“启蒙与改革”的思考也是层出不穷。“民主需要国民素质的提高”，“自由的制度需要全民启蒙”的论调不胜枚举。我并不想去讨论其中的因果必然关系，而只是想说一说，所谓的“素质提升”或者启蒙本身，是否存在疑问。

要求每个公民达到一个程度的“素质”，公平吗？

罗尔斯的《正义论》中这样描述“公平”：人们认为封建贵族制度是不公平的，那是由于人们的生活前景由他们的出身所决定，人们没有“机会的平等”；罗尔斯接着表达，一个社会如果提供了“机会的平等”，那当然是一种进步，但即便如此，人们就是都有了“可以



约翰·罗尔斯（1921-2002），美国政治哲学家、伦理学家、普林斯顿大学哲学博士，哈佛大学教授，著有《正义论》、《政治自由主义》、《作为公平的正义：正义新论》、《万民法》等著作。

参与赛跑的权利，但是每个人的起点又有所不同（每个人的家庭，教育背景不同），因此这注定是一场实力悬殊的比赛。”那么，一个使得每个人从一个相同的起跑线出发（比如早期智力开发项目，对贫困学校的经济、政策倾斜等）的制度又如何呢？罗尔斯解答到，即便是这样的制度，即便每个人的起跑线都相同，那赢得比赛的人也必然是那个最具运动天赋的人！（即便是社会消除了财富，教育的不平衡，但许多不平衡自身却无法消除，例如先天的基因与能力）

这样的“赛跑”理论同样适用于公民素质的养成，先不说当下中国大陆的制度本身并不能够使得每个人获得平等的起跑线，即便是在一个完全公平的环境下，可以要求每个人都具有所谓的“公民意识”，也是不可能的。没有任何的利益诉求，要求普通民众去对制度性的，深层次的社会事件进行关注，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而去苦苦期待，甚至是苛求普通百姓素质的提升，本身就是一种不公平的行为。

无差别的要求启蒙只是一种新的“知识专制”

很多公共知识分子认为微博的出现仿若是一个新公民时代的到来，但事实上大多数的微博或者社交网络用户依然处于被“议程设置”的阶段——也就是说，只有集体关注的事情才会去关注，否则只会关注与自己的生活与文化相关的事件。

这其实并非一个不好的现象。相对于现实世界里的中国，web2.0时代已经赋予中国人更多的“平等的起点”，而表现出知识水平，思考能力的差异，是一个社会，甚至是人类社会本身就不能避免的问题。

罗尔斯提出过一个“文化结构”的概念，即每个人都有其特定的生存环境和生活情境，有不同的认识水平和思辨能力，而一个正义的社会应该保障这种“文化结构”的多元化，也就是说，既然因为每个人的“素质层次”在任何制度条件下也不可能达到一定高度的平等，那么各个知识阶层都应该是社会需要保护和包容的。正如哈贝马斯所言“若要正确了解（以个人作为基础而设计）的权利理论，就得保障生活的各种情境，因为个人的身份认同形成于其间。”

也就是说，很多人希望的集体性的启蒙，集体性的公民意识和素质的提高，其本身是对每个个体权利的不尊重，因为，每个人的理性的成长水平与其特殊的生活情境息息相关。

换句话说，这种集体性启蒙的期待本身就怀揣着对个人权利的破坏，也就是一种“知识的专制”。

谈了这么多，并不是说中国公民的素质不存在问题。但这些问题的产生，并不是因为公民个人，而是因为这一畸形的社会形态使然。而社会形态的改变，并不在于“乌合之众”们，而需要所谓的精英阶层的努力，但很不幸的是，这些中的大多数，往往只是对“未来”有更多的兴趣，都希望去改变世界，而不是解释我们的世界，希望解决问题，而不是发现问题，这才是最危险的，是一种“致命的自负。”



罗尔斯在《正义论》当中提出了关于正义的两条原则：一是平等自由原则，二是差别原则与机会平等原则，并指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他从公平正义入手，全面系统深刻地论证了自由与公平、个人与国家、机会与结果等广泛的社会政治问题，力图为现代西方社会重建“公平正义”的道德基础。

（来源：作者供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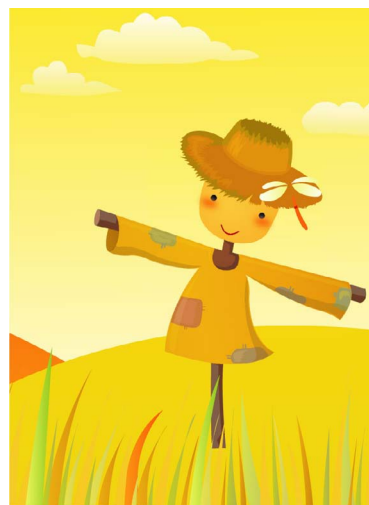
在民主造神运动后，一些人把它捧到天，一些人又把它打入地。这两种看法实际都陷入了极端，原因是错误地看待了民主，首先需要做的是把民主从“神坛”上请下来，民主既不是什么万能理论，也不是什么洪水猛兽，把民主当作一个正常的、普通的理论和制度来看待，这是在考察民主前的必要思想准备。

对宪政民主的一点思考

张翔 / 文

最近几年，我关注到国内出现了一股反宪政民主的思潮，支持和反对都是自由学术的题中应有之义，正常且必要。

很多国人在讨论民主问题时，往往喜欢做简单化极端化（极端往往是因为简单导致的）的处理，最典型的一个态度就是把民主当作万能理论，不论其定义域然后进行“沙文主义”式的推广，由此对这种“稻草人谬误”又产生了两种截然相反的结论，民主主义者雄心勃勃地试图以民主的万能武器改造“落后”的“旧社会”，试图通过民主就能极大程度地消除一切领域内的“消极腐败”；反民主者站在对立面通过各种所谓思辨、观察认为民主不好，民主不但不能解决现存的问题，而且会导致更多的问题，比如会引起天下大乱。在民主造神运动后，一些人把它捧到天，一些人又把它打入地。这两种看法实际都陷入了极端，原因是错误地看待了民主，首先需要做的是把民主从“神坛”上请下来，民主既不是什么万能理论，也不是什么洪水猛兽，把民主当作一个正常的、普通的理论和制度来看待，这是在考察民主前的必要思想准备。



稻草人谬误即指歪曲对方的观点使之容易受攻击，逻辑学上称为偷换概念，转移论题，其目的是树立一个更易反驳和攻击的靶子。

但很多对宪政民主的评价往往都是在误解或者歪曲宪政民主基本内涵的基础上做出的，并且没有看到民主制度本身也是发展变化的事实，例如有人将古代的直接民主制当作批判的靶子，将其错误地安装到现代民主制上，进行了错误的批判，更多人借口各种国情的理由拒绝宪政民主，宪政民主确实有很多需要批评反思的地方，但要批评宪政民主必须先要理解宪政民主的基本内涵。首先要明白宪政民主不是一种死板的制度，千篇一律的面孔和僵化沉闷的规范，这些本身不符合宪政民主的要义，宪政民主是一个过程，是一个不断改变自身、完善自身的过程。“现代”只是一个进行时，不可能是完成时，不仅是因为要面临自身理论的完善和对出现问题的深刻反思，还有基本原理和各种不同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的种种实践问题。宪政民主不可能也不应该是一种模式，这从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可以得到证明。从实践上看，宪政民主比较成熟的国家，也不是统一模式，如在政体上，美国实行三权分立的总统共和制，英国实行虚君议会制；在国家与地方的关系上，有一元的中央制，也有联邦制，在社会政策倾向上，有倾向自由主义的美国，也有社会主义很成熟的北欧。笼统地认为宪政民主是一个模式的看法不准确，所以认为美国民主是宪政民主的代表看法就是不准确的，宪政民主没有统一模式，何来代表？宪政民主有的只可能是基本内涵，因此，不能照搬照抄西方的民主制，如果理解成不能照搬某一种模式，这是正确的。

宪政民主的基本内涵

民主之所以会成为一个问题，是因为有国家公权力，如果没有国家公权力，仅仅是一般的熟人社会交往，交往规则可以通过契约、习惯法等比较有序的方式进行，发生争议和冲突时可以通过官府或法律解决，在社会公共事务处理之上有国家和法律，所以问题不大。只有对国家合法性（正当性）和法律的合法性本身进行思考时，民主才凸显为一个问题，法律是国家的法律，所以对法律合法性的考察，必须建立在对国家合法性考察的基础上。



民主起源于古希腊，经过不断演变经历了古代民主（直接民主制）、近代民主（代议民主制）、现代民主（宪政民主制）三大阶段。古希腊创造的民主意指人民的权力，当时城邦公民大会由年满20岁的全体男性公民组成，公民大会对国家事务有最高决定权。需要注意公民人数在整个人口里面的比例比较小，大概只有十分之一左右，妇女、奴隶、外邦人都不具备公民资格，古代民主仅仅是极少数“公民”享有的民主。

古代国家的合法性表面上来源于“君权神授”，操作上是通过暴力革命或宫廷政变的方式夺取政权，夺权后，统治阶级内部各级分享着差等有序的权力，下级统治者对上级统治者负义务，平民对官僚、帝王或国家负义务，统治者或国家对平民也有义务，遇到明君，政治清廉的时候，国家对平民负的义务就多一些，做的好一些。遇到昏君，恶君，政治腐败的时候，

负的义务就大打折扣甚至不负任何义务。评价“君权神授”是个很复杂很难下定论的事，这不是技术性的问题，而是存在论的问题，因为对于“神”的问题，不应该草率下结论，在学术研究中，有神论和无神论的独断论都不足取，对于宗教问题中那些“超验”的成分，那些无法证明也无法证伪的问题，正表明人类在某些问题上的局限性，处理这种局限性的严肃态度应该是持爱克斯都式的怀疑论，不下定论。所以在怀疑论看来，“神授”不应该作为合法性的来源，很简单，就因为说不清。

还有人说政绩合法性，政绩合法性也有很大问题，政绩只是政权合法性的必要不充分条件，是内容的合法性，而一种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则是规则的合法性，一个政权的政绩合法性只有在政绩不好时体现了对这种政绩不好负责才会有效，如果政绩不好，也就是说某种合法性丧失，却依然不负任何责任或不成比例的责任（比如文革、大跃进），那么这样的政绩合法性就是一句空话，这也揭示了制度合法性的一个内涵即“合法”意味着让“合法”的“合法”，让“不合法”的“不合法”，并有一套机制和文化保障得以执行。只有满足这个规则，谈合法性才有意义。对于无论合不合法都赖着不走，本身就丧失了合法性，那只不过是强权和欺骗。

所以合法性首先要为合法性提供规则，这有两种可能，一是上级统治者或统治者集团为各级统治者制定规则，违反的追究责任，这种办法本身有个问题，那就是各级统治者的合法性本身没有得到确认，那么由一个本身合法性待确定的东西去确认合法性规则，就不可能是合法的，除非预先假定整个统治集团是合法的，事后再检验，这同样会遇到很多理论上无法解决的问题：

(1)“预先假定”的合法性怎么合法的问题，这种情况除非是在没有好的替代方案，不得不“预先假定”不可的情况下，那么才可能具有一定的合法性。

(2)一旦出现不合法的情况，有没有办法处理不合法的情况。如果对于这个问题的处理变成了统治集团内部的游戏，估计要处理满意的可能性不大，这个从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得到了证明，首先从理论上，政治学中有两个原理很重要，一是阿克顿勋爵说的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绝对导致腐败；二是权力总只对权力的来源负责。对合法与否的考察首先必须来源于监督的有效和行动的有力，

统治者的权力如果不受独立于统治集团力量的监督，那么监督的效力会很有限，如果监督到了，无法采取有力的处理行动，那么也等于空话。

在统治集团内部权力与权力更有可能结合，结成集团向社会食租。很简单，权力结合比权力互相监督，当权者的收益更大，所以权力结合导致腐败就会压倒权力互相的监督与制衡。当然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斗争也是很厉害的，这种斗争也会供出不为人知的秘密，但是斗来斗去，如果权力已经与腐败发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斗争就是权力者之间的恶斗，斗争的目的说不定是为了更大的腐败，那个被牺牲掉的原集团分子，说不定只是为了攫取更大腐败的垫脚石。

假设有一位权威人物统治，他有足够的能力驾驭整个统治集团，如果权力是自上而下的授予，那么根据权力总会对权力的来源负责看，下级对上级负责就是常态，设想一种比较理想的状况，下级严格对上级负责，层层效忠，一直到最高统治者，这证明最高统治者的权力非常大，即使是这种理想状况，也有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那就是我们必须期待这个最高统治者是一个开明君主，否则权力越大破坏力越大，实际上对于开明君主这种事，永远也只能可遇不可求，那么把一种制度建立在可遇不可求的随机事件上，显然不具备合法性。在家天下已经几乎绝迹的当代，最高统治者在某种程度上不如过去皇帝的决心，因为他们没有皇帝的“私心”，何况对于一个腐败渗透进机体，病入膏肓的庞然大物，任何人也不可能有好办法，这就是中国历朝历代王朝更迭的主要原因。可见决定合法性是否合法的这一种办法不可能是有效的，它甚至导致更大的不合法，是在暴力和谎言的双重压力下的不合法，这种体制缺乏新陈代谢的能力，即缺乏使合法的合法，使不合法的不合法的能力，在道德衰落的时候，不合法事情会迅速猖獗，这种猖獗会加速这种体制的瓦解。如果体制不变，就会是一朝一代在革命中开始，在革命中消亡，陷入历史的循环，并且民众永远不能成为游戏的主角。在游戏中，民众是被任人对待的对象，高兴时给的东西叫施舍，叫皇恩浩荡，民众还必须鼓足了声音对其歌功颂德，用自由和尊严的代价，换了一点他们吃完肉后扔过来的骨头或残羹剩汤，尽管也可能很美味。震怒时，轻则实行“专政”，重则小命不保。在这样的体制下，法治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尊重，在这样的体制下，没有任何人会安全，包括统治者本人。为了使体制得以延续和巩固，就必须善用暴力、谎言、面包的策略，暴力威慑、谎言洗脑、面包引诱。暴力威慑敢于否定体制的人，谎言洗脑让人心甘情愿接受体制并制造表面繁荣，面包引诱一方面笼络体制内部，一方面安抚对体制有威胁的人。可这样的体制由于缺乏新陈代谢的能力，毒素的积累迟早会夺了它的命。

因此，政权“合法性”论证只能是：国家有权力征税并且有权力管理民众，这样的权力不来自于“神授”，不能来自于政权内部，那么只可能来自民众（如果不是，总不可能来自于别的），这体现了伦理学中基本原则之一的公正原则即权力与责任的对应，并且权力越大责任就要越大，来自民众的权力必须体现为 a. 民众授权；b. 民众有办法夺权，只有满足这两条，尤其是第二条，这样的授权才是有效的，这样的合法性也才有效（再次强调合法就意味着能让不合法的不合法，合法才有意义）；再根据“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绝对导致腐败”的原理，权力必须要被监督，被制约。为了保证以上这一套的顺利



阿克顿（1834—1902），英国历史学家，剑桥大学教授，曾担任《漫谈者》主编，策划和主持编写了卷帙浩繁的《剑桥近代史》，被当代的许多学者誉为“自由主义的预言家”，其格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广为人知。

实施，必须要法律的保证，所以宪政民主从理论上就诞生了，这些就是宪政民主的基本内涵。

综上所述，根据权力的合法性论证和权力对权力的来源负责的原理，政权的权力必须来自于民众的授权，为了使这样的授权有意义，民众还必须能有效的夺权；权力必须要被监督，被制约，权力要负责，权力越大责任越大。所有这一套通过法律保证，法律的修改也要通过严格的民主程序。

因此，为了保证基本内涵的实现，必须将其分解为各种目标，通过目标的达到而实现。理论上的论证必须要考虑到现实的技术性要求，否则不会是一个现实的理论，也就不会是一个好的理论，根据现实技术性要求，体现了民众授权和民众有办法夺权的办法就是定期的竞争性选举，体现对权力的有效监督和制约的办法就是独立于权力集团的监督和制约实体。在解决这个问题上，当代西方有很多值得借鉴的办法，如多党制、议会、新闻自由、分权、地方自治、军队国家化等等。

对宪政民主的几点误解

1. 民主与效率

很多人认为民主会降低效率，这个看法太笼统，在一些问题上，民主会导致交易成本的提高，但是这样的交易成本是必要的，一方面是体现行为的合法性，还有一方面从长远了看，会使历史的总成本降低，因为很多问题积累下去，会产生历史债务。其实，对于讨价还价的民主交易模式增加交易成本的问题，秦晖老师有过经典的比喻，他首先指出这是理论的误用，西方经济学中的交易费用理论是在保障参与人合法权利的基础上建构的，参与人的合法权利是前提，如果不考虑这个还谈什么交易，那么“抢劫”或许才是交易费用最小的模式，这显然很荒谬，而且民主的交易模式是可以兼容效率优先这种情况的，比如人们在多次博弈之后发现，他们并不需要这么多自由，而是希望更有效率的处理这件事，并且也充分相信掌握权力的这个人或机构，那么他们完全可以让渡自己的更多自由，授予他更大的权力，这就好比民主社会主义，公民希望政府拥有更大的权力担负更大的责任，自己宁愿牺牲掉更多的自由（比如允许政府征收高税收），但反过来就不行，专制的模式就不兼容民主模式。

2. 民主与稳定

很多人认为民主会导致不稳定，这其实也没有必然关系，反而民主能保证稳定，虽然民主不能保证每一个政权和每一次选举都是好的，实际上这个不可能做到，阿罗不可能定理和许多实践都给出了证明，民主根本上不是为了每一次选举，每一个政权都是好的，这样的梦想暂时只能在乌托邦里，但是民主制具有强有力的新陈代谢的能力，这样的能力能定期排除体制机体的毒素，这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这一点，所有的暴力革命都显得多余，因为民主制下提供了和平权力更迭的可能。而且，民主制下舆论自由，自由的舆论对维护稳定也是至关重要的，声音的多元，能够使人更多的去想，更少的去盲目行动，只有一种声音，煽动人做坏事的能力才是无可比拟的。这就是西方民主发达国家政治比较稳定的原因之一。



刘瑜：当代作家，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哈佛大学博士后，剑桥大学讲师。“不民主、不理性的高效决策，不过是通过把问题置后或者外部化来掩盖其社会成本而已，而社会成本在那里，迟早都是要还的。”（刘瑜：民主的细节）

我们需要做的是在民主化过程中使改革成本尽量降低，这需要整个公民社会的构建为基础，更需要自觉地去，否则当危机爆发，那就不是降低费用的问题了，而是必须承受住“割瘤之痛”。

3. 民主与国情

国情不是一成不变的，国情本身就在不停的发展变化中，国情不是拒绝民主的理由，国情只能是探索出适合自己民主的模式，但是这种模式不能违背民主的基本内涵，否则就是假民主。时下最流行的国情不适合说主要有：人口多、土地大、人口素质低等等，人口多土地大不适合民主的逻辑不成立，如果说是技术问题也不成立，因为民主是一个弹性机制，并不是一个固定的模式，比如选举，人口过多，就可以变直选为间接选举，但也不能太间接，必须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否则选举会失去意义，这样的技术问题应该允许自由研究，所以言论自由很重要。如果人口多土地广，还可以实现地方自治，地方自治能有效解决人口多对民主产生的技术困境。地方自治表现为地方事务由地方公民选举的政府和议会管理，政府和议会对该地方公民负责，地方不具备军权，只有日常事务管理权，地方与上级通过立法明确各自权限。详细可参考美国的市镇自治模式。人口素质低，也是一个不成立的反驳理由，人口素质可以提高，但是必须明白一个朴素的事实，抱着养的孩子长不大，人口民主素质的提高，只能在民主化的进程中得以实现。民主是一个从不成熟到成熟的过程。民主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循序渐进不代表慢，当然也不代表快）。

总之，宪政民主不同于直接民主制，它由古代民主和近代民主发展而来，它的基本内涵是公权力来自公民的授权，公民有权剥夺某一个政权的权力，公权力必须能被监督和制约。为了保证这些基本内涵的实现，选举制度、舆论自由、法治等等都是必要的制度。宪政民主没有固定的模式，在技术上只要能体现宪政民主的基本内涵都可以采用。宪政民主的最主要功能：保证政权合法性和提供新陈代谢的机制。

（作者供稿）



2011年5月22日，越南举行了5年一度的国会代表选举，选举继续采取直选方式，约6236万选民将选举产生国会代表500人，鼓励党外人士和自荐候选人参选国会代表，是本次选举的一大亮点。但外界认为，不公平的选区划分及严苛的候选人审查，让其民主性打了折扣。

票价与房价

编者按：

房地产、春运，两者始终牵扯着中国的脉搏，一静一动，代表着外来人口扎根大中城市的努力和寻找故乡归宿的旅途，相对应的是不同阶级的集体困境。买，还是不买？回，还是不回？两个现实得刺眼的选择正摆在绝大多数中国人的面前，无可逃避。

如今房地产行业已经渗透到国民经济脉搏的深处，房地产对人们的影响已经不再限于个人选择，而已然与国民经济密不可分。然而，房地产行业已经成为了以低效产能过剩为生的巨兽，本身也已成为最大的泡沫。未来是硬着陆还是软着陆，房产税是否可行，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与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如何博弈，中国经济何去何从，杜君立在《中国地产的末日传说》中向你一一道来。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比起未来的经济走向更迫切的是当下春运期间的归家难题。随着实名制的实施和多种订票方式的开通，今年的春运注定与往年的不同。以一封民工致铁道部的信在网上被广为转载为由，继而引发了一系列对网络购票公平性的质疑。不仅如此，实名制本身又不断地挑动着网民敏感的神经：我们实名制了，官员公开了吗？实名制要被滥用到何时？我们一同质问着，一同等待，一同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



一位民工致铁道部的一封信

铁道部领导：

我叫黄庆红，今年37岁，是重庆市彭水人，来温州打工十几年了。我只在电视上看过你，我想这辈子也没资格和你见面，可我有很多话想说。所以我写了一封信，但我不知道该寄到哪里，后来我想到了新闻，就托报社的记者捎上这封信。

我今天是第四次来火车站买票了，想碰一下运气，但票还是没有。窗口的工作人员每次跟我说，网络和电话的票要早几天，票一放出来，就在网络上被抢光了，没有票剩下来给窗口。

我晓得，铁道部的初衷是希望不要人挤人排队在窗口，所以搞了这个东西。现在，窗口的队伍确实短了，你们的压力也轻了，可以早点下班回家吃饭了。但对我们来说，原来通宵排队，还总有一点希望存在，现在，什么都没了。越想越生气，真想骂一声狗屁的铁道部！

我在温州郊区的一家五金厂开车，厂里40多个工友都不会弄电脑。老板同情我们，帮我们上网买票，结果他弄了半天也弄不起来，不是进不去，就是没票了。老板说，就算有票了，还得开通啥子网银。我们是打工的，又不是白领，哪会开通这个，这不是用脚趾头想出来的吗？

铁道部的领导，你们可以天天上网，要啥子买啥子，但我们不能啊，我们每天要为吃饭发愁。

我们又打那个订票电话。大家干活时一有空就打，下班吃饭时也打，却总是打不进去。40多个工友只有一个人打了好几天才打通，买到了一张去江西的票。那个工友开心得要命，我们都很眼红。买车票真像摸彩票啊。

前几年春运买票只要排队就行，来得早就有机会，拼的是体力，所以我都是凌晨过来排队。今年不一样，弄了个网络购票，对我们来说太复杂，太不切合实际了。其实这是非常不公平的，我们连买票的资格都没了。你们会说：“那很简单，你们把电脑学起来嘛！”可是，对我们这些一天从早干到晚的人来说，哪有这个时间去学电脑，哪里买得起电脑呢？

来温州十几年，我都是隔一年回家一次，春运买票实在太痛苦了。去年我没回家，在这里又没亲人，大年三十只能打电话听家里人讲几句。今年，我真的想回去。我的老婆已经提前一个月回老家了，当时就怕春运买不到票。家里60多岁的老父、老母也经常问我什么时候能回去。

我女儿今年6岁，好久没见到了，不知有没有长高，学会了几个字。回家的火车票190元一张，汽车票560元一张。我不想坐汽车，贵了好几百块钱呢，我平时都舍不得给女儿花钱，要是省下来的这钱给女儿花多好啊。

每年春运，排队买票，对我们农民工是折磨。今年我们想要这个样的折磨，也没有了。

你们待在空调房里，坐在沙发上，抽抽烟、喝喝茶，弄出个什么网络购票，你们有想过我们的生活吗，你们有体会过买票的痛苦吗？我们连想站几十个小时回家的票都没有，我们只有一肚子怨气，却没地方去发。

黄庆红

2012年1月2日

社会的发展进步，必然带来对公共服务更趋公平和更高质量的新期待。这是一场永无穷尽的公共服务能力测试，也是一个不断让群众得到实惠、共享发展成果的渐进过程。

农民工岂能被剥夺购票机会

锡太子/文

尽管今年的春运主题依旧是“一票难求”，但却呈现出不同以往的新特点。最大亮点当属铁道部开通网络购票。此举初衷便民利民，令人充满欣喜和期待。遗憾的是，网上抢购车票造成的巨大流量，引发网络塞车、服务器瘫痪等窘况，让本该赢得一片掌声的铁路部门承受着不期而至的抱怨和批评。

不满的声音里，有网上购票遇阻的网民，还有压根儿与网无缘的农民工。日前，一名在温州打工的重庆籍农民工在写给铁道部的信中，用质朴而激烈的言辞表达不满，指责网络购票挤占甚至剥夺了没条件、不能使用网络者的购票机会，让本已弱势的群体雪上加霜。

听到这样的意见，感觉最委屈的恐怕是铁路部门。毋庸置疑，网络购票的开通，是拓宽购票渠道、方便群众购买的惠民善举。而实际反应表明，好事要想办好，赢得一致好评，并不容易。

购票网站的页面设计是否简单明了，后台的硬件支持是否强大可靠，带宽的标准是否足够使用，取票的过程是否便利快捷，都会影响到网络购票的服务质量。从更广的范围看，有限票源在不同购票渠道的分配是否公平合理，如何保障能力有限群体的购票机会不被挤占，则更是关乎公共服务是否公平的宏大主题。

把好事办好，怎一个“难”字了得。可这是“国情”，是我们考虑问题、谋划事情、开展工作必须面对的现实。经济转轨、社会转型、思想多元、利益多样、地区不同、行业差异，使得我们这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里的种种社会问题更加复杂。网络购买火车票遭遇的尴尬，既暴露出铁路部门准备不足、应对不力等问题，也给公共服务的复杂性做出了鲜活注解。

无疑，这样的难题是对公共服务部门以人为本理念、智慧与能力的新挑战。以人为本核心在“人”，包括了不同地区、行业和层次的“人”。当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成为政府目标和社会共识的时候，承担社会管理服务职能的部门就必须在工作中倾听各种声音，对不同群体的差异化需求有充分考虑，并体现在制度设计里，践行在工作过程中。全面掌握现实情况，科学思考应对方法，认真听取群众意见哪怕是抱怨，以闻过则喜的态度，严谨求实的作风，把事前的准备做足，事中的工作做细，事后的改进做实，就能真正把惠民利民的事情做实办好，得到各方广泛认可。

春运正在进行，服务仍待改善。社会的发展进步必然带来对公共服务更趋公平和更高质量的新期待。这是一场永无穷尽的公共服务能力测试，也是一个不断让群众得到实惠、共享发展成果的渐进过程。



《不知所措》 新华社发 蒋跃新作

(来源：作者授权。博客地址：<http://blog.163.com/xitaizi@126/blog/static/9139004220120781746442>)

网络购票之所以陷入窘境，和铁路部门服务意识落后密切相关。网络购票不仅没有为旅客提供更多便利，车票也没有比以前更容易买到，说不客气点，铁路部门开通网络购票，更多是为了搞形象工程，而不尽然是为旅客提供服务。

网络购票，想说爱你不容易

魏英杰/文

网上购买火车票，眼下简直成了一个笑话。

笑点之一：铁路部门建议广大旅客，当通过网络购票遇到不便时，可采用电话订票等其他方式购票。登陆铁路客户服务中心网站，也可看到一行不断滚屏的字幕，就是这个提醒。这是啥意思呢？就是说，当你得知可以网络购票，且好不容易登陆网站了，却发现入口处竖立一块牌子，告诉你“暂勿入内”。

笑点之二：有媒体推出购票攻略，提醒购票者最好去大型网吧，网速至少要在2M以上，可以请朋友多开几台电脑，增加“中奖率”。以前买火车票，比拼的是时间和耐力，如今这些麻烦一样没少，还得比拼网速。这真是让人哭笑不得。这种不是段子的笑料，还可以继续罗列下去。所有这些现象，都反映了网络购票目前的乱象。

看来，对于网络购票，想说爱你还真不容易。针对这些问题，人们肯定要批评铁路部门准备不足、办事不力。这些批评当然是有道理的。一个购票网站搞得这么差，动不动就陷入瘫痪，其中一定有事前准备不足的原因。但还必须说，仅仅如此的话，还不至于造成这么糟糕的局面。因为目前网络购票所存在的问题是全方位的，包括网站设计、注册要求、购票流程、取票退票方式，都非常不人性化。一个铁道部客户服务中心网站，看上去还比不上一家普通网上购物站点，这除了准备不够充分，难道就没有别的原因？

依我看，网络购票之所以陷入窘境，还和铁路部门服务意识落后密切相关。铁路部门为什么要推出网络购票？当然是为了给广大旅客提供便利快捷的购票方式，缓解“一票难求”难题，以及减轻旅客的排队麻烦。但是你看，网络购票不仅没有为旅客提供更多便利，车票也没有比以前更容易买到，而且该排队一样还得排队（取票环节）。从这点来看，只能说铁路部门根本还没有真正把顾客需求放在首位。说不客气点，铁路部门开通网络购票，更多是为了搞形象工程，而不尽然是为旅客提供服务。

相较于近年来高速铁路的迅猛发展，更可看出铁路部门在软环境建设方面的滞后。近些年来，国家在铁路运输上投入了数万亿元资金，一条条高速铁路建成通车，一座座崭新的候车大楼拔地而起。与此同时，关于铁路运输服务的种种抱怨和不满并未销声匿迹，反而不时成为舆论热议话题。例如，



“人票证不统一”及重复订票导致银川火车站日退票量达千余张。（新华社）

许多地方的候车大楼远离市中心，给旅客造成极大不便。又如，列车服务仍延续以往套路，卖高价水、高价食品，让人难以消受。不言而喻，这些问题都与铁路运输部门的服务意识薄弱有关。

这么说吧，中国铁路运输的硬件水平即便已经赶上发达国家，其服务意识也仍停留于计划经济时代。只有从这个角度去看新近推出的网络购票服务，才会明白种种问题的根本所在。这也同样可以解释，铁路部门电话订票服务推出那么长时间，何以还存在那么多不如人意之处。只要明白这一点，至少在三两年内，人们完全不必对网络购票抱以过高期待。

当然，我相信只要加紧改进，网络购票会逐渐成为广大旅客的主要购票方式。但这并不意味着，铁路部门只要抓好技术改造就可以了，这说到底也不算太难。对于铁路部门来讲，更为迫切的问题是如何调整理念，真正把顾客放在首位，进而下大力气去改善服务，提高顾客体验。如果说，网络售票还在试运行阶段，人们应该多给点鼓励才对；服务意识落后却是铁路部门的老大难问题，因此公众有必要再多给它点压力。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博客地址：<http://weiyinjie.i.sohu.com/blog/view/200732608.htm>）

自2012年1月1日起，火车票实名制全面实施。随着春运的到来，客流量的不断增多，火车票实名制的弊端也不断显露。以下是笔者所总结的“火车票实名制”实施以后，人们常见的五大问题，如有不足还望读者补充。

火车票实名制实施后的五大弊端

王潘生/文



火车票实名制第一大弊端，丢票后无法补票

刚刚在网上看到一则贴子，其内容如下：

几日前买了四张1月8日从兰州去往深圳的火车票，是实名制的，不幸丢失，前往兰州火车站值班主任处办理，本来想既然实名制了就可以像飞机票一样用身份证补办一下即可，没想到的是：1、主任答复退火车票必须要身份证，所以别人退不了。2、此火车票没有我们的身份证别人上不了车。3、我们没火车票也上不了车。4、此票在系统中已打出，不能再补打，开购票证明也不行。5、我再出钱买票也不行，因为电脑里显示你已购票，一个人只能买同次车票一张。6、当时8号还有软卧票，但你也不能买。7、可以买7号或9号的票，但没有票。8、这是铁道部的软件和制度，再无法操作。结论：只能改坐飞机出发。

这便是火车实名制的第一大弊端。因为火车票丢失无法补票，当事人无法再坐火车，而其他买不到此列次车票的乘客也只能干着急。令人气愤的是，因为有人丢票，列车上竟有空铺或者空座。若是

丢票的乘客有急事在身，那只得乘坐飞机了，可农民工和大学生丢票去哪弄钱坐飞机呢？

火车票实名制的第二大弊端，农民工朋友们买票更难

因为铁道部开通了电话订票、网上订票等订票方式，所以许多上班族、学生就很容易购得火车票。然而，这对于农民工而言无疑是吃亏的。火车站一放票，就有大量的非民工通过电话或者网络订票，一瞬间，火车票被他们订购一空。即使你排在火车站售票窗口的第一位也无票可买（这里有点夸大其词，但道理大家是明白的）。所以，笔者建议，不仅要把不同的订票方式交错时间开放，更应该限制网络订票与电话订票的数量，以给广大农民工兄弟预留火车票，使常年漂泊在外的他们能够与家人相聚，过个春节。



1月8日，长沙火车站，铁路警察协助旅客“传送”孩子。（网易网）

火车票实名制第三大弊端，学生为何能用一张身份证购两张火车票？

这件事发生在我同学的身上。之前，他在学校订了票，学校以班级为单位把订票学生的名单交给了火车站。之后，有人说学校没给他们买到票。这下他们着急了，我朋友再得知小道消息的第二天凌晨4点钟从学校出发，6点钟到达火车站买票，排了7个多小时的队，他终于用身份证买到了票（是同一天的统一列车）。然而，几天之后学校称，校方成功为99%的学生买到了火车票。得知这一消息后，我同学很无奈，7个多小时，寒风中排队买来的票要被退掉了。可笔者想不通的是，一张身份证不是只能买一张火车票吗？铁道部不是已经锁定了购票者的身份证吗？难道这对大学生不起作用？

火车票实名制第四大弊端，订票网站常常处于瘫痪状态

因为铁道部开通了网络订票，所以许多熟悉网络的购票者就选择了网络购票。这种购票方式即省时又省力。然而，此种购票方式，导致前段时间购票网站瘫痪。所以，笔者建议，铁道部应尽快加强购票网站的维护和管理。以预防购票网站再次瘫痪的现象上演。

火车票实名制的第五大弊端，个人隐私信息容易丢失

以前废弃的火车票，我们可以随手将其丢掉。然而现在我们在丢火车票之前，必须要把火车票撕毁，撕碎才敢丢。以防止自己的身份证号、姓名被他人盗用，进行诈骗或者其他犯罪行为。所以笔者建议铁道部尽快采取措施，保护广大火车乘客的隐私安全。

以上是笔者近来细心阅读有关火车票实名制实施以来的新闻，所总结出的几大弊端，但这并不意味着火车票实名制应该被唾弃被取消。火车票实名制为新政策，它的出台，有力的打击了“黄牛党”，也为许多乘客购票提供了方便。然而，新政策还有其不完美之处，所以笔者再此提醒，希望新浪推荐，希望铁道部接受意见，完善政策，为广大乘客提供更好的买票环境和乘车环境。

（文章博客地址：http://blog.sina.com.cn/s/blog_63a4c6870100we10.html）

网络订票，看上去很美。犹如画饼充饥，渴望而不可及。对民工而言，网络购票比通宵排队购票更不现实。

实名制让我更怀念“黄牛党”

何华/文



春节临近，一票难求仍困扰着数以万亿、身在异乡打工一族，已成为困扰中国最大的社会现实问题。西方人过圣诞，中国人过春节，那是一年中最重要节日。

中国人重视春节，盼望回家团聚。不管远在天涯海角，不管在外干什么营造，辛苦一年，春节是一定回家的。父母的牵挂，妻儿的期盼，回家过年是绝大多数在外打工人的想法，只是，一张车票让无数人纠结。

运营不足成了最大结症。于是，人们将愤怒的口水喷向铁道部。

每年春运，春节买票，对农民工是折磨。每天早早起床，冒着刺骨的寒风排队，运气好的还可以挤进沙丁鱼罐头一样的车厢，忍受旅途的煎熬，但相较于回家的喜悦，这些都无足挂齿；但运气差的，爱冷受饿不说，还独自承受异乡过年的冷清和孤独。

以前，买不到票怪黄牛与内鬼勾结，垄断票源。这次，铁老大突发奇想，玩起了电话订票、网上订票的新游戏。

网络订票，看上去很美，效果不咋滴。犹如画饼充饥，渴望而不可及。

别说农民工，就连我等买票都是难上加难。电话打不通，网络堵塞了，摊了。

实名制买票，仍然一票难求，让我更怀念黄牛。

以前买票，天不亮，人们冒着刺骨的寒风，排起了长龙，几天几夜的厮守，还是买到了那张返乡的通行证。你要不想排队，只要在车站附近转两圈，只要舍得花钱，从黄牛手上还是可以搞到高价票的，现在，电话打爆、网络进不去，还是为一张小小的车票犯愁。

在信息大爆炸的今天，网络订票看似与时俱进，但仍然无解。对千千万万的农民工来说，电话打不通，上网不会，网络和电话比通宵排队更不现实。农民工陷入购票难的困境。于是，有人不干了，重庆籍民工黄庆红致信铁道部，称其4次到火车站排队买票未果，工作人员称使用网络或电话购票比排队快，但对民工而言，网络购票比通宵排队购票更不现实。黄庆红称，民工是春运潮主力，他希望多留一部分火车票到售票窗口。

黄庆红讲述了他来温州打工十几年的艰辛，以及每年春运回家买火车票的困难。他在信中说，回重庆火车票190元一张，汽车票560元一张。“我不想坐汽车，贵了好几百块钱呢，我平时都舍不得给女儿花钱，要是省下来的这钱给女儿花多好啊！”

去年是铁路部门服务改革年，从电话订票、网络购票，到火车票实名制，不仅让市民足不出户在家里就可以购买到火车票，还为广大市民购票提供了一个公开、公平、公正的售票环境，对于打击黄牛党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然而，电话订票、网络购票属于新鲜事物，对于熟悉流程的购票人来说，十分轻松、方便。但黄庆红在信中坦言，由于文化水平的差异，这些新事物，对于许多农民工而言，反而增加了难度。正如

他所说：“网络购票，对我们来说太复杂，太不切合实际了。我们连买票的资格都没了。”“每年春运，排队买票，对我们农民工是折磨。今年我们想要这样的折磨，也没有了。”

重庆农民工黄庆红的困惑，相信也是大多数在春运期间，望票兴叹的广大农民工们的心声。在春运期间，返乡农民工应该是春运潮的主力，但他们却大多不太了解网络，更不了解网络购票。

黄庆红给铁道部的来信，经媒体报道后，一时，在网上汇成口水的海洋。

“千呼万唤始出来”的网络购票，没想到在春运刚刚开始，就受到了舆论的广泛质疑。支持者认为，它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打破了传统意义上的窗口购票模式，为民众节约了精力与时间。而反对者则认为，在网络还未普及到农民工阶层的现实语境里，网络购票缺乏最基本的推广条件，这势必会造成新的不公。

俺不明白，为何一个原本的便民新政在执行过程中为何如此弱智？买票难的结症究竟在哪？

在一个买菜刀都要实名的国家，那些政策制定者，异想天开、不切实际，屁股决定脑袋，他们成天坐在办公室里闭门造车，被所谓的狗屁专家忽悠，在制定政策前，他们去过基层作过认真的调研吗？又谁想过用制度和良心帮农民工买一张回家的车票呢？

乡愁是一张小小的车票，父母在故乡，我在异乡；乡愁是一张小小的车票，妻子在那头，我在这头；乡愁是一张小小的车票，黄牛党在里头，我在外头……他乡与故乡被无情地撕裂成时代无法愈合的伤口。

“床前明月光，电话网络忙，举头望明月，底头思黄党！”春运是中国社会的缩影，读懂了春运，你就读懂了中国，希望春运让我们看到更多的是和谐，而不是阴暗。

电话网络购票让我更怀念“黄牛”。起码，在他们手上还能买到车票，哪怕高价。

（来源：作者授权。博客地址：<http://blog.sina.com.cn/s/blog-5d1021bd01012ceev.htm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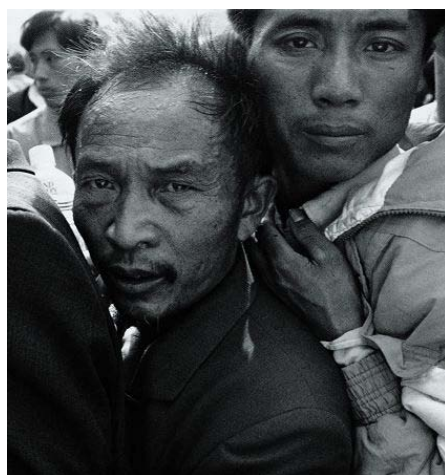
春运伊始，当对故乡的所有愁绪，都凝结到那张窄窄的车票中的时候，无数远离故土，在城市奔波流浪的人们，他们的精神出路，便只剩下“回家”。

春运如何打通乡愁的出路

李妍/文

“有故乡的人回到故乡，没有故乡的人寻找天堂”，这是熊培云在《一个村庄里的中国》里说过的话。春运伊始，当对故乡的所有愁绪，都凝结到那张窄窄的车票中的时候，无数远离故土，在城市奔波流浪的人们，他们的精神出路，便只剩下“回家”。

是的，回家，就在此刻。也只有在万家团圆的新春，回到故乡，才能找回自己的精神家园。对



为回家一票难求，广州火车站前排队的民工 转自东莞阳光网

许多远离故乡的人来说，“回家”这样的字眼，往往能熨帖无数身体与内心流浪者的心灵，但这种“回家”的温暖，有时往往又显得太过奢侈。“回不去了”，不仅是那些故乡沦陷者的慨叹，更是欲回故乡而不可得的人们，心酸无奈的内心表达。

就在前几日，《温州都市报》就刊登了一个名叫黄庆红的重庆籍民工写给铁道部的一封信，黄庆红在温州打工多年，今年春运实行实名购票制以后，他4次到火车站排队买票未果，工作人员称使用网络或电话购票比排队快。但黄庆红却称，对民工而言，网络购票比通宵排队购票更不现实，“每年春运，排队买票，对我们农民工是折磨（磨）。今年我们想要这个样的折磨（磨），也没有了”。



1月8日，一名准备上车的旅客。（网易网）

读这样一封渴望回家的信，是让人心酸的事。“稚子牵衣问，归来何太迟”，不仅是信中黄庆红对女儿的深切想念，更是乡愁郁积之下，却只能慨叹“回不去了”的无奈落寞。“春运时，乡愁是一枚窄窄的车票，我在这头，故乡在那头”，正是在这种乡愁的召唤下，“火车票实名制”在公众千呼万唤之下始出来，但落地到现实中，“一票难求”的困境却依然是无法改变的春运的真实格局。

黄庆红的问题，代表着火车票实名制施行之后，农民工普遍面临的购票问题。实名制购票之后，网络与电话购票成为一种必要的购票方式，但囿于知识结构与技术条件的局限，农民工往往无法通畅地使用上述手段购票，而当他们试图通过售票窗口购票时，却发现票已经通过网络等多种渠道卖完了。不仅如此，网络及电话购票本身，也在现实操作中存在诸多问题，比如网上售票系统“登录难”、“网站网速慢”、“购票时间长”、“余票不能查询”、“票没订上，钱却被银行扣走了”、“网站没票，但是代售点却有票”等。

提出这些问题，当然不是说实行购票实名制成效不彰，而是在实名制初次试水的春运大考之年，公共交通部门如何通过更完善的细节服务，打通人们的回乡之路，依然考验着铁路部门的智慧与耐心。毋庸置疑，实名制实行之后，黄牛党很大程度上得到抑制，人们普遍怨声载道的购票公平问题，通过这种模式得到改善。但公平与效率却也像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当我们通过实名制获得了购票的公平时，却发现在购票效率方面又出现了新的问题。比如网络、电话购票依然不够顺畅便捷，比如如何保障那些无法通过网络、电话买票的人群的购票权利。这些实名制带出的新问题，就需要公共交通部门用细节服务打通关节，让购票效率得到最大程度的提高。

当然，“一票难求”最根本的肇始，依然还是供需矛盾——铁路运力无法运输当下乘坐火车的人群。而供需的巨大落差，显然不仅是简单增加铁路运力那么简单的问题，还更需要铁路系统各个区域之间，乃至公路、水路、航空等各个交通领域之间相互协调均衡，使公共交通资源得到最大最合理的配置。如此，才能让置身乡愁中的人们，找到通往故乡的路途，快速并有尊严地回家。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 博客地址：http://blog.sina.com.cn/s/blog_53fa4af90101010cc1.html）

10年来，中国地产狂飙猛进，酿成一场无远弗届的经济灾难、政治灾难和文化灾难；作为这场中国灾难的始作俑者，注定逃脱不了一场末日审判。地产的每一轮暴涨都脱离了房价的基本面，为日后的下跌积聚动能，上涨预期下的楼市繁荣完全是一场“金融传销”。



中国地产的末日传说

杜君立/文

●如果告诉中国，不要向往第一世界国家的生活水平，中国当然不能容忍这种态度。但是你要第一世界国家人民放弃他们如今的生活水平，他们也不能容忍。那么大家都过上“穷奢极欲”的生活呢？地球又不能容忍。

●中国飙升的房价通过从制造业转移而来的钱而被炒起来，仅仅是助长了中国的“泡沫经济”，中国的制造业将是它发展的尽头。因为制造业领域所面临的两大难题，第一是跨国投资环境的恶化，第二则是严重的产能过剩。

●房地产带动了汽车、装修、建材、家具、家电、园林和基础建设；一旦地产停摆，这些行业也将面临着雪崩的危险。

●如果说如同战争一般的房地产狂潮是一场社会财富再分配的话，那么在后地产时代的物业税则是另一场财富大洗牌。

两年之前，一部好莱坞电影风靡全球，《2012》——这个出自灾难片大师罗兰·艾默里奇的视觉大片在当年中国和世界票房榜上独占鳌头，“《2012》讲述是一种可能性，地球会不会在2012年迎来他的终点，如果是真的，人类文明何去如从？”在许多故事和传说中，马上就要到来的2012年无疑是一个诡异的年份。天体物理学家指出，地球与太阳的磁极将在这一年发生颠倒；根据日食—厄尔尼诺系数理论，这将可能引发地球生命的毁灭。在古老而神秘的玛雅传说中，2012年12月21日将是人类文明结束的日子。这个神秘的预言在西方世界广为传播，《2012》就是对这个玛雅预言的夸张演绎。

古老的玛雅历法认为，地球生命有5个太阳纪，分别遭遇人类的5次浩劫：第一个太阳纪是洪水浩劫，世界遭受大洪水；第二个太阳纪是风蛇浩劫，建筑物被飓风摧毁；第三个太阳纪是火雨浩劫；第四个太阳纪是地震浩劫；第五个太阳纪就是世界末日，太阳会消失，大地剧烈摇晃，灾难四起……当第五个太阳纪来临，地球会彻底毁灭，按照玛雅历法为3113年，换算成耶稣纪元的公历便是2012年12月21日。

所谓中国崛起

在电影《2012》中，美国政要面对即将修建完成的诺亚方舟赞叹道：“这么艰巨的项目交给中国是对的，没有人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能比中国做得更好。”这句台词在中国影院中引发了观众们的狂笑。

作为《枪炮、钢铁和病菌》的姊妹篇，《崩溃》一书的副标题是“社会如何选择成败兴亡”，贾雷德·戴蒙德在书中用大量笔墨来分析中国的现状和未来。即使有危言耸听之嫌，但戴蒙德的话绝非杞人忧天，更像是一部“盛世危言”。

他提出两点：一、中国的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是世界性的问题；二、如果中国人也想过上发达国家人“穷奢极欲”的生活，那么地球就要崩溃。戴蒙德将中国的环境问题归为6大类，即空气、水、土壤、栖息地破坏、生物多样性消失以及超大型工程。因为污染，中国城市居民平均血铅浓度几乎是世界其他地区的两倍。每年因空气污染而导致的死亡人数大约30万，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烟草生产和消费国，每年中国大约有73万人死于抽烟。

加入 WTO10 年来，中国经济在后发优势下，依靠全球化经济分工体系，一直在“大规模快速增长”。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煤炭生产国和消费国，中国也是世界上化肥生产和消费最多的国家。自 1981 年以来，中国的化肥使用量增长了 5 倍，每亩农田的化肥使用量是全球平均值的 3 倍。中国农药生产和消费位居世界第二，占全球农药消费量的 14%，是农药净出口国。此外，中国还是世界上最大的钢铁生产国和水泥生产国。在过去 20 年里，中国的钢铁、钢铁制品、水泥、塑料和化学纤维产量分别提高了 5 倍、7 倍、10 倍、19 倍和 30 倍，而洗衣机的产量则增加了 34000 倍。

随着肥胖病的增多，中国食肉者也越来越多。猪肉是中国首要的肉制品，牛肉、羊肉和鸡肉等产品的消费量也快速增长，而中国的人均蛋类消费早已与第一世界国家等同。动物类食品人均消费量在 30 年间翻了几番，这意味着粮食消耗和农业废弃物也随之增加，因为每生产 1 斤的肉食就需要 10 或 20 斤的粮食或植物。中国也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玉米进口国。而饲养动物所产生的排泄已经远远超过工业废弃物，更加重了对土壤和水资源的污染。

在 2010 年，天灾人祸中的海地让全人类提前看到了世界末日，人们怎会相信它曾经是地球最为繁荣富裕的殖民地，而且它第一个取得独立。中国用全球 7% 的土地，养活了全球五分之一的人口。这是绝大多数中国人耳熟能详的事实。但很少有人提及另一个事实：中国占全球 7% 的耕地，消耗了全球 35% 的氮肥，单位面积上的磷肥和钾肥使用量也是世界平均水平的 2 倍多。从 1984 年到 2007 年，中国的粮食产量增长 21%，但化肥投入增加了 3368 万吨，增长 200%。中国的粮仓东北，农业正在陷入对化肥的过度依赖。农民的化肥用量，逐年增加，不仅造成了土壤土质的恶化，而且某些化肥所含有的重金属，正在威胁人类的安全，而过度使用的化肥，也使水和空气的污染加剧。实际上，化肥的边际效应在逐年递减，但农民对于化肥就像吸毒一样，产生了依赖，欲罢不能。在不久的将来，随着土壤的进一步被破坏，东北这个粮仓，将出现大范围的危机。换言之，粮仓将有崩解的危险。中国农业问题专家党国英说：“中国目前粮食高产主要是依靠化肥、农药，依靠地表水和地下水灌溉，为此我们付出了极大的环境代价。”

随着中国交通的提速，灾难与成本也在迅速上升。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轮子上的中国，机动车保有量超过 2 亿辆。根据官方统计，每年因车祸死亡者达到 10 多万人，受伤者有 100 多万人。平均每天要用 300 个中国人的身体和生命来祭拜轮子。尽管中国的汽车保有量只占全世界的 1/18，但每



贾雷德·戴蒙德，加利福尼亚大学医学院教授，主要研究生理学、演化生物学和生物地理学，被选为美国艺术与科学院、国家科学院院士、美国哲学学会会员，曾获得麦克阿瑟基金会研究员基金及全国地理学会伯尔奖，在《发现》、《博物学》、《自然》和《地理》杂志上发表过论文 200 多篇。

年车祸死亡人数占全球的 1/5。中国的车祸死亡率已经连续 10 多年保持世界第一，中国以世界 3% 的汽车保有量，制造了全球 16% 的死亡人数。中国城市每万辆车死亡率是美国的 17.8 倍。在过去一年，小悦悦事件和甘肃校车事件引发全社会关注。

北京的机动车数量超过 500 万之后，首都不仅变成了“首堵”，汽车排放的废气污染在 2011 年的冬天发展成为一场社会事件。对很多人来说，空气污染唯一的好处是污染面前人人平等，即使你是身家亿万的老板，

或是身居要职的高官，在一个重度污染的环境中，你也必须接受这种看不见蓝天的囚禁。或者说，除非你乘坐直升飞机，那怕是悍马或宝马，也照样得在路上“卧着”。面对未来，中国还将会生产更多的汽车，也会有更多的土地被改造成公路兼停车场。无论是在路上或者在家里，你都必须呼吸汽车排放出来的尾气。



北京堵车盛况

从经济结构来说，所谓中国模式可以归纳为“廉价劳动力+投资+加工制造+出口+外汇储备=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作为世界工厂，中国的出口工业将制造成品运往国外，污染物则留给自己，而且这种现象正在变本加厉。贾雷德·戴蒙德指出：“如果告诉中国，不要向往第一世界国家的生活水平，中国当然不能容忍这种态度。”但是你要第一世界国家人民放弃他们如今的生活水平，他们也不能容忍。那么大家都过上“穷奢极欲”的生活呢？地球又不能容忍。可以说，环境问题，资源问题，发展问题，归根到底都是关于人类未来的最大的政治问题。值得赞赏的是，作为世界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中国正在转变态度，开始接受相应的减排义务。

美国总统奥巴马曾经说过一句实话：“缺乏自由的繁荣是另一种形式的贫乏。”中国政府为此反驳道：“希望有关国家尊重各国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毫无疑问，经济增长是一个社会繁荣的基础，但如果经济增长的成本过高、代价过大，这种弱肉强食的繁荣与杀鸡取卵的暴富只会带来巨大的社会不公，从而出现崩溃的危险；这种饮鸩止渴式的所谓增长其实是不可持续的。一旦中国的经济真的开始崩盘，它内部的纷争会使整个国家陷入混乱。根据孙立平教授的说法，去年中国有多达 18 万起抗议和骚乱（官方称为“群体性事件”），平均每天 500 起。

《谎言帝国：21 世纪的中国真相》一书的作者、法国政治经济学家居伊·索尔曼指出，中国的最大变化不在于经济的层面。自由市场的发展如果没有和自由思想的进程同步，那么经济的发展将是毫无意义的。在某种程度上，中国模式现在已经走到一条死路。因为任何增长终究会到达一个瓶颈。中国经济的发展特征只是资本的重复堆积，这种陈旧的经济模式就是典型的“重商主义”。因此说，貌似强大的中国其实只是一堆木头捆在一起凑成的庞大的木筏，而不是一艘真正的有机组织的、形成强大力量的战舰。这样的中国不管怎样庞大，也是不堪一击的，一个小小的风浪就足以使其瞬间崩溃。



《谎言帝国》，居伊·索尔曼著

塔吊上的中国

在电影《2012》中，代表官方话语的中国军人正在进行末日宣传：“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可以创造更多工作的机会。”毫无疑问，就业与GDP已经成为中国经济最重要的意识形态：无论怎样，“发展是硬道理”；不断地提高人们的物质生活成为权力合法性的最重要支撑。在衣和食的问题解决之后，住和行成为最大的消费市场。住房与汽车齐头并进，成为中国经济的两根铁轨，使中国经济迅速驶入快车道，连续10多年保持着两位数左右的增长率。反过来，唯GDP主义发展模式也产生了一系列令人担忧的负面效应：收入分配不公平、社会分化、劳工权利得不到保障、环保恶化和社会道德体系瓦解等等。

当水立方的泡沫造型为中国树立了一个“不差钱”的形象后，泡沫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现实。早在2008年，《福布斯》评出了全球七大的经济泡沫，其中中国房地产市场位居第二大泡沫。依靠中国政府4万亿强心针救市，有惊无险的2008“拐点”被成功延后，地产继续一路狂奔。王志纲认为，2008年出现全球金融危机，正是中国宏观调控的绝佳机遇，借此给过热的中国经济泼泼冷水，趁势痛下决心实现转型，中国经济将更有后劲，更加可持续。但相反，盲目的货币投放，只不过把危机向后拖延，实则加重了中国的经济病。到2009年，中国土地出让金总金额达15000亿元，占当年GDP的4.4%。中国70个大中城市土地出让金共计10836亿元，比2008年猛增140%，比“疯狂”的2007年增加49%。“卖地”持续多年成为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支柱，许多城市包括北京的土地出让金实际占到财政收入的一半以上。今年初，中国国土资源部部长徐绍史公开承认，最近5年来，中国政府出售土地3300多万亩，获得土地暴利7万多亿元。

“退休女工”王炼利女士的《中国房地产之厄》一书历经坎坷，日前终于在香港出版。王炼利通过对来自国家统计局的公开信息中有关房地产的统计分析，她不仅“证实”了“很多专家学者违背了常识在信口开河”的现状，更重要的是告诉了人们“中国的方方面面是怎样‘被’房地产的”。在这个过程中，全国城镇野蛮大拆迁、居民就业难、社会消费难以启动等等社会动荡因素，都可以从“中国‘被’房地产”中找到答案。中国房地产真正的高速发展，其实是从1998年开始的，至今已经一路狂奔了整整13年。如果从2001年入世算起，中国房地产用了10年时间将房价推高了整整10倍，而相反，股市还在2000点徘徊，这显然与货币超发有很大关系。10年前，当时中国住房实物分配制度彻底结束，整个金融行业几乎毫不例外地纷纷开办房地产按揭业务。银行的介入使中国房地产业开始空前繁荣。按揭拉低了购房门槛；宽松的信贷政策降低了开发商的融资成本；“招拍挂”的土地财政彻底消除了土地瓶颈。

对中国来说，房地产从来就是政治问题，对中国房地产来说，这里没有真正的市场，却有真正的政治。可以说，这10年来，地方财政已经成为了名副其实依靠玩弄房术的“土地财政”，而中国政府成为房地产狂飙中的最大获益者，大部分地产收益最终都会落进政府的腰包。据全国工商联对三个一线城市的调查，上海财政从房价中分得的份额为64.50%，北京为48.28%，广州为46.94%。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地产都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火车头，或者说是中国经济的“劫持者”。房地产业即使不占据支柱地位，也是这10年来地方政府主要的财政收入来源。以2009年为例，房地产行业



《中国房地产之厄》王炼利著



郎咸平：高房价让中国失去创造力，这是最大危机。

创造的增加值占 GDP 约 6%；中国民众当年消费性支出约 12 万亿，其中商品房消费支出为 6 万亿。2010 年，鄂尔多斯的房地产开工面积是 1009.4 万平方米，而同期北京市是 1639.5 万平方米，开工面积已经接近北京市的 2/3。鄂尔多斯人均的购房面积是 15 平方米，而北京的数据则只有 0.78 平方米。作为狂热的投资品，房地产资产的高度泡沫化导致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不用说唐福珍、钱云会们——1.2 亿失去了土地的失地农民与 300 万户城市拆迁户的血泪故事，地产同样的成为中国中产阶级的灾难，作家阎连科不得不在网上向胡温求救。

中国目前有 8 万多家房地产开发商，它们拥有的土地足以建造近 1 亿套住房。据瑞信分析师估算，加上空置的待售住房，中国已有能力满足长达 20 年的住房需求。在户口隔离制度下，只有劳动力而不要人的中国城市化其实是对城市化的反动。房地产业在过去几年完全陷于一种失控的非理性繁荣。房地产泡沫吸引大量实业资本杀入，中国的经济结构迅速地房地产化。作为一个典型代表，曾经作为中国电脑第一企业的联想竟然早已放弃了电脑制造，而急急杀入地产。外资制造业云集的东莞工业园区已经变成一座巨大的幽灵城。2010 年这里还有 100 多家企业和 10 多万员工，如今只剩下寥寥数家企业和几百名工人。这印证了中国对欧洲出口因欧元区危机遏制消费开支而出现“断崖式下跌”。经济学家郎咸平指出：“中国飙升的房价通过从制造行业转移而来的钱而被炒起来，仅仅是助长了中国的‘泡沫经济’，中国的制造业将是它发展的尽头。因为制造业领域所面临的两大难题，第一是跨国投资环境的恶化，第二则是严重的产能过剩。”

曾有一部著名的好莱坞电影，叫《生死时速》（《Speed》）。电影情节很简单，恐怖分子在一辆巴士里安装了炸弹，只要巴士的时速超过每小时 50 英里，就不能减速。一旦低于时速 50 英里，就会引发炸弹爆炸，导致车毁人亡。所以整部电影都在这个疯狂疾驶、充满死亡恐惧的巴士中进行。在世界危机蔓延的 2011 年，有一个段子说：希腊“破产”了，没事，还有欧洲诸国可以救援；欧洲“破产”了，没事，还有美国可以救援；美国“破产”了，没事，还有中国可以救援；中国“破产”了，没事，我们还有上帝……

经济学家张维迎则这样说：“中国已到了离开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再无空间的地步。美国的市场经济如平地推车，停歇无妨，而中国的市场经济，则如推车爬坡，停顿便是倒退。与政治体制改革这样的大局相比，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已变成次要。”



张维迎：改革停滞时间越长，爆发力量越大。

作为制造业大国，中国在全球产业分工体系中越来越趋于纯粹生产型国家，只制造，不创造；只生产，不消费；只出口，不进口。西方国家则越来越趋于纯粹消费型国家，只创造，不制造；只消费，不生产；只进口，不出口。在欧洲陷入一片经济困境之时，温州的失落已经成为一个不祥的预兆，中国的经济问题最终仍要回到内需层面。但仅仅依靠富人的挥霍来拉动内需只能制造一个“内虚”的中国。内需的缺失与出口的受阻将导致严重的产能过剩。2009 年，中国钢材产能达到 7 亿吨，产能过剩将近 5 亿吨，产能利用率不足 75%。从某种程度上，地产从一开始就成为提振内需的唯一砝码。



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康巴什新城，因大量新建住区无人居住而被称作“鬼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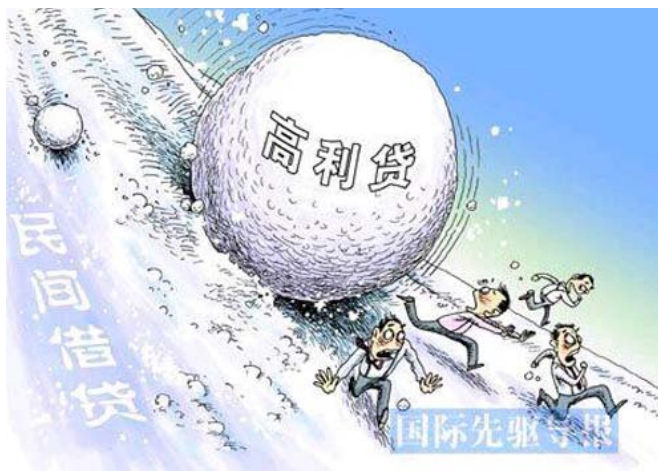
整个社会总能耗的三分之一以上。中国每年新屋建设量也占世界 60% 以上，而中国只占世界 20% 左右的人口，其经济总量只占全世界的 7% 左右。

毫无疑问，房地产对“内需”和“GDP”的带动是其受到官方鼓励的核心原因。一旦地产崩溃，则整个能源行业、钢铁业、水泥业、煤炭工业也都将一损俱损。这些原始工业仍然构成落后中国的核心经济因素，因为中国尚未发展出成熟完善的知识经济体系。中国 GDP 的列车几乎全部系在房地产的火车头上。一旦房地产市场倒塌，其结果就是 GDP 增速放缓、公共债务的上升和通货膨胀的居高不下，这些将是未来中国面临的最大困境。应当看到，在中国光鲜的新摩天大楼、高速公路以及子弹头列车背后，是无人居住的鬼城、空荡荡的公路和空驶的高铁。蒋方舟在《纪事 2011》中写道：

“在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国之后，世界对中国经济的唱衰忽然多于唱好。在危机感面前，越来越多人开始考虑移民，在 2012 年前抢一张船票。2011 年，所有人都参与了一场没有赢家、庄家通吃的游戏。就连春风得意的房地产商，也在史上最严厉的行政手段的强压下，在年末，变得忧心忡忡、愁云惨淡。”

地产的末日？

在电影《2012》中，中国制造了拯救人类的诺亚方舟，最后登上“神舟”的却是美国人。有些经济学家指出，2008 年是中国经济由盛而衰的拐点，2009 年以来的 GDP 增长只是依靠资产泡沫催生出来的非理性亢奋。英国渣打银行的报告预计，2011 年中国经济增长的 50% 以上都是由投资驱动的，而在危机重重的 2008 年，这一比例仅为 43%。事实上，东莞和温州制造业的崩溃才是中国经济的真实场景。从温州老板跑路潮，可以想见那些承担了 60% 以上的税收和 90% 以上就业的中国民间中小企业主的悲惨结局。从 2011 年伊始，由于对房地产购买和银行贷款的严格限制，中国房地产交易量和价格双双下降，引发人们对房地产市场崩盘的恐慌，这将把债台高筑的房地产开发商逼至绝境。随着地产狂热和经济泡沫的破裂，中国经济必将进入非理性萧条时期，即所谓的“硬着陆”



温州老板跑路警示：中国民间高利贷“崩盘”。

或者“软着陆”。硬着陆就是暂时性的扬汤止沸，泡沫并没有消除，泡沫破灭引发经济危机和经济持续衰退，社会陷入动荡。相比之下“软着陆”则使泡沫渐破，消弭于无形，社会可能出现阵痛但不会出现震荡。地产列车上的中国经济会成为拯救世界的“诺亚方舟”，还是相反，成为“泰坦尼克”，这是2012年最大的悬念和猜想。

地产兴起在“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之后，房地产吸纳富人的富余资金，同时借助房价的节节拔高使富人更加感觉富有，从而使富人得到最大的满足。在股票持续低迷的情况下，地产甚至成为热钱的唯一方向。在“波士顿咨询”所做的调查中，14%的中国富人完全靠地产投资（投机）获利，实际数字明显比这大得多。这对农民化的中国富人来说，当今买房就如同古代买地，“不在地主”变成了今天的“不在房东”。事实上，中国地产从一开始就与居住无关。《人民日报》曾毫不讳言地指出，普通购房者早已被中国房地产彻底抛弃。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10年经济蓝皮书》指出，中国房价收入比超出合理承受范围，85%中国家庭无能力买房。类似鄂尔多斯市康巴什新城这样的“城市幻影”、“空城计”、“幽灵城”或者“鬼城”在中国绝非孤例。《人民网》曾有一文为《巨大楼市泡沫显现，中国空置房可供2亿人居住》，据此，可以推算出中国住房空置率至少超过30%。据刘植荣先生说，荷兰安排无房户免费入住空置一年以上的住房；法国对空置住房的产权所有人进行罚款；丹麦强迫空置超过两个月的住房免费供他人使用；瑞典征用空置住房当做廉租房供无房户使用，甚至把空置住房推倒。

美国咨询机构 Demographia 2011 年对全球数百个城市的居民房屋购买力进行的调查显示，香港房价高达平均家庭年收入的 11.4 倍，在调查中最高；澳大利亚的主要大城市房价为其平均家庭年收入的 6.1 倍；而美国这一比例为 3.3 倍，在被调查的 7 个国家及地区中最低。该机构认为，当房价收入比达到 5.1 以上就属于严重偏离购买力（美国爆发次贷危机前房价收入比达到 5）。中国官方数据显示，2010 年中国城镇居民的房价收入比高达 8.76，而大城市的房价收入比更高，北京、上海、深圳更高达 15 倍以上，让城市居民无法承受。

对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及开发商来说，限购令纯属“逼上梁山”的无奈。即使阻力重重，为了避免更大的泡沫危险，限购令仍可能会走向长期化和扩大化，这种釜底抽薪的办法无疑将主动挤压地产泡沫。事实上，今天的中国地产泡沫危机并不是第一次。据《中国房地产市场年鉴（1996）》统计，“1988 年，海南商品房平均价格为 1350 元 / 平方米，1991 年为 1400 元 / 平方米，1992 年猛



詹姆斯·查诺斯，全球最大的空头基金公司尼克斯联合基金公司总裁。

涨至 5000 元 / 平方米，1993 年达到 7500 元 / 平方米的顶峰。短短 3 年，增长超过 4 倍。……海南全省财政收入的 40% 来源于房地产业。……广西北海黄金地段的楼盘价格达到了 6000—7000 元 / 平方米，最高的超过 1 万元 / 平方米。”接下来泡沫破裂，楼价跌到 500 元 / 平方米，且是有价无市。这场地产危机给占全中国 0.6% 总人口的海南省留下了占全国 10% 的积压商品房。

早在 2008 年，华尔街空头大师詹姆斯·查诺斯就曾说：“中国的房地产泡沫比迪拜严重 1000 倍以上，甚至更糟。”他认为，



中国经济只是一个等待破裂的泡沫，其中房地产是一个风向标。中国房地产业主要靠银行贷款支撑，随着房价进一步下滑，呆账、坏账会成为困扰中国银行业的一大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将无法在经济增长不出现严重放缓的情况下遏制通货膨胀。专家预计，房价下降30%银行将增加1万亿元以上的坏帐；房价下跌30%以上，银行就会受重创。一旦银行倒闭，中国金融和中国经济必然衰退，甚至崩溃。不容忽视的一点，至2010年底，全国省市县三级地方政府的债务余额为人民币10.7万亿元。这尚未包括中央和乡村一级的债务。

对于素来大秤分金大块吃肉的开发商来说，2011年更像是一场悲剧的序幕。从年初的限购到年中的限贷，调控政策的紧箍咒从未放松。销售量下滑、存货激增、现金流紧张、消费者观望，这些巨大的压力之下，开发商不得不放下身段，开始降价促销。从温州到鄂尔多斯，进入10月以来，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包括一线城市在内的46个城市素来坚挺的房价终于出现停涨或下降。被很多开发商寄予厚望的“金九银十”黯然收场，低迷的成交态势仍在延续，能按进度完成销售比例的开发商屈指可数。很多企业无奈之下选择降价促销，结果引发了先期购房者的愤怒抗议，甚至成为可怕的群体性事件。在量价齐跌的严峻势态下，“卖不掉”的问题仍在持续发酵，逐步演变成整个地产行业的最大危机。

向来以中国地产的旗手而著称的万科资产负债率已高达78.97%，这个负债率也是万科2008年以来近4年期间的最高值。万科11月销售面积和销售金额环比分别减少了26%和20%。绿城净资产负债率从去年底的132%飙升到了令人咋舌的163.2%。险境中的绿城，不得不向中国最大的“金主”——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求救，而绿城足球队也准备转让。12月12日，房地产股票领跌大盘，致沪指失守2300点，成交量创3年来新低。让中国地产商感到绝望的是，这种败相或许还只是开始。从12月9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传出明确声音：2012年继续坚持房地产调控政策不动摇。如果说2011年是中国地产业的秋天的话，那么2012年就是一个真正严酷的寒冬。

从10月份开始，国内房价停止疯涨而转入下滑，资金紧张的开发商不得不大幅降价，抛售房屋。35个国内大城市房屋销售指数显示，其中29个城市的销量同比下降，包括北京在内的6个城市销量下降超过50%。10月份房价下跌的中国城市有34个，比9月份翻了一番。

中国房地产指数系统发布，全国100个主要城市住宅价格连续第三个月环比下降，郑州市住宅均价在全国100个城市中跌幅进入前10。从7月份开始，郑州商品住房成交均价就一路缓缓下滑，连续4个月环比下降，虽然幅度只有几十元，但抛物线的趋势却是持续阴跌。历来坚挺的中国房价，第一次从习惯性的假摔变成了真降。据一位长期生活在鄂尔多斯的人透露：继高利贷危机之后，康巴什楼市大面积降价，从去年的均价10000元暴跌至现在3000多元。

从12月5日，广州市海珠区琶洲纵横公寓一夜之间将房价由25000元/㎡降为13800元/㎡，此前3个月，这个项目总共1000套房子只售出16套。据北京房地产交易管理网统计，2011年北京商品房住宅销售面积为900万平方米左右，比上一年下跌27%，也远低于2008年，成交量创10年来的最低点。二线城市的西安11月份商品房交易面积为85.33万平方米，比去年同期跌了五成。与此



2005年以来的煤炭涨价周期，使鄂尔多斯、神木一带的民间财富迅速聚集，由于大量民间资金投入能源和地产，在推动能源、房地产等行业兴旺发展的同时，也为未来当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带来隐忧。（漫画转引自内蒙古新闻网）

同时，房产中介市场正在经历 2008 年以来最严酷的寒冬。今年以来，北京二手房中介共关店约 1000 家，深圳更是从 8000 家锐减到 5000 家，不少门店几个月没有成交一套房。目前中国楼市萧条趋势已经非常明显，商品房销售面积持续下降，房屋库存继续上涨，全国性的楼市调控拐点已经出现。

12 月的第一周，全国 35 个重点城市中，13 个城市房屋成交量同比跌幅超过 50%，贵阳降幅达到 74.09%，蚌埠降幅达到 72.1%。住建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秦虹表示，11 月的成交量下降具有拐点意义，以前都是一线城市下降，现在是二三线城市下降。中国社科院在发布的《住房绿皮书：中国住房发展报告（2011~2012）》中住房报告称：“2012 年第二、三季度房价将有大下降的可能，降价势头将由城市的边缘区域向中心区域扩散。”

作为房地产的未来预期，在刚刚过去的 10 月份，中国土地市场成交巨幅缩量，住宅用地成交量更是创出年内最低。中国指数研究院发布的数据显示，10 月份全国 133 个城市共成交土地 1365 宗，成交面积 5500 万平方米，环比减少 40%，同比减少 37%；其中住宅类用地（含住宅用地及包含住宅用地的综合性用地）408 宗，成交面积 2004 万平方米，环比减少 37%，同比减少 45%。由郑州市国税局提供的税收数据显示，前 11 个月，郑州市房地产行业入库税款 9.10 亿元，这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幅度达到 13.1%，减收 1.37 亿元。中原地产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 11 个月，全国 130 个主要城市土地市场总土地出让金为 1.18 万亿，与去年同期相比减少了 5200 亿元，减少了 30%。如果计算全国所有城市，则今年土地财政将可能减少上万亿。

据《东方早报》报道，整个“金九银十”阶段，中国钢价跌幅超过 500 元/吨，势头直逼 2008 年末。应当说，房地产带动了汽车、装修、建材、家具、家电、园林和基础建设，一旦地产停摆，这些行业也将面临着雪崩的危险。不久前，摩根士丹利、瑞士银行和花旗银行陆续调低了对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预期。如果明年中国实际的增长率为 8%，那么这将自 1999 年以来最缓慢的增长；相对于去年 10.4% 的增长率而言，这样的减速对于中国人来说感觉会像是衰退。

当年，日本房价在创下天价后，下跌 70%；中国香港 1998 年开始，连续下跌 6 年，下跌近 70%；泰国房价曾跌掉 3/4；中国台湾曾下跌 50% 以上。歌星王菲在 1997 年以七成按揭，分 20 年供款的方式以 4800 万港元购入了沙田宝松苑的一个豪宅住房单元，每月供款额达 29 万港元，两年后只能以半价出售。30 年前，房地产泡沫的破灭曾给日本带来巨大的痛苦，银行破产，大量的银行被兼并，整个社会进入 10 年的经济通缩时代。如果说日本的房灾导致了该国经济倒退了 10 年，那么中国地产的崩溃将是一场多米诺骨牌式的政治灾难，远比民主化和富裕的日本和香港更加危险。与日本当年高达 2/3 跌幅相比，谢国忠所说“中国房价跌去一半”的预言并不夸张。事实上，此番降价风暴是中国经济放缓的必然结果，并非因为调控政策。种种不祥的迹象表明，中国经济这辆疾驰了 10 年之久的高速列车，似乎快要到燃料耗尽的时候了，因为“中国房价永不落”的神话已经变成谎言。



《住房绿皮书：中国住房发展报告（2010-2011）》，倪鹏飞著，该书从宏观背景、市场主体、市场潜力等方面，对中国住房市场做了全面分析和预测，并提出了稳定住房消费政策取向避免盲目政策优惠、引导住房需求并扩大住房供给等政策建议。

中国的国歌有一句著名的歌词：“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早在2008年，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就警告中国面临着“溃败”的危险。2011年10月22日，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在沈阳进行了一场禁止录音录像的演讲。郎咸平根据中国制造业将要坍塌和地方债已经达到债务危机程度等因素，得出了“中国政府已经破产”、“中国将会陷入几十年大萧条”、“中国将会成为全世界最穷国家”等悲观结论。俗话说，风雨来临蚁上树，大船将沉鼠先逃。精英们的“叛国”告诉人们，暴风雨就要来了。据美国移民局透露，2001年到2009年移民美国的中国人是59万多人，而2011年移民美国的数量超过100万人，2012年符合条件的移民人数至少将达到130万人。另据福布斯排行榜调查，目前中国大约六分之一的千万富豪已经或正在移民国外，三分之一的千万富豪已经拥有海外资产，至少有十几万亿财富已经被席卷而去，这意味着未来的中国将“人财两空”。移民的原因有许多种，但最关键的是安全感缺失；这包括生命的安全，财产的安全，食品的安全，空气的安全，教育的安全，权利的安全等等。



社会失去进行长远思维的能力。在权贵资本主义上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又过于注重眼前，既无古代帝王对子孙后代的责任，又无贵族的超脱和超越精神。社会的溃败首先表现在权力的失控，腐败不过是其外在的表现。（孙立平：中国社会正在加速走向溃败）

物业税元年

圣雄甘地曾经说过：“地球能满足人类的需要，但满足不了人类的贪婪。”当经济泡沫如多米诺骨牌一般纷纷破灭时，中国经济必将进入无可奈何的后地产时代。届时，中国将出现当年日本和香港楼市崩盘的景象：房屋价值严重缩水，大量的按揭出现断供，银行出现大量的坏账，地产商纷纷破产……在后地产时代，压力最大的无疑是被土地财政撑大肚子的地方政府。如果说房地产是鸦片，那么很多人都已经成瘾了。从2011年的情况来看，对中国地产商来说，未来的2012年绝对是一个不祥的年代。2011年与2010年相比，许多地方政府土地收入就已经减少五成左右，连累财政收入下降。制造业的萧条和破产浪潮无疑已经断绝了政府税利的另一条财路。正处于建设高峰期的政府一旦陷入财政困境，下一步会做出什么举动，这是值得每一个人关注的。温家宝今年特别指出，要利用房价合理回归的有利时机，出台治本之策。那么何为“治本之策”？

从过往的事实来看，近10年来的每一次政府对房地产进行“调控”，其结果都是“空调”——房价更进一步地飞涨。房子越来越贵，土地才奇货可居，能卖个好价钱。限贷、限价和限购，中国本轮房地产调控仍然富于强烈的行政色彩。相比受商业银行和地方政府人为操纵的限贷和限价，封杀富人囤积的限购成为中国地产的真正毒药。任志强说过：“我没有责任替穷人盖房子，房地产开发商只替富人建房。”限购彻底断绝了中国地产的源头。后地产时代的来临，失去土地财政的政府极有可能再次启动物业税。

物业税已经被无数政客和经济学家呼喊了许多年。每当房价高涨时，许多“专家”就说抑制房价上涨的唯一方法是实行物业税。理由是现行的中国房地产在生产、流通环节的税赋很重（包括土地出让金），但持有环节的税很轻。因此造成有钱人买很多套房，这种投机活动让房价暴涨，使穷人买不起房子。如果加大了持有环节的税收，则拥有多套房的投资者会减少，房价就会跌下来了。这种持有环节的税收就是指物业税。

房地产飞涨了10多年，中国虽然没有成为全世界最富的国家，但至少已经成为全世界房子最贵的国家。按理说，物业税早就该出台了，好让房价回归其应有的价值，至少不要使其泛滥成泡沫。然而事实上，物业税并没有引起政府的任何兴趣。理论上，税收是政府唯一的合法收入。政府好比民众饲养的一条狗，看家守夜，为人民服务。正如人是狗的主人，民众也是政府的主人。准确地说，政府是纳税人用税收供养的一个公共组织，维持正义和公理，保护弱者，抑制强权。税收具有双重功能，它不仅是政府存在的物质基础——政府需要税收作为生存费用，税收也是维持公平公正的重要手段。依靠税收的杠杆原理，削富济贫，以福利的名义缩小社会差距，增强人民普遍的幸福。税收的这两种功能中，前者有利于改善政府的生存状态，后者有利于增进社会公平和人民的幸福。

“毋庸置疑，中国的房地产泡沫是有史以来最大的泡沫，但我们的房产税比津巴布韦还要低；这种情况真是可笑”（易宪容）。虽然目前中国房产税（物业税）起征额度极低，甚至仅仅是一种象征性意义，但并不意味在土地财政断绝之后仍然能保持这种“象征性”程度。从人类历史来看，“劫富济贫”永远是一种“替天行道”正义；特别是在基尼系数从20年前的0.24发展到超过0.5的当下中国，合理的物业税将能起到缩小贫富差距的效果。至少有一种无法言说的原因，物业税遭遇到体制内的强力阻击，这被黑领群体视为阳光法案的预演。地产投机的背后隐藏着大量洗钱暗流，物业税极有可能造成对腐败和体制的“误伤”。2009年陈绍基案发后，拔出萝卜带出泥，广东因害怕被牵连的社团要员在风声鹤唳之下，外逃多达150个家庭。其中退休的省级干部6人，厅级干部多达70人，被他们带走的灰色资产估计至少超过100亿。

因事发突然，这些黑领们在国内囤积的房产基本都没来得及变卖，仅在广州一地被中纪委查封的“无主”（已经潜逃）房地产就超过1800套，散布在碧桂园等上百万的豪华别墅多达160套。

又比如贵阳市常委樊中黔被查出13套；茂名副市长杨光亮有14套；文强被查出16套；楚雄州长杨红卫被查出23套；杭州副市长许迈永被查出25套；山西蒲县煤炭局长郝鹏俊被查出35套房产；浙江省药监局长黄萌被查出84套房产……

学者袁剑曾说：“正如热恋会让人们智商降低一样，繁荣也可以让人迷狂。长久的繁荣更是特别容易推动普遍的幼稚预测，明天还会像今天一样繁荣。”如果说资本从制造业流向房地产给“通胀棺材”上敲下了最后一根钉子，那么接下来的就是世界末日般的泡沫清算。2012年无疑是这场清算的最美妙时刻。在古老的玛雅传说中，2012年是世界末日；对中国来说，至少是地产的世界末日，地产泡沫终将破灭。所谓“政府不会让房价下跌”的童话是绝对荒谬的，4年前的股灾曾使平均每个中国股民损失了20多万。财富是不会“蒸发”的，它只是从一个人的口袋跑进另一个人的口袋而已。可以想象，当地产已经崩盘时，房地产一片萧条，击鼓传花的游戏在一声鼓响中宣布结束，这场非理性游戏的不幸儿将成为替罪羊被推上祭坛——你必须为你的房产支付税费。你可以断供拖欠银行的钱，但你不可以欠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姜伟新透露，目前他们正在努力建设城镇个人住房信息系统，毫无疑问，这是物业税的前提，城镇个人住房信息系统是为全国范围内开征房产税做技术上的铺垫。

12月中旬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要求“调整财政转移支付结构，加强县级基本财力保障。要推进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和房产税改革试点，合理调整消费税范围和税率结构，全面改革资源税制



袁剑，独立评论人、作家，其著作《中国证券市场批判》、《中国：奇迹的黄昏》影响较大。

度。”据《中国证券报》报道，房产税试点扩大方案即将出台。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之前表示，未来房产税进一步推开的大方向已经明确。年底将会对重庆、上海两地的房产税试点情况进行总结，届时会出台下一步扩大试点的方案。“政府调节房价未来的方向，将是以房产税等经济手段来逐步替换‘限购令’这样的行政手段。”贾康近日直言，房产税将（取代土地收入）成为未来政府的财源支柱。中央财经大学税务学院副院长刘桓认为，目前中国房产税税基很小，未来限购政策或将取消，届时房产税的作用将会发挥出来。

中国有世界上最富有的政府和最贫穷的家庭，在福布斯的榜单上，中国税负痛苦指数在公布的65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列第二。曾有网友这样计算中国官方的税收：“月收入1万，要交14%个税，12%公积金，8%养老保险，4%医疗失业险=3800元，如果你拿出6200全部消费，需要为你消费的商品埋单17%增值税，28%各种杂税=2800元，所以，一个月赚1万的人，你相当于要拿出6600元来缴税。”在官方制定的高中教科书中，明确地说明：“税收具有无偿性，国家取得税收收入既不需要返还给纳税人，也不需要向纳税人直接付出任何代价。”

2007年5月30日，财政部以调控之名，突然宣布将证券印花税税率从1%调整为3%；10天后，国税局宣布实行新的车船税缴纳制度；紧接着，不少企业的出口退税制度被宣布取消；同时大幅提高资源税税率……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股市从6100跌倒1600，而政府财税收入每年增长率从超GDP双倍变成3倍。民主的终极其实还是税收问题。荷兰的建国，法国大革命，美国的独立，都是从政府征税问题引起的。

历史是一根被扳弯的竹子，一切最终还要弹回来。

10年来，中国地产狂飙猛进，酿成一场经济灾难、政治灾难和文化灾难；作为这场中国灾难的始作俑者，注定逃脱不了一场末日审判。地产的每一轮暴涨都脱离了房价的基本面，为日后的下跌积聚动能，上涨预期下的楼市繁荣完全是一场“金融传销”。对于这样的畸形市场，停涨便意味着暴跌，“稳定房价”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2012年会是一场世界的末日吗？

至少对地产人是这样，还有很多没钱回家过年的农民工，怒砸售楼部的业主，亡命天涯的老板和高利贷者。如果说如同战争一般的房地产狂潮是一场社会财富再分配的话，那么在后地产时代的物业税则是另一场财富大洗牌。

在2012年即将到来之际，在郑州黄河滩区租地种田的农民韩洪刚，在60亩地里种了40万斤萝卜，5分钱一斤还卖不出去，他干脆广告免费送给市民；结果不仅40万斤萝卜被一抢而光，甚至连他地里的红薯也被挖走不少，“萝卜哥”一夜之间蹿红网络。虽然开发商不是“萝卜哥”，房子也不是萝卜，但它们都长在地上，道理是一样的。10余年来，中国地产商最爱说的话就是“卖楼就像卖菜一样”。



韩洪刚决定免费赠送萝卜后，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采摘。
图片转自《羊城晚报》。

（文章来源：作者投稿）

■ COMMENTS/星火评论

年初，
我们一起看台湾选举

阳月 / 文



网上有人调侃，也可以说是自嘲，大陆人看台湾人选总统，就像一群太监看AV，有心无力，望洋兴叹。（不排除有一小部分不明真相或者揣着明白装糊涂的人认为这太脏太乱太假。）

那我们到底是不是太监呢？那就要看我们头顶是不是有一个皇帝，或者心中依然有一个皇帝。什么是皇帝呢？那就是我们还没有投票，我们便知道“接班人”是谁了。有了“皇帝”，全国人都是太监，只是程度不一。太监国度，有人自宫，有人阳痿。有人因从此没了性生活远离性病恐惧而高兴，也有因为丧失性功能而不能享受两性之欢而痛苦不堪。天理不在，人欲既灭，似乎有亡国灭种的征兆，这可真不是危言耸听。

曾经很长一段时间，固执地认为制度这把利刃切掉了大多数人的小JJ，以及他们的大半个脑子，才造就了今天我们沉默的大多数。（当然制度这把利刃也可以切掉的“权力”的大鸡巴，让它不能随意强奸民意。）但细细思量又不全是，有什么样的人民便有什么样的政府。“人民”这个词很不好，给人感觉跟乌合之众这个词亲缘关系很近。一会儿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热血沸腾的要替天行道，一会成为不明真相的刁民了，头低得如丧家之犬。“公民”这个词好，理性，成熟，知道自己的权利有哪些，知道权力的边界又在哪儿，彼此不越界，和谐相处。民族的虐根性，自私、懦弱、贪欲，毫无公共观念，让我们像猪狗一样，丧失了思考的能力，丧失了追求

尊严的勇气，依惯性而生活，满足于槽中的饲草，满足于舒适的草窝，眼光早已无法触及到远方的森林、草原，高山，那才是我们真正的精神家园——自由之乡。堕落，蜕变，与猪狗为伍，即使捧着《丑陋的中国人》，也无动于衷。

枪杆子里出政权，一张选票也出政权。前者白骨堆出来的，活下来的人也在黑色枪口下必须做跪着的孙子，苟延残喘；而后者是公民的举手之劳，每人一张选票选出来的，活着的人有尊严，有自由，真正的当家做主。手握选票的时候，公仆必须毕恭毕敬的为人民服务，而不是骑在人民头上拉屎拉尿。世界民主大潮，浩浩荡荡，但我们还在摸着石头过河，甚至石头摸上瘾了，都不想过河了，严重后果可想而知。

一百年前，我们中华民族为民主自由而奔走呼号；一百年后，我们却还在民主是不是好东西而争论不休。一百年前我们对袁世凯倒行逆施的皇帝梦而大加讨伐；一百年后我们却得出一个结论，中国人素质太低人口太多不配享有民主自由。2010年年末的时候，蔡定剑教授走了，他留给了世人《民主是一种现代生活》，以一个学者的良知推翻了这一无耻谰言。2011年末的时候，高华教授也走了，但他留下了一本《红太阳是怎样升起来的》，揭穿了一个更大的谎言。天妒英才，国之不幸。但是幸运的是，2012年年初我们能够围坐在电脑前一起关注台湾选举，感受选选票的力量，体验民主的快乐。

（来源：作者授权。原文地址：<http://blog.renren.com/blog/222781604/799175730>）

“实名制”拓展了权利的运行空间，可以提高权利的效率，若运用得好，可以对公权力形成一定的监督和制约，比如官员财产信息实名制化。

实名制崇拜下就应该官员财产透明

华阳杨/文

现在“实名制”很火，貌似渐成趋势。

这趋势也渐呈泛滥态势，除有些是“与国际接轨”以外，有些则是“与国际脱轨”的创造发挥：扔垃圾实名制，买避孕药实名制……

“实名制”拓展了权利的运行空间，可以提高权利的效率。其实，只要权利的素质能得到保障，搞些“实名制”有何不可？

问题是，在当下某些官员的实名制崇拜下，怎么保证权力的素质？“实名制”越多，公民在权力面前透明的信息就越多，于此相对应的，权力的信息也应该越来越透明。

权力信息里很重要是掌权者——官员的信息，而在官员的信息里，公众很关注的是官员的财产状况。现在，世界上已经有 90 多个国家实行了政府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可以说，政府官员财产公示，是一种很广泛的“与国际接轨”。

当然，对落马贪官的财产还是透明的；可是，都成为了落马的贪官了，他已完成了对公共利益的侵害，这种财产透明除了可以做给贪官定罪依据以外，又有多大意义？须知，官员财产透明的根本作用在于监督掌权者，从而起到防贪的作用。

在反对官员财产公示制度这个“与国际接轨”上，有一种最常见的说辞是“中国国情”。不知在官员财产透明上，有什么特殊的“国情”？现在，在中国的港澳地区都已出台了官员财产公示制度，那里怎么就不存在“中国国情”？

对官员财产透明这个“与国际接轨”上，还有“为什么不公布老百姓财产？”的说辞。

其实，老百姓的财产何须公布？只要权力愿意涉及，哪个百姓的财产在权力面前不是透明的？问题恰恰是另一个方面，某些官员只关注自己的政绩，而对百姓收入和百姓财产不太感兴趣。

相反，若公众要想知道官员财产，就只有通过一些另类的方式——猜测评估。而这猜测评估的风险很大，猜多了很可能背上“造谣”的罪名；贪官遭小偷偷窃，而这种把小偷变废为宝的“透明”官员财产的方式近乎于搞笑，就像是隔墙扔砖头，砸中谁算谁。

从“扔垃圾实名制”到“买避孕药实名制”，貌似我们的某些官员对实名制有一种狂热的崇拜，对公众的“透明”要求也越来越高，但透明辐射应该是双向的，否则，有些被实名制扩大的公权力的素质将无法得到保障。



（来源：作者授权。博客地址：http://blog.sina.com.cn/s/blog_6215ecff01010w57.html）

学术研究需要谨防被政党利用

马庆云/文

学术研究，是有自己相对的独立性的，这个相对独立性，在一个暂时还没有实现民主宪政的国度里边，很可能被权力阶级利用到，成为其统治的工具。孔子的启蒙是与君王对话的，而不是面对底层的老百姓的，学术研究或恐应该看得全面才对，不能独独地不启蒙统治阶级而去到百姓中转悠。

我的一位老先生在我即将离开大学的时候专门找我单独谈话，说有些党派搞专制集权，或许是天道所之，你不要与之较真，应该保持平和的心态，天道亦会惩处它的。我跟先生说，如果咱们都等着天道，而不积极争取民主自由这些东西，或恐天道会来得很迟，或恐会上千年，到那个时候社会不公正或恐更多，阶层之间的仇恨或恐更大，天道造成的破坏力或恐更惨烈。先生便也不再说什么，放我离开大学，去搞我自己所追寻的东西去了。后来，听一位朋友讲，在大学的教授聚会上，党委和团委的某些“领导”对我的“行径”进行批判简直到了发指的程度，而这位先生却说，他是有机知识分子，有机物与你们无机盐不一样的。

近来，一位未曾谋面的书人批评我说，“你的文章中充满了愤世嫉俗”，你陷入了“怪圈”，“如果让你们去组建政党的话，你们比当下的政党还要……”我想，愤世嫉俗对于一个可以自新的体制来说，就是有建树的，愤世嫉俗是一种不满现状的表现，我向执政府表示具体哪个方面的不满的时候，便是要求他们更近的，便是建树的。而所谓的我们做起来的时候，比它们更坏，或恐就是混乱的执政府给予的奴化逻辑了——批评者并非是社会政党的组建者，也不承担组建政党等等的历史使命，只要行使了批评的权利和义务便是很好的建设了。无论哪个政党在台上，其实，我们都是处于批评者的位置上，批评应该是批评者的权利，批评便是批评者的建树。

这位书人也是讲天道的，与我的那位先生相似，书人认为，建树的应该是修人心，因为人自身便是矛盾的，这个矛盾是与生俱来的，因此不能避免社会的矛盾冲突，因此反证，即使社会矛盾冲突不断，也不能愤世嫉俗，也要修自身的人心。这个逻辑套路让我想起了于丹教授。当年于丹教授红火的时候，我去北京西客站，西客站的大屏幕上滚动播放于丹教授的心得讲座。这个大屏幕在心脏里边，或恐不是谁想上就能上的吧。这个逻辑论证，到底对谁有统治效力，其实不言自明了。

以我粗浅的引车卖浆之流的知识层次来看，修心或许应该与愤世嫉俗同步进行，一个人的修心并不能抹杀他对非正义的东西的批评或者更严厉地说，是抨击。既然书人们承认个体本身就是矛盾重重的，社会难免也矛盾重重，因此不能回避的问题是，社会不会成为每个人都是圣人的社会，社会不会消解所有的非正义与非公正。过度强调修养自我的人，打着修身的旗号对眼前的不



知识分子必须是他所在的社会之批评者，也是现有价值的反对者。批评他所在的社会而且反对现有的价值，乃是苏格拉底式的任务。（殷海光）

公正不闻不问的时候，实际上在完成一个助纣为虐的工作了。我想，修心是可以谈的，但不是帮助统治者给老百姓谈，而是找统治者去谈，让它们修心的。这或许才是书人们要做的事情——到几所大学，跟一些孩子谈什么修心进而否定我的愤世嫉俗，或恐有些司马昭之心了。

学术研究，是可以好好研究一下周易及其它的天道问题的，也可以孔孟老庄甚至是康德尼采的通吃一下的，但是，只给底层的孩子们讲修心，无异于告诉底层人民，你们需要在一个不公正面前忍气吞声的。房子被强拆了，书人们说，等着天道吧；蒙牛卖毒奶了，书人们说，等着天道吧；动车出事故还差点活埋了小女孩儿啦，书人们说，等着天道吧……最后，书人们喝着毒奶上了动车回老家看被强拆的房子的时候，或恐这个世界只能回应他说，你也等着天道吧。

当然，如果真有那一天，社会的批评者们是不会回应书人这句等着天道的話的，就像，微博上胡咧咧的吴法天家里的房子被强拆的时候，大伙也是给他奔走呼吁一样的。我倒是认为，愤世嫉俗的批评者们成就了这个社会的一些希望，不再等待天道的他们，自己去争取可争取范围内的权利，并且也很好的行使了他们自己的义务。应该是这些愤世嫉俗的人在争取“天道”或者说迎接“天道”。周易里边的天道绝对不是不作为的，不作为这个概念是统治阶级造出来糊弄老百姓的。你不作为的忍让，其实就是纵容那些作为的偷盗，盗钩盗国。

学术研究，是有自己相对的独立性的，但是我觉得，这个相对独立性，在一个暂时还没有实现民主宪政的国度里边，很可能被权力阶级利用到，成为其统治的工具。因此，基于书人们的观点，我倒是觉得，应该送到党校等等之处去，给大人老爷们讲修心的，而暂时不要步入百姓中来，我们这帮引车卖浆的玩意，连嘴还没修好呢，修不得心的。书人们所谓的从大学生中去启蒙，真不如去党员团干中去启蒙来的契合实际，而且行之有效。书人们的老祖宗孔子，在这一点上比书人们地道，他的启蒙，还是与君王对话的，而不是底层的老百姓，可惜的是，当下的书人们单单学会了祖宗的修心，而没看到祖宗的修心启蒙的对象，到底是谁？！

在与书人的对话中，我表达了我对他可能成为犬儒的担忧。学术研究，或恐应该看得全面才对，不能独独地不启蒙统治阶级而去到百姓中转悠。统治阶级自己不信的东西，是很可能推广之，让老百姓信的。我更担心的是，懂康德尼采也读黑格尔苏格拉底的书人，早就看到了这一点，也正是钻这一点的空子——方才有了，马兄你的文章太过于的愤世嫉俗，你陷入了你自己的思想怪圈中，你这样的批评无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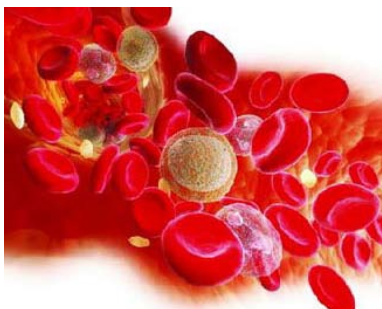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这样的话，我也会喊的，而且我还会用方言喊呢。天道，咱老马也是信的，但是咱不空等天道，咱要配合天道，咱批评不公正从而迎接天道的早日到来；修心，咱老马也是修的，咱也与人为善，咱也捐款捐物救济难者，但这并不妨碍咱老马批评执政府，这个不矛盾啊！认为矛盾的，不是于丹，就是余秋雨吧。



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乃在求得各种正确知识，冒悲剧性的危险，不逃避，不诡随，把自己所认为正确而为现实所需要的知识，影响到社会上去，在与社会的干涉中来考验自己，考验自己所求的知识的性能，以进一步发展、建立为我们国家、人类所需要的知识。（徐复观）

（文章来源：作者供稿）

贫困女生卖血记，6百元换来半年刑期



贾也/文

当我们的法律只会制裁社会弱势群体的时候，我们呼吸到更多就是社会的悲凉。因此，从根本上说，执政者必须保障社会弱势群体，让他们有尊严地活着，才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出发点和归宿点。

引：从许三观卖血记到蔡同学卖血记

《新京报》报道，女大学生蔡某因家境困难卖血，并帮“血头”组织有偿卖血者，获利600元，被判刑6个月，缓刑1年。

读到此则新闻，我不由地想起余华的小说《许三观卖血记》，虽然卖血可以成为许三观生活的经济来源，但是他没有用卖血来维持，除非在非常无可奈何或者无助的时候，他才会想到用卖血来解决。作为贫困学生的蔡同学，何尝不是如此？

众所周知，卖血团伙一般是采取联系有献血指标的单位，顶替单位完成献血名额，进而得到一些费用。耐人寻味的是，“苍蝇不叮无缝之蛋”，没完成献血指标的相关单位，为了政绩勾结卖血团伙，就不需要负责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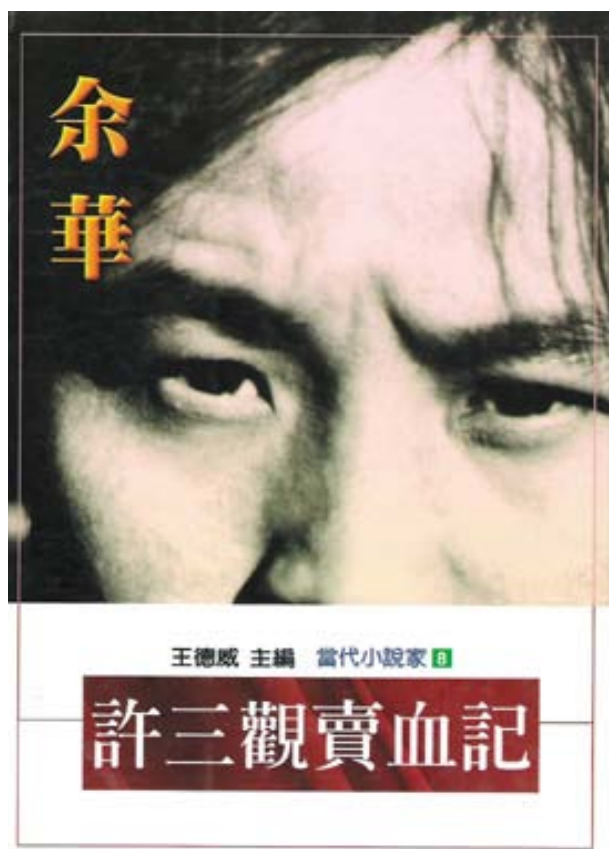
对此，我心有戚然，如鲠在喉，不吐不为快。

一个“卖”字，道尽中国悲凉

直面惨淡的现实，不容讳言的是，我们国家确实存在诸多不尽如人意的丑恶现象，亟需我们去改变。其实，一个“卖”字，便可道尽我们社会的现实：无道者如贪官污吏者卖土地卖官卖国；无耻者如司马南之流卖良心卖人卖德；无良者如蒙牛等企业卖毒奶卖伪卖劣；无奈者如蔡同学之流卖卵子卖肾卖血……中国举国上下，就这样被卖来卖去，什么都用来卖，卖得社会道德沦丧，国将不国，人亦非人啊！

殊不知，无奈者蔡同学为了生计卖卖血，组织一下卖血便手到擒来，600元提成换来获利6月，缓刑1年。一经计算，1百块钱就是1个

月的刑期。如此看来，我们的法律在有的时候还真能体现出其无比的公正、公平性的。不过按此比例计算，那么我们贪官们该如何判刑？他们贪污受贿几百万比比皆是，几千万大有人在，甚至上亿的也屡见不鲜，谁知他们似乎总能拿到免死铁券，往往能免于死刑。有些权钱交易，从中牟利，还边腐边升，如山西白培中若不是小偷光顾其家偷出个令白培中说不清道



余华小说《许三观卖血记》讲述了许三观靠着卖血度过了人生的一个个难关，战胜了命运强加给他的惊涛恶浪，而当他老了，知道自己的血再也没有人要时，精神却崩溃了。

不明的5000万，说不定他已经荣升到山西省副省长的宝座了。此可谓“窃国者为诸侯，窃钩者诛”，此言不虚！

面对如此社会现状，治世者不得不察也！

还原卖血的社会深层次原因

回到蔡同学卖血事件本身，我们的主流媒体都在围攻“卖血”团体，说他们黑心，其实尽是做了些表面文章，呲齿咧牙地照本宣科地报道了一下而已，根本没有触及到事件本质。

卖血者有其市场，依笔者观来，主要原因有三：一是顶替单位完成献血名额，因为许多单位都有献血的指标，卖血者可以向单位取得一些费用；二是顶替患者家属献血，因为患者可以到医院换取等量的血，卖血者可以向患者得到一些费用；三是用血极度紧张，患者家属急需用血，无奈之下只能向卖血者购买血液来换取患者的救治。这些说明什么？一来说明单位指标涉及到单位领导的政绩，在政绩的诱惑下，许多单位不惜造假，以换取指标的完成；二来说明用血紧张和用血费用高昂，在急需用血的情况，患者只得用钱购买用血指标。三来说明，公众对义务献血信任度不足，血液筹集机制尚待改进等深层次问题。

笔者就以蔡同学卖血的案例作次深层次的分析，解读这个事件：

（一）制定指标太荒唐

中国式善举往往打着行政命令的色彩，有关部门总会“奉旨”来收取人们的善心。

比如说各类捐款有指标，按职务和薪级来收取善款，有些单位很干净利落地直接从员工的工资里扣除。当然献血也概莫能外，某些行政部门往往会给一些单位下个献血指标，作为年度任务来完成的。

试想，不就是捐个款、献个血吗？捐助爱心是体现一个公民的社会责任感，就笔者本人而言，捐款献血我就很自愿的，当然捐款要遵循自己的财力，献血要遵循自己的体力，只要条件允许我都会主动捐献的，比如我早就实现献血1500CC了。谁知一个行政命令下来，规

定你要捐多少钱、规定要献多少CC血，这就表现得有些强取豪夺了，自然面目可憎，极度令人反感，甚至让人觉得是对人的善良极大污辱——因为悲天悯人的善绝对是源于心，是自然流露出来。

献血本身是件自愿的事，行政部门为何要硬生生地变成逼人行善的行政命令？这些指标太荒唐了，其实是对人类善举极大的诋毁！

（二）单位造假太无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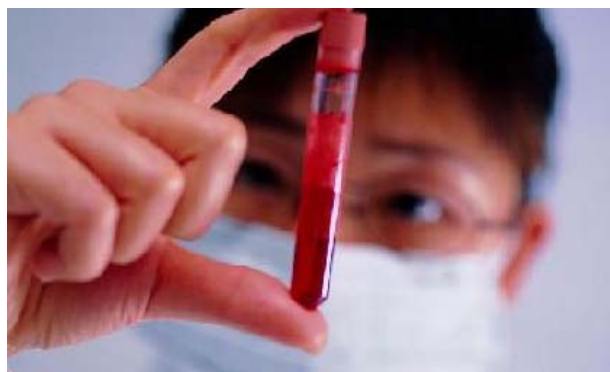
单位面对献血指标的“行政命令”，早已不是表现本单位的“社会责任”，而是表现为本单位的冠冕堂皇的“政绩”了。在“唯政绩”论的驱使下，我们很多单位的领导已然不顾本单位能不能实现，已然不顾本单位员愿不愿意，打着“奉旨献血”的旗号要求员工献血。但是，献血又不像捐钱，钱乃身外之物，而血却身内之物，总不能赶鸭子上树或者五花大绑向员工索血，要不然会闹出人命来，那就要贻笑大方了。

然而，这个指标荒唐地变成一个单位的“政治任务”，不完成它，也就意味着单位领导“政绩”打折，脸上无光。于是，我们有些单位的领导们绞尽脑汁开始造假，就向社会人员购买献血名额，顶包去完成这个指标。

如果没有这些单位明目张胆地去造假，那么也没有所谓的“血头”组织规模人群去卖血。其实，许多“卖血”闹剧，其本质就是某些单位和“血头”演的双簧罢了！

既然法律规定要处理组织卖血的“血头”和卖血者，那么更应该处理造假完成献血指标的单位。

（三）医疗用血太紧张



卖血有市场，主要原因当然是医疗机构出现了严重的“血荒”。

目前，许多城市包括一些无偿献血的先进城市都传出闹“血荒”的困境，许多患者处于“为血所困”无法及时救治的境地。面对这样的困境，不少医疗机构也被逼无奈，只得采取“患者要手术，亲人先献血”的办法来筹血，即“互助献血”来缓解迫在眉睫的“血荒”。

因此，考“血荒”产生的原因，既有医疗服务增长导致临床用血量增加的原因，也暴露出公众对义务献血信任度不足，很难筹到血，造成供不应求。正因为如此，患者家属考虑到患者的手术的需要，只能通过“血头”来购买献血名额，从而实现手术血液的筹集。

谈到这个层面，要杜绝大规模卖血行为，首要任务就是多方面地筹措“血”源，即“血荒”还需“血”源来补。

面对“血荒”困境，还真不如广开血源，通过向社会购买与无偿使用相结合的办法来缓解。我们总不能过分地指望通过血站控制血液，来满足日益紧张的血液需求。

让“许三观”们能够体面地活着

蔡同学卖血，其实说明我们很多人还处于“许三观”一样的生存处境之中。

卖血者为什么要去卖血？因为对一些人来说，他们就是千千万万个“许三观”，他们想法很单纯，已经没什么好卖的，只有通过卖血的几百块钱来暂时地改善一下自己的生活。

“血头”为何要组织卖血？因为他们看到了这个血液需求，而且很多患者家属想通过这种方式来实现用血的燃眉之急，毕竟救人要紧，这说明我们有筹集血液机制并不是很灵活和成熟。

如果是我们的有关部门——血站为了有效控制和充分垄断“血”源，对卖血者和“血头”诉诸法律进行制裁的话，那么恰恰说明我们的法律只会制裁社会弱势群体，这只会让人们呼



2009年，成都“血浆浇花”事件在社会引发轩然大波。漫画 / 邝飏

吸到更多的社会的悲凉气氛。

22岁的蔡同学本身就是卖血者，但看到组织人员卖血有提成，迫于生活压力，便通过网络组织部分人员卖血。对于这种行为，站在法律层面而言，我们当然有理由指责蔡同学。但是面对高昂的学费，蔡同学想法非常单纯，只是想通过这种方式来改善自己的生活，藉此减轻家庭因学习带来的沉重的压力。结果当然很悲剧，600元换来的却是6个月的刑期。

这恰恰是我们社会的悲剧，治世者不可不从中解读到中国社会底层人民的生活辛酸，从而深刻反思。

结语

最后笔者想说：当我们的法律只会制裁社会弱势群体的时候，我们呼吸到更多就是社会的悲凉。因此，从根本上说，执政者必须保障社会弱势群体，让他们有尊严地活着，才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出发点和归宿点！

（来源：作者授权。博客地址：<http://heyafu67.blog.163.com>）

只要农民工权益有保障，生活得有尊严，
别人怎么称呼其实无关紧要。

年年高喊“取消农民工 称谓”价值几何

雉送 / 文



今日《大河报》报道，1月11日，李方平等8位律师、学者向国务院寄出《公民建议书》，认为“农民工”称谓存在歧视成分，提请国务院在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政府行文中变更“农民工”称谓，并借此推动城乡户籍平权。

无独有偶，同一天《广州日报》的新闻说，深圳市高骊等4名人大代表建议使用“援建者”称呼农民工，以体现没有歧视、体现尊重。

差不多每年的这个时候，从地方两会到全国两会，都有人跳出来高喊取消农民工称谓，听得人耳朵都起老茧了。

为什么要给农民工改称谓？理由也是老一套：“农民工”三个字有歧视意味，听上去低人一等。唯一有“创意”的是，各路精英人物给农民工取的名号有差别，有叫“新市民”的，有叫“新某市人的”，有叫“新型产业工人”的，今年出来个新词：“援建者”。

“农民工”作为一个特定称谓出现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一开始并不带任何歧视性意味。实际上，它相当准确地描述了它所指代的人群的特点：来自农村，有农村户口，进入城市务工。从语言学角度分析，这个称谓很贴切，而且从官方到民间，这么多年叫下来，早已是约定俗成了。

今天之所以很多人觉得“农民工”这个称谓低人一等，是因为这个群体的境遇：他们在城市工作，却享受不到与城里人同等的待遇——他们穿得比较破，身上比较脏，干活比较累，工资比较少……但所有这些，与“农民工”三个字没有一毛钱的关系。所谓农民工问题，说到底是一个权益问题，而非称谓问题，只要农民工的生存境遇得不到改善，你就是叫他们“皇帝”，他们也一样受人歧视。

反过来说，只要农民工权益有保障，生活得有尊严，别人怎么称呼其实无关紧要。比如有一种动物，大陆叫它“熊猫”，台湾叫它“猫熊”，叫什么都无所谓，反正在哪儿它都是宝贝。

农民工是我国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从长远看，“农民工”这个称谓终有一天会退出历史舞台，但这应该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不是专家学者呐喊几声，或者官方发个红头文件就可以取消得了的。这就像改革开放之初的“倒爷”，最开始出现时也带有贬义色彩，似乎都是一帮投机倒把的二道贩子，随着人们对市场经济的理解逐渐深入，“倒爷”作为一种对特定人群的称呼最终消声匿迹。等到哪天进城务工的农民可以享受市民待遇了，农民工不再受歧视了，“农民工”三个字自然成为历史陈迹，就像它当初“应运而生”。

就当下而言，我倒是觉得，保留“农民工”这个听起来有点让人隐隐作痛的称谓，未尝不是好事。它可以时时提醒我们，尤其是提醒决策者和城市管理者，我们的社会还有一个数量庞大的弱势群体，他们应得的权利还没有得到充分保障，他们应该享受的城市发展成果还享受不到，一些制度性歧视

还笼罩在他们头上……这些都是需要努力改变的现状。如果仅仅是在称谓上刻意隐去农民工的身份，看似关怀农民工，实则是一种粉饰。

某些社会精英人物，年复一年地高喊给农民工改称谓，甚至一些地方政府也迫不及待地加入“改名潮”，这就很耐人寻味。有些改名建议，几乎荒唐到了咬文嚼字的地步，比如深圳，从若干年前起，在一些官方表述里就把农民工称为“来深建设者”，今年有人大代表建议再度改名，叫“援建者”，理由居然是“五个字有点繁琐，不如三个字上口”。

“援建者”就不歧视了吗？所谓“援建”，从好的一方面理解，肯定了农民工为城市发展作出的贡献，“恶意”的理解则是：干完活请走人，哪儿来回哪儿去。

（来源：作者授权。博客地址：<http://blog.sina.com.cn/s/blog-48e7892b0100zuue.html>）

实名制与我国一向盛行的管制思维相吻合。公共管理者对实名制的青睐，助长了实名制的泛化趋势，那些匆匆出台的实名制和即将出台的实名制，由于众多潜在和现实的障碍，其公共管理效果实际上只是一种幻觉。

实名制滥用 比避孕药滥用更可怕

朱四倍/文



图片引自“南方日报”

近日，网上曝出“福州实施避孕药销售实名制”。此事经媒体报道后，引发关注，被指这一规定可能泄露公民隐私。福州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称，作出这一规定是为贯彻国家六个部门联合下发的《集中整治“两非”专项行动实施方案》。（《南方日报》12月28日）

尽管福建福州、三明买紧急避孕药实行实名制的理由冠冕堂皇，但更让人啼笑皆非，所谓“为了贯彻国家的要求，也是担心有人滥用紧急避孕药药品”成了一面之词，而在笔者看来，这种实名制的滥用远远比紧急避孕药药品的滥用更可怕，更让人担心。

福建福州、三明买紧急避孕药实行实名制，就笔者的看法，是试图以实名制处方而治百病的歪招，效果实在让人疑虑。进一步说，这是对实名制的泛化和崇拜，一定程度上暴露了管理机关的懒惰头脑和粗暴态度。过于简单的思路，看似对社会和公众的真切负责，实则是政府的一种简单敷衍，使公众蒙受更多的不便和损失。说严重点，就是对公民权利的侵犯。

实名制与我国一向盛行的管制思维相吻合，是父爱主义的延续，实质是法治理念的滞后。君不见，储蓄实名制、证券账户实名制、高校BBS实名制、QQ群群主实名制、上网实名制、献血实名制、娱乐场所实名制，或已实行，或受到了争议，由此造成的假象就是实名制似乎成了包治社会百病的灵丹妙药，只要那里有了问题，实名制就成了救命稻草。殊不知，这是对实名制的畸形依赖和片面崇拜，而公共管理者对实名制的青睐，明显助长了实名制的泛化趋势。可以说，那些匆匆出台的实名制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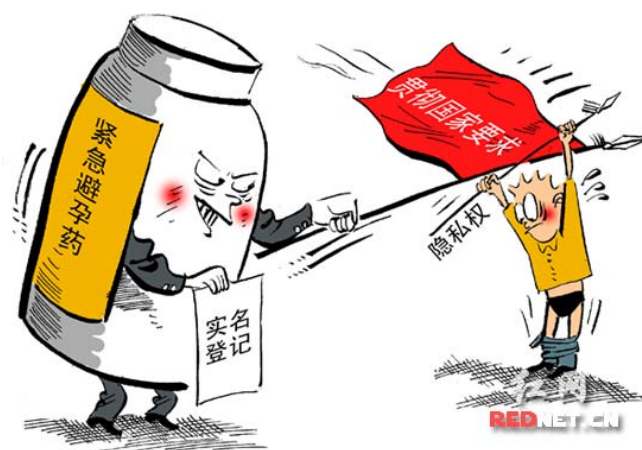
即将出台的实名制，由于众多潜在和现实的障碍，其公共管理效果实际上只是一种幻觉。这是我们不能不正视的。

实名制是指公民凭真实身份参与社会活动的制度，核心是公民应以法定证件证明自己的身份，才能参与一定的社会活动，否则便会受到限制。过分强调社会秩序的安定和管理效率的提高，过分强调国家对社会的单边管制功能，往往是为了保证公权力的实现不惜采用简单粗暴的管理方法入侵公民私权领域。它既损害了公民的合法权益，又无益于问题的真正解决，正因为如此，才让公众产生了“购买紧急避孕药实名没有相应的信息监管措施，可能会被泄露”的疑虑情绪。

面对福建福州、三明买紧急避孕药实行实名制，必须明确，任何公共管理措施的选择，不当是一个单纯的管理民众的工具，更不是为了管理部门的一己方便，而是旨在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保护性制度安排，最终保护的是公共利益和公众私人权利而非其他。不难看出，实名制不仅要求管理部门在宏观层面上对整个公共秩序肩负起更全面的责任，而且要求其在微观层面对个人的信息安全和私人权利，提供更到位的保护义务。否则，就是南辕北辙。

不过，从福建福州、三明买紧急避孕药实行实名制来看，其更多强调的是被管理者的义务，而非权利，这不能不引起善良人们的警惕。关于实名制，朱大可先生曾明确指出，在民众道德自律能力发育不全的情况下，作为一种万金油的技术手段，实名制有助于催促身份主体节制自己的言行，以免破坏道德—法律底线。在这个意义上，实名制的本质就是“实德制”。但这种治标不治本的管制技术，只能向民众转嫁行政压力，迫使后者面对繁缛的查验手续，浪费大量人力资源成本；不仅如此，实名制还逼使民众出卖自身隐私权的核心部分，由此为人权的侵害打开了堂而皇之的大门。

一个简单的判断是，买紧急避孕药实行实名制无法杜绝机会主义行为的出现，相反，成了笑料。膜拜实名制和漠视公民权的同一陷阱——权利忧虑，颇值得反思，而认识到实名制滥用比避孕药滥用更可怕，则是反思的起点。



(王乃玲 / 图 来源：红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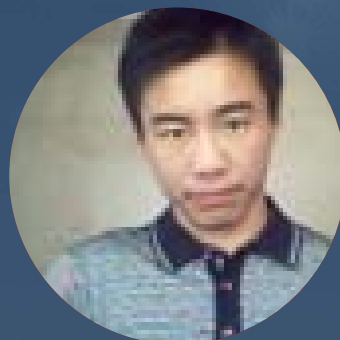
网络恶搞图片

(来源：作者授权。原文地址：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baa5780102dxmm.html)



Philanthropy

星火公益 · 爱是行动



张伟：与帕共舞

张伟，湖南湘乡人，17岁那年他高二，“湘乡三中112班12号”。父亲在桂林打工，给工地上的人们做饭，母亲在一家小型的工厂工作。

在学校里，张伟的成绩常常名列前茅，是学校里的名人，他梦想着有一天能够考上当时全国前十的武汉大学。病魔无情将魔爪无情地伸向了他——少年帕金森病。这种病症十分罕见，因为其特殊的发病原因——大脑部分功能退化，所以帕金森这种多发在60岁以后的老年人身上，常表现为震颤性麻痹。张伟甚至不能拿起笔写字，被迫无奈他离开了自己的学校，远离了自己的上大学的梦想。18岁的张伟在家呆了三个月，不想见熟人尤其是同学。后来去了岳阳农村里一家化工厂，守电解槽，500元一个月，去除伙食费还剩400元。后来又守了一年冰机，环境差，但工资高了150元，张伟说“心里喜滋滋的”。二十岁的他去了东莞的电子厂，希望能够多挣一些钱减轻家庭负担。到了那里，看到周围都是同年人的张伟很开心，因为那里充满了热闹与激情。每天流水线上工作12小时，手不能停，但因为病情的原因手慢周围人也就没有愿意与他一起工作。

受到了极大的打击，又因为身体实在坚持不住，张伟又回到了化工厂，继续守电解槽与冰机。他抢着工作，只想多赚点钱，同时也分散自己的注意力，不去想找对象，不去想以后。为了支持张伟治病，父母拿出本钱开了一家快餐店，亏本了，赔了7千块。终日的工作让张伟的身体越来越差，药量也一加再加。接着，他在长沙一家停车场做保安，不到一年被辞退。他拿出积蓄的8000元钱与朋友一起做了三年熟食生意，由于无法胜任体力劳动，他负责在家中管账。但因为朋友的错误投资血本无归，在仓库中自杀被朋友救起。在亲戚家中，他接触到了网络，决定书写自己的点点滴滴，他给自己起名“与帕共舞”，用它来激励自己与自己的同命人；用它来感恩，感谢父母，感谢生命中的那些贵人。他与他的朋友们在为帕金森协会的成立而不懈努力，在此之前，他想要做一个脑起搏器的手术，就在一个月多月之后的广州第一附属医院。他说他想拥有一个健康的头脑去为帕金森协会的成立做贡献，让人们更加了解帕金森，关注帕金森。



张伟，1984年出生于湖南湘潭的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如今28岁的他，本应该是风华正茂，意气风发的年龄，很难想象如此年轻的他已然在帕金森综合症的阴影中度过了13年。



张伟：与帕共舞，用灵魂在呐喊

于淼 / 文

张伟，这是一个极其普通的名字，普通到可能我们每个人身边都有一个或几个这样的名字，甚至在看这段文字的你就是众多张伟中的一员。然而本文这个张伟，却是一个极其特殊的人，他被从众多张伟中凸显出来，不仅因为他的疾病，更因为他异于常人的艰辛和坚强。

张伟，1984年出生于湖南湘潭的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如今28岁的他，本应该是风华正茂，意气风发的年龄，很难想象如此年轻的他已然在帕金森综合症的阴影中度过了13年，将近他走过人生的50%。

帕金森综合症又称“震颤麻痹”，巴金森氏症或柏金逊症，多在60岁以后发病。主要表现为患者动作缓慢，手脚或身体其它部分的震颤，身体失去柔软性，变得僵硬。在65岁及以上人群中，1%患有此病；在大于40岁人群中则为0.4%。本病也可在儿童期或青春期发病。张伟是最后一类中的万分之一甚至是万分之一的不幸。

少年的张伟十分单纯聪颖，初中便担任校学生会的重要工作。可是彼时天真的，满眼只看得到蓝天旭日的张伟并未意识到病魔已经盯上了自己——这个人生蓝图还未来得及全部展开的孩子。偶尔的颤抖并未让张伟意识到自己已经病了，只是当做简单的紧张而处理了，而这“莫名的紧张”也随着时间的推移堆积成了小小少年的“心病”。

经过不断的努力，张伟考上了令他自豪的县高中。天生的聪颖和后天的勤奋很快让他的成绩如雨后春笋般节节攀升，而在集体中的张伟亦是如鱼得水，得到了老师和同学们的认同。这时的张伟每天都是在笑容中度过，他似乎看到了梦寐以求的武汉大学在向他招手，似乎看到了父母脸上的笑容和以后的一切美好生活。然而在张伟这块湛蓝的理想天空里，乌云也正一点点卷积着，蚕食鲸吞地吞噬着原本该有的万里晴空。

渐渐的，张伟发觉手抖的情况越来越重，同学也反应他动作变得迟缓，声音变得大而模糊，原本清秀的字也变得大又歪。经过多少个日夜的拼命抗争，帕金森这团可怕的乌云最终还是压在了年轻的张伟身上，强迫他放下了手中那心爱的笔。在笔落到桌面上的一瞬间，戳破的不仅仅是写满他汗水的卷子，连同那还未绽放的初恋的蓓蕾和刚刚编织好的美丽的未来也一并被无情的击个粉碎。

从此，张伟一家便踏上了治病的遥途。张伟的家境并不宽裕，父母都是朴实的农民、工人。父母为了医治好张伟的病，几乎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并四处举债。在湘雅医院为他确诊前，张伟一家尝试过各种办法来治病，科学的也好，迷信的也好，只要有一丝希望能治好这病，家人和张伟本人都不遗余力，包括请了仙姑大神，甚至还被恶毒的江湖郎中骗了几千元钱，不慎服用了毒品！几千元钱在好多人眼里也许不算什么，甚至都买不了某些官员的一道菜，一部手机，一包烟。但是对本就不富裕的张伟一家却是雪上加霜。那是父母披星戴月，日夜辛勤劳作，省吃俭用的血汗钱，

更是张伟的救命钱！

看着已不再年轻的父母日夜为自己操劳，懂事的张伟疼在心里。他痛恨自己在这样一个美好的年华里得了帕金森这种疾病，痛恨命运的不公。大学梦已破碎，为了不让自己牵连父母和家人，张伟想到过极端的方式。可是望着水中那张年轻英俊的脸庞，张伟重新燃起了心中的火焰，他有一口气卡在胸口无论如何也咽不下去：他不相信自己会这样被打倒，不相信自己的余生都会在无法抑制的抖动中和父母的泪水中度过！

就这样，抱着不向命运低头的信念，张伟在亲友的帮助下逐步走向了社会，靠自己的双手劳动，创造着属于自己的价值，硬是走出了一条让旁人唏嘘不已的路。领了第一次工资的他兴奋不已，还满怀自豪的给父母寄了本就不多的工资的一部分。多么朴实可爱的小伙子！懂事的弟弟也为了哥哥，早早的离开了校园，走上了社会，扛起来本不属于自己的重担。

如今的张伟已经和有关人士成立了“与帕共舞”帕金森协会，旨在为广大帕金森患者提供一个病情交流和互相激励的平台。张伟自己也开通了QQ空间和博客，也引起了小范围的关注。尽管病痛愈演愈烈的折磨着他，每次抖动来袭，那种从血液里的跳动让他无法自制，浑身燥热，痛苦难安。但他却不低头，使命感让他用自己的生命为帕金森患者社会群体竭力呐喊！

在此，笔者也希望借由《新星火》的力量为他们振臂高呼，在社会上有这样一个张伟需要关注，有这样一个弱势群体需要我们的科学进步和人文关怀，让他们能够像我们每个个体一样工作生活，一样享受亲情、友情和爱情，让这样一个“张伟”回到其他许多“张伟”该有的轨道上！

（来源：作者供稿）

“与帕共舞”：龙城的“保尔”

寒鸦戏水 / 文

十三岁前的他，与其他小朋友一样有着美丽的梦想：他发愤图强，在学校里成绩名列年纪前茅，他梦想成为武汉大学的一名骄子，他想干出一番大事业。

也就是在十三岁的那年，“帕魔”彻底击碎了他的梦想。当初同学们见他手有些颤抖，戏谑他将来就没有当官的命，远在边远农村的他根本不知道帕金森病的概念，随着日子的推移，病情在逐渐加重。十七岁那年，经过多家医院诊断，他终于知道他从此与“帕魔”打上了交道。他顿时感到前途一片漆黑，仿佛坠入到万覆不劫的深渊，他就在人生的起点上徘徊、彷徨。

当他翻阅了许多关于帕氏森病的资料后，他彻底失去了治愈“帕魔”的信心，于是他在三中辍学，走上了打工之路。此时的他只想靠自己的双手去挣钱，减轻一点父母的负担，能供弟弟与堂妹继续读书，让他们能多学些本领，将来更好的为社会多做一些有益的事。他一边打工，一边服药控制病情，



湘乡家园网网友静夫（左）、石哥（右）和张伟（中）在一起

在艰苦恶劣的环境中经受着精神与病魔的残酷折磨。

时间在一年一年的流失，因病情的加剧，他不得不回到了家里，看到同龄人成家立业，他很是伤感，颇有些自卑，他不愿意看到别人异样的目光，于是不愿出门一步，甚至把自己关到了屋里。

后来在湘雅医院治病期间，一个老医师向他介绍了一些被“帕魔”折磨的病人的一些情况：许多得病的人由于对该病的不了解，感到生活的绝望与恐惧！他想到了自己，这么多年自己不也过来了吗！一个闪亮的计划油然涌上心头，他想联系上更多的“帕友”，用自己的正确面对“帕魔”并与之抗争的实际行动一起共勉，同进同退；于是他便有了自己的博客，在博客上他写下了自己的心路历程，记下了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在不断鼓舞着周围的人。

他就是家住湘乡中沙镇中沙村的二十七岁的小伙子张伟，也是新近注册湘乡家园网的网友“与帕共舞”，自从张伟注册家园网以来，家园网网友对其非常关注，大家在张伟的帖子后留言，都在默默地为张伟加油鼓劲！

2012年1月19日，家园网静夫、石哥、寒鸦戏水等人冒雨驱车零距离接触了张伟，见到张伟时，尽管明显感觉到他有些不由自主的颤抖，但张伟坦荡的笑容，打消了我们的顾虑，在面对面的交谈中，张伟很自豪地告诉我们他的博客开通只有几个月，但他的点击率已经上了三万，他说只要其中有一个帕友看了他的文章，他就足够了，他相信他的文章能感动帕友。张伟还告诉我们北京外国语学院的一个姓王的老师已经将他的文章整理下来，准备打印成册发给大学生阅读。当我们问及张伟下部准备怎么做的时候，他接着又告诉我们，他已经与广州一个即将成立的全国性帕金森协会取得了联系，他现在已经开始为其做一些前期资料准备工作。

最后，我们告别张伟的时候，他追出来拜托我们帮他联系上他在三中读书时的生物老师，他说他有许多心理话要与老师说，老师得知他得了这种病后，给过他许多无微不至的关怀与爱护，他要感恩老师。自从他离开学校后，便失去了与老师的联系。

看了“与帕共舞”的发帖，阅读“与帕共舞”的博客，零距离接触“与帕共舞”，我们为眼前的这一位小伙子感到自豪。尽管病魔几乎要摧垮他的肉体，但摧垮不了他钢铁般的意志！用“与帕共舞”的话说：最困难的时候我挺过来了，我不要任何同情，我只想让更多的帕友快乐的生活着。就让我们一起为他加油：我们一起风雨同舟朝前走！

龙城的“保尔”，家园的“与帕共舞”，我们爱你，加油！

（作者系湘乡家园论坛副站长。原文地址：<http://www.25x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20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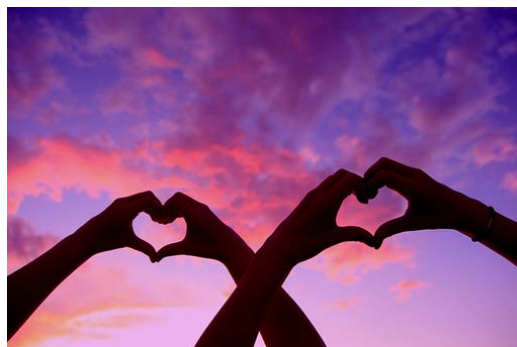
本文作者寒鸦戏水

点滴爱心 浇灌希望

香港城市大学 / 蔡一品

想了很久，动笔写这样一篇文章。

几番推却，考量的并不是时间与文笔，而是在想究竟应该以怎样的身份和角度来看待“与帕共舞”的



事迹。毕竟人生路一人一条，自己走过的只有自己明白，路人的身份无论如何也体会不出当事人真实的悲欢。所以妄加揣测往往变成不负责任的介入。然而，又还是觉得有必要写些什么的。不仅仅是为小伟，也是为了身处同样一个社会的青年。

故事并不复杂：主角，一个少年帕金森病的罹患者，以保尔·柯察金的毅力与病魔做着斗争；配角，同时鼓舞着他也被他鼓舞着的人士。



阅读他的日志，我总有心酸的感觉。小伟因为特殊的人生经历，过早懂事，过早限定了所接触的世界。他对生活的要求不高，只要身体不要恶化得太快，只要老家的亲人不要过于吃力，只要弟弟比他出息，只要还有人能偶尔将他想起，就还有活下去的意义和希望。只有旁人知道，他的人生从一开始就与很多人不同，他的出世决定了他甚至在未曾发觉的情况下错过了许多美好的可能，而他的病症，又再次局限了他能接触的世界。

希望大家看到的，并不是一个单薄的形象，名叫小伟的演员，孤独，模糊，站在人生的舞台之上接受成分复杂的目光。这不是一个人演出的悲喜，而是有着深厚时代背景的切片。背景：农村。试想在美国或者希腊或者日本的农村，会是同一个故事吗？也许大同小异，但绝不会完全相同。所以多了一个地点定语——中国的农村。但若我们足够的乐观，若我们相信历史的发展，五十年前或五十年后（若我们能有幸活到那个岁数），同人必也不同命。所以还应该加个时间定语——21世纪早期中国的农村。切片的背后隐含了多少“与帕共舞”的发生条件：医疗保险不健全，综合援助不到位，收入拮据。不得不说，在这个例子里，略有天灾人祸便捉襟见肘。更为残酷的现实是，先一步发展起来的城市正在破坏机会的均衡。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农村孩子的教育程度和教育质量远远落后于城市。小伟的弟弟上了三本线都让小伟如此欣慰，这种情况让生长在城市的我默然失语。知识改变命运，这句被我们熟知的话放在今日变相为一记响亮的耳光：那些口口声声为这句格言摇旗呐喊的人们却操纵命运之神厚爱城市，遗忘农村。缺失了最基本的改变命运的资本，我们还让小伟以及他的乡亲们用什么来为自己和后代争得该有的向上爬的机会？

身处香港这样的国际城市，我“有幸”能够见证极端的分化：常常有人说起香港，便想到遍地名牌，时尚奢华，灯红酒绿，夜景迷离。不错，这是城市的第一张名片，但是长居此地，便可发现另一个截然不同，甚至有些触目惊心的面貌：内地普通人家卫生间大小的处所，竟可以容纳一家三口，一条街二三十户格子间共用一两个厨房。不仅是这里，即使是在内地，北上广也大有这种发展趋势。城市，特大城市，正在满足少数人最虚荣的梦境，同时也践踏着许多人最卑微的祈愿。这是社会的现实，并且在目光所及的时限内并没有扭转乾坤的希望。

但是作为青年，深感无力的慨叹不应是我们的回答。就算身在坟墓之中，也会对现状不服。世界即将也必将是我们的。还是做点什么吧！如果不能在一朝一夕间撼动这样积弊已久的制度，那么至少，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比如，用点点滴滴的爱心给许许多多小伟一个受教育的可能，一个能变得更健康的机会。点滴虽微，但你我出一份力，传递一份爱，便能汇聚成温暖的河流。

用爱心浇灌希望，给世界一个明天。

（来源：作者供稿）

生命的力量

季梦凡 / 文



微笑着，去唱生活的歌谣。不要抱怨生活给予了太多的磨难，不必抱怨生命中有太多的曲折。大海如果失去了巨浪的翻滚，就会失去雄浑，沙漠如果失去了飞沙的狂舞，就会失去壮观，人生如果仅去求得两点一线的一帆风顺，生命也就失去了存在的魅力

——史铁生

在读《与帕共舞》的过程中，我一直努力去想象彼时面对着数次失败的治疗尝试后依旧颤抖不止的四肢、以及正在渐渐远去的梦想时，张伟心中的恐慌甚至于绝望感该是到了怎样的一个地步。那原本是青春里最为美好的时期，理想和斗志都恰绽放到最为秾丽绚烂的姿态，何况张伟的青春还有着更为耀眼的色彩：一贯优异的成绩，同学老师的信赖，以他为傲的父母家人，当然还有前座那个优雅女孩时常飘进他视野的长发……孰不知帕金森症已然开始渗透他的四肢百骸、蚕食着他光芒无限的年华。或许就是在某次在同学面前演讲而紧张地手掌发抖时，帕金森第一次冲张伟露出了它刻薄尖利的笑脸，并在此后的岁月里，再也没有中断过对他身体、意志和本当美好的未来的摧残。

即使目前的医疗水平已然相当先进，也尚且拿帕金森病束手无策。于是这个对未来无限憧憬满怀斗志的少年，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帕金森渐渐拖垮自己年轻强壮的身体，也拖垮那个原本就不富裕的农村家庭，毁掉他们的期望和现实。光是看看他画了多少笔墨讲述家人和亲友为他的奔走和呵护，平实的字句却写满了感激和愧疚，感激愧疚之余抬头看天却依然找不到能照亮此处的光芒，想来都只觉泫然欲泣，哪里是仅仅辛酸二字能够言尽的？此间种种，不言而喻。

原本没有什么希望可言，医生说了，这是治不好的病，他正逐渐走向的是一条通往深渊的绝路，路的那头等待他的是一具无法劳动工作甚至正常起居的残破却年轻的躯体。然而张伟却在这绝路上点亮了唯一一盏明灯。世上身陷顽疾而能够克服自身困难重新找回自己生活的人不在少数，然而这个已然注定余生要由帕金森陪伴着的青年人，在所有梦想破灭、看不到自己出路时刻，拿起鼠标键盘，以文字为骨网络为翼，把他的灯光照向所有身患帕疾与尚未发病的潜在患者，他向大家传授自己的经验，在《与帕共舞》中详细介绍了患病的前兆、症状、改善治疗方式以及相关药物的知识。一方面，他的普及可以使更多潜在患者尽早意识到自己所处的状况，尽早就医以缓解症状，对尚不知所措的患者也有着极大的理论帮助和精神鼓舞作用；另一方面，张伟也让更多人将目光投向了罕见的少年帕金森病，使得社会给予他们更多的关注和帮扶。

同时，这盏明灯也在照亮着张伟自己的生命。如他自己所言，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网友的祝福和患友间的相互鼓励给予他坚持下去的信念，他也在对帕疾的宣传工作中找寻到了自己人生的价

值。梦想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张伟在信念与勇敢的光辉里似乎依稀看到了前方所谓“绝路”上的无限可能。仿佛是一朵逆风摇曳的花，一片不肯消融的残雪，是亘古鸿蒙里闪电撕开光明的裂口照亮的万线飞埃，是千年沉寂中猛然震动寰宇清明灵台的黄钟大吕，那些无尽的美好和生命的力量。于是除了死亡，再没有什么能打击这个勇敢的年轻人，摧毁他那颗跳动着的永不老去的心。

（作者系南京审计学院学生。来源：作者供稿。）

我们一起 与帕共舞

倪君 / 文

“帕金森太可怕了，一牵手就是一辈子，但必须蔑视它，才能压住它。今天，我虽然还是一无所有，还是受它折磨，但我已经学会了和“他”握手。不慌不忙与“他”相处，又有了自己的理想和奋斗目标，虽然艰难，但能淡定向前行。到这一步，用了十年，这里面的风风雨雨，我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变化。对爱情的追求，父母和我的共同努力以及我失去信心轻生，最后我对生命的真正理解使我轻松面对生活。有许多故事，这些让我成长，希望也能让大家真正理解帕金森病，我取名叫：我——与帕共舞”

——（张伟）

帕金森病，主要是由于脑中黑质细胞发生病变，多巴胺合成减少使得乙酰胆碱兴奋作用相对加强。两者失衡的结果便是出现了“震颤麻痹”。而这种病往往发生在六十岁之后的老年人身上，如张伟这样的少年帕金森病患者实属少见。张伟自嘲道：“这比中大奖还难，早知道我去买彩票了”。

张伟的人生轨迹是这样的：

十七岁的张伟有着自己的梦想，他是班主任骄傲的学生，他梦想着能够考上那是全国前十的武汉大学；十七岁的张伟心中有着一份懵懂的爱慕——那个女孩子，一身干净的校服，一袭乌黑长发；十七岁的张伟初次面对“老帕”，有些不甘心，却又不知所措。

十八岁，张伟向病魔妥协，离开了学校，不想见熟人。去了亲戚开的工厂，一天八小时守电解槽，每月总共500元。

十九岁，他守了一年的冰机，环境很差，可是工资高出150元，“心里喜滋滋的”。

二十岁，他去了广东，做每天12小时电子厂的流水工作。看到周围都是同年人，心中高兴，但身体原因，人们不愿和他在一起，孤独、辛苦伴着他过了新年。受了很大打击，张伟又回到化工厂，守冰机、看电解槽，不敢想未来。之后两年厂子效益不好，张伟有大把的时间空闲，他想着自己当初读书时的梦想、激情，以及现在的样子，感到很迷茫，内心受到煎熬。想着一定要利用现在还能工作，多留点钱，为以后做准备。所以，一有什么活他就抢着做，“苦一点，累一点无所谓，只要能拿到钱”。

二十三岁，父母为张伟着急，带着他在长沙开了一家快餐店。五点吃药，六点才能推着单车出门，

每天一家三口忙到十点多。父母“非常辛苦，瘦了，老了”，为了能正常工作，分担父母的压力，张伟加了一倍的药量。但店最终转让了，“亏得很惨很惨”。在停车场做保安，做了一年，又被老板辞掉了。

二十四岁到二十七岁三年，张伟和朋友一起做熟菜生意，血本无归。“失去了最后的栖息地”，张伟在仓库中选择离开，被朋友发现救活。看到父母急切，心中自责决定为父母活着。

在线采访张伟的时候，看到他不停地播放着《春天里》，没有问，我知道他肯定极喜欢这首歌曲。

正如他自己上所说，十年，他虽然依旧一无所有，但他走出了恐惧颓丧，找到了前行的方向。我想，相比我们大多数人来说，他是幸福的，因为他有了自己的人生目标，并且比我们更加懂得珍惜。

张伟在文章中写道：“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总会想起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有许多值得记住的人和故事，处处被感动着；现实中的我还不够坚强，我也发现许多帕友缺少坚强。”于是他把自己的故事写了下来，希望能够激励自己和与自己的同命人一起坚强生活下去。他还希望通过这些文章，感谢自己的父母与好心人。还因为那个江湖郎中的故事希望给大家治疗帕金森的经验与教训，让大家少走弯路。

由于病情的原因，我对张伟的采访常常半途结束。他的病情已经到了帕病晚期，长期的用药给他带来的是夸张的异动，常常头脑昏沉，思维中断。尽管他一直努力地思考，写作，以保持脑功能不尽早衰退。

尽管这样，张伟还是笑呵呵的。在和他唯一一次视频对话中，我和他聊着湘乡网年会的事。年会上湘乡网的静夫先生等众多网友帮他找到了他日思夜想的高中班主任和同学。我记得那篇《老师，我永远是您的好学生》中，他用了比以往大数倍的字体来表达自己的欣喜之情。他说他很开心能见到自己的老师还有同学们，我相信，我清晰地记得，他的QQ微博名称一直是“湘乡112班张伟”从未改变。聊到关于同学时，我开玩笑是否见到那个一袭黑发的女同学时，张伟不自然地笑了。虽然细微，但我还是看到他有些颤抖，于是我主动提出结束了采访。

张伟说他现在有一个梦想，就是能够和网上结识的帕友们将广东的帕金森协会成立。这也是一直以来支持他的愿望，他希望能够通过他们的努力，将关注帕金森病纳入人们的视线，尤其是农村的帕病能够得到医保上的财政支持。他希望能够有一个健康的大脑去完成这样的愿望，但是高昂的医疗费用却让他望而却步。我从他身上学到了珍惜与感恩，我只希望写下这篇文章能够让你们相信，我们的周围有这样的一个人，在坚强的活着，也许我们的一点点努力，就能帮他成就梦想，让我们这个社会帕病人的声音能够真正让世界听到。



在湘乡家园网的帮助下，张伟终于见到了失去联系10年的老师。

（来源：作者供稿）

他与帕病抗争了十数年，经历痛苦、迷惘，甚至一度绝望，但最终还是挺了下来；他不断追问生命的意义，想做更多有意义的事情，当看到很多帕友正经历他以前的经历，他觉得有必要把自己与帕病抗争的经历、经验写下来，激励大家，同时也勉励自己坚强的活下去，于是就有了《与帕共舞》。目前该系列文章已连载至 28 章，还在不断更新中……

《与帕共舞》序言

张伟 / 文

我叫张伟，1984 年生于湖南湘潭，今年 27 岁了。我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别名：帕金森病人。帕金森病对于老年人来说，比较常见。60 岁的老年人有百分之一是受它所掌控；年纪越大，受它掌控的比例越大。按常理来说，只有老年人才有资格“享受”它的痛苦。它似乎还有些名人的“光彩”。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邓小平的晚年饱受它折磨；有史学家说，如果希特勒没有得帕金森病，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还能坚持些时日，那么以美英为首的盟军就会更加悲壮。哈哈，我这不是在肯定它吗？不是。我是说它对人折磨的威力有多大。而我，才十三岁就有症状，在湖南湘雅医院被诊断为帕金森病也只有十七岁。

医生说：我太特殊了，中五百万大奖的机率都比我大。啊！我中大奖了。我应该……

医生又说：现在要做的是尽可能提高我的生活质量。这意味着我……

那年我才十七岁，读高二，是花季还是雨季呢？

我读书时成绩很好，读高二时是班上的副班长兼学习委员，成绩最好时得过全年级第四，我们那届高考上 600 分的 28 人。班主任信任我，同学们喜欢我，我就像只快乐的蜜蜂穿梭在百花丛中，辛勤地采蜜，生活充实有滋有味！我有信心，有目标，对未来充满憧憬；我的大学，我的梦想，决心考武汉大学。

现在，离被诊断刚好十年。按照农村的习俗，我应该是成家了，正是立业的最佳奋斗时期。可我因为老帕的陪伴，没有任何发展和成就。反而身体和心理倍受折磨，物是人非，有志但不能壮；有心可雄不起来。不知不觉喜欢上了听旭日阳刚唱《春天里》，听着听着，泪流满面，我知道那泪是从心中流出来的，很酸很苦。

身体的恶化，失去了工作，人生失去了奋斗目标。怕连累家人，想选择静静地离开。在最迷茫时，接触了网络，认识了许多帕友，虽然只得到了实验性手术的机会，但很知足了。为了感恩社会的帮助，决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和帕金森协会主席张文军大哥成立帕金森病友基金会，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特别是农村的病人。这也成了我人生的奋斗目标。

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总会想起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有许多值得记住的人和故事，处处被感动着；现实中的我还不够坚强，我也发现许多帕友缺少坚强。所以我觉得很可以把自己的经历写下来，就取名叫《与帕共舞》吧。生命不息，奋斗不止。我写《与帕共舞》来激励自己和同命人坚强的活下去。

目的之二感恩父母，父母对我的恩情用人世中最美好的 最感人的词汇来形容都会是苍白无力地；感恩所有给我帮助，给我温暖的每一个好心人。很希望把这份感恩之情传递下去，也在努力行动着。

目的之三给大家治疗帕病经练和教训，使大家少受痛苦，少走弯路，少花金钱。

同时《与帕共舞》见证了我人生的酸甜苦辣，体现了我人生的价值，诠释了我生命的意义！

生命不息，奋斗不止！我应该赶快去生活，努力去奋斗。

给湘乡市市长的一封信

尊敬的湘乡市市长：

您好！在新春佳节之际来打扰您，实属无奈，请多原谅。本人有困难需要您的关注。

我叫张伟，家在湘乡市中沙镇中沙村一组，是一个得帕金森病十四年的二十八岁小伙子。帕金森病现在是无法根治的，大脑的神经细胞发生病变，在慢慢死亡，病情会一天一天加重，直到瘫痪在床。早期可用药物来维持基本生活，但病情会继续加重，慢慢药物越吃越多，副作用越来越大，控制的效果越来越差。到了晚期，药物会使人产生异动，就是走路一摇一摆，像在跳舞，还会不由自主地乱动；如果不吃药整个人就会僵在那里，不能想，不能动。

我在十七岁得知这情况后，经历了恐慌甚至想到轻生，在家人的关怀下，几经痛苦挣扎，终于站了起来，决定坚强地活下去。尽量使自己做一个有意义的人，做一些有意义的事。非常艰辛在外漂泊了八年后，身体已经无法适应工作，在家呆着，也在苦苦找寻自己还能做什么？体现人生的意义，体现我活着的价值。后来接触了网络，认识了很多的帕金森病友，他们有好多还在慌张、恐慌、惧怕、甚至想自暴自弃，我觉得很有必要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写下来，来鼓励同命人坚强地活下去，我取名叫《我与帕共舞》，我的网名就叫与帕共舞。在帕金森病人和家属中影响很大，给我留言，加我为好友，表示感谢和支持，也感动了许多非帕病的人。湘乡家园网称我为“龙城的保尔”，这是对我最大的肯定，最大的鼓励。我以保尔为榜样，珍惜着每分每秒，希望能带给大家信心和希望。现在又有了新的更大的目标，广州那边要成立帕金森协会，为了更好的为帕病人服务，我将积极参与，奉献自己的所有力量。

这些年，我一直苦练意志，尽量多说，多思考，多写，为了使大脑功能不过早退化。现在已经十四年，已是帕病晚期，药物引起的异动非常严重，已经影响走路和生活自理，药物吃得多引起头脑昏昏沉沉，思维很容易中断，整夜整夜失眠，很难思考和写作下去。现在只有脑起搏器手术能使药物减下来，并使药物副作用消失，只是费用对久病的我和家庭来说是天文数字，最保守估计要二十万。我真想有一个比较健康的大脑去参与成立这个帕金森协会，使人生更有意义，所以我想做这个手术。希望市长关注，在大病保险、民政等方面给予一些帮助，我再找亲戚朋友同学借一些，希望能做。

就像我同学彭德宇说得那样，生命不在于时间的长度，而在于它的宽度。我希望能能在市长和政府的关怀下，生命能更宽些。

此致

敬礼

与帕共舞：张伟
2012年01月27日

张伟公益救助基金募捐倡议

尊敬的社会各界人士，亲爱的同胞们：

当我们昂首阔步地迈进 2012 年的时候，当我们举起酒杯与家人朋友开怀畅饮的时候，当我们捧起书本认真阅读思考的时候，有一位年轻的小伙子——张伟正遭受着帕金森综合症的折磨，在难以自抑的抖动和痛苦中渴望着向我们一样平常的生活。

张伟，湖南湘潭人，今年 28 岁，年轻的他已罹患帕金森综合症达 13、4 年之久，也因此不得不半路辍学，远离了大学梦。张伟一家有 4 口人，目前弟弟在家照顾他，家里月收入平均 2500 元左右，靠已年长的父母打工赚取，七十多岁的奶奶为贴补家用至今仍埋头于农田，而张伟每月医药费用在 500 元左右。自患病以来，张伟家已经四处举债，现已举步维艰，日常生活十分节俭。

帕金森病现在是无法根治的，大脑的神经细胞发生病变，在慢慢死亡，病情会一天一天加重，直到瘫痪在床。早期可用药物来维持基本生活，但病情会继续加重，慢慢药物越吃越多，副作用越来越大，控制的效果越来越差。到了晚期，药物会使人产生异动，就是走路一摇一摆，像在跳舞，还会不由自主地乱动；如果不吃药整个人就会僵在那里，不能想，不能动。如今张伟即将面临一个很有希望的手术，手术费中的脑起搏器大概需要 20 万元左右。一家人在高兴之余又皱起了眉头——昂贵的手术费用。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播种爱心，收获希望。同胞们，我们的一份关爱，一双援助之手必将改变这个年轻人的命运，一个家庭的命运，甚至是帕金森患者这个弱势群体的命运。如果我们能在自己承受范围之内捐助一定的财物，那么涓涓溪水必将会成爱的河流，撑起年轻人的生命与梦想，撑起这个飘摇的家！请您伸出援助之手，拉帕金森患者张伟一把吧，让爱的星火可以温暖这个家，照亮我们的社会！

请将善款汇至以下账号：

- 1、张伟 - 中国建设银行：6227 0029 3022 0205 776（具体开户地址：湖南省分行湘潭建设支行湘乡建设支行广场分理处）
- 2、张伟 - 支付宝账号：13707321623
- 3、张伟救助志愿者群：189987098

您现在的一份爱心，将点亮一片光明的未来！

祝福寄语

Hez5208: 看后我很感动，你的精神鼓励了我，你的事迹我已全部下载。开学给我的学生好好看看，他们一定会支持你。谢谢你在精神上给我的鼓励，在你面前，我的这种小病算不了什么，谢谢！

莫尼卡: 每次看完你的文，我心情特别沉重，我都不知要说什么好，我只能默默的祝福你，能早日好起来，你一定要坚强，你并不孤单，还有你的父母，还有我们，还有所有关注你的人大家都在为你祝福！坚强！！加油！！一定要让自己开心。

人间四月：我是北外的王老师，与张伟共勉。霍金多活了 50 多年，现在还活着，这就是生命的奇迹，我相信你一定能成就生命的奇迹，开心，快乐地活着。

红袖添香：一直在看你的日志，为你如此年轻遇到帕病而感到不公，为你因为治病遇到的江湖骗子郎中而感到痛恨，为你家人的亲情温暖而感动，更为你的坚强的表现而佩服，你一定要继续你的坚强，要坚定战胜帕病的信心，我也是帕病的亲属，虽然没有切身的病痛感觉，但是也了解帕病的痛苦，你一定要坚持，现在有很多的药物及治疗方法，只要加上自身的锻炼，控制，一定可以控制的较好的，你还这么年轻，医学发展的这么快，以后可能会有完全治愈帕病的方法，一定要坚持，我们大家一起努力，与帕共舞：

罗海波（多年好友）：兄弟，和你在一起生活了好几年，亲眼目睹了你与病魔作斗争的艰难和痛苦。但毛泽东说过：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与病奋斗，其乐无穷。坚持，坚持活着，活着就是希望。你走出来了，就是奇迹，奇迹人生。

阳光（帕病家属）：看了过后，最真实的感受就是想痛快的哭一场；真的，好几次眼泪都充溢了眼眶，自己强忍着没让眼泪掉下来！我想我会找一个合适的机会让自己哭出来，不能太勉强自己了。这眼泪是一种幸福的泪水，是作者战胜帕病那种志强不息的斗志所感动的泪水；这样的泪水流得值得。

金鸽（帕症病人）：看了你的日志，我哭了，我也是帕病人。这其中的痛苦和委屈只有自己知道。求医的艰难，我告诉自己坚强，坚强，再坚强。只有活着才有希望，我们一起努力，阳光总在风雨后，加油，加油！

布衣散人（帕病家属）：我老伴也是帕病人，得病十三年，退休前是一位高中教师。她哭着看完了你的文章。祝福所有的帕病人，你们要坚持，人类科学没有忘记你们，说不定很快就能攻克帕魔，坚强的活着，为了身边的人。

蓝天白云（帕病家属）：很高兴认识你，你的文章很不错，加油哦！我先生得病五年了，时间过得真快，我小孩几岁，我先生就得病几年。我相信随着科学知识的发展，帕病是能被攻破的。这病很折磨人，但能坚持到最后，就是胜利。好好活着。

十四（湘乡家园网网友）：也许，病魔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但病魔决改变不了我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我们钢铁般的信念，生命的舞步决不会因病魔而凌乱！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加油！为自己加油！为生我们养我们的父母加油！为爱我的我爱的人加油！为关心我们的每一个人加油！祝你更自信！勇敢！坚强！坚毅！开心！幸福！健康！

谭老师（班主任）：笑对人生，永远做生活的强者。

李丹：此次是毕业十年后相逢，在此祝你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只要有坚定的意志，一定能战胜病魔。

黄静：十年前，你一丝不苟的学习态度是我们的学习榜样，十年后的今天，你自强不息的生活态度也让我们感动。祝你早日战胜病魔。我们永远在内心为你祈祷，祝福。

张文：我们是你坚强的后盾，永远相信你，支持你，朋友，加油！！

寻琦：无论困境，安逸，都是生活的一种色彩，关键是态度，愿你笑对人生，明天会更好，二十年同学相聚，我们依然共同举杯。

彭德宇：人生的长度无法控制，但宽度可无限延伸。

彭亮：坚信张伟是最坚强的男子汉，我们一起面对未来的困难，祝张伟早日康复，美好的未来等着你去开创。我现在事业刚起步，只要有点发展，全力支持你。

文星：你的坚强，顽强，让我非常钦佩。老同学 希望你早日战胜病魔，勇敢地活下去。

NOTES
散文随笔

相见不如相望

——流浪中的第一个美丽意外

醉仙望月/文



几米作品《向左走 向右走》

相见是未必的了，而这相望的意义，会让人觉得如果真的相见，反而亵渎了。见不到，擦肩而过，听上去像是更美好的结局。

在 K651 次火车缓缓驶离的那一刻，心情其实并不那么美好。也曾为甲天下的山水深深沉醉，也曾骑车环游城中，忘记不少旧事。我以为，我终于找到了流浪与云游的感觉，那已经失去了许久的感觉，与最重要的——激情，那自从上错大学以后便一去不返的对未知事物的热情。然而，之前的一天是光棍节。这样的日子，积郁许久的心事，还是爆发了。就站在两江四湖之一的桂湖之畔，我写了很多推文，都是心内的独白，将这一段时间内剩余的情绪，统统融进了文字中。自信还是保持住了修养，没说假话，也没爆粗口。至少表面上，像是在叙述别人的故事。尽管如此，依然可以认为我在发飙。我在质问，只是用着颇文艺的腔调，而且没有 @ 上当事人的推号。结果可想而知，我终于收获了一直想得到的那一个 unfo，加上 unlisted。这一次，终于不可逆转。

照理说，我是得偿所愿，求仁得仁的了。然而，在获悉被 un 掉的那一刻，心头的那一凛最终还是不期地出现。即使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在真正到来的时刻，还是会给人以相当的触动，就算自以为心理准备已经做足。就如我在当初表白之前，其实想到过无数拿了好人卡的可能性，和拿到卡片之后自己会如何反应，而这并不足以在这成为事实之时对控制我的情绪起到什么正面的帮助。这样的性格，自知不好，却难以改正。再加上前一天晚上的睡眠不足（当然这是住在青旅的常态），因此，离开已经停留了 5 天的桂林的时候，心头的惆怅与不安，多少还是压倒要开始一段新的旅程应有的兴奋。人是容易软弱的动物，面对未知而又疲倦的时候，这样的不安感总会涌上心头，成为人在前进路上的极大阻力。

目的地是柳州，这是没什么悬念的。另一个没悬念的事情是，在柳州不会得到招待。相熟的推友润音在数日之前我还在怀化的时候便说了自己有为安全考虑，不见网友的原则，我对此也只能表示理解。这样人尽皆知的大环境下，不活得谨慎一些，还真不行。何况，自忖何德何能，何以能给人以安全感与信任感。柳州只是中转之处，待上一夜，略微逛一逛，亦足矣。

抱着这样的心态，当绿皮火车抵达柳州火车站的时候，困惑之情超过了到达目的地的轻松感。必须在刚结束一段旅程的时候就立刻决定下一站究竟将往何方，这对我并不陌生，却始终无法真正学会如何去处理，做出决定我总归会在某一时刻后悔。走出出站口，我选择了向左，很简单的原因，要去售票处看看有什么车，票好不好买。这一念之间的决定，可能就是一生之憾，而在那时，我并不知道。

沿着飞鹅路笔直前行，这一段的市容实在难给人留下好印象，路面不干净，物价也高过身为旅游城市的桂林，街景亦谈不上漂亮。润音很贴心，虽然说了不见人，却发了很多推介柳州的风土人情，值得去的地方，和合适的住处的位置。一面看推，一面看路，一面想着待上一夜就好，肩背手提地

走到了柳江边上又折回，终于还是在火车站与汽车南站之间的一条小巷子里找了一家勉强可以被称为“家庭旅馆”的地方。价钱和前几天在桂林住的青年旅舍一样，30块钱，环境却是两重天。木板床上铺设着应该是洗过的，看上去却怎么也洗不干净的被褥，而一台破电视机成了房间里唯一算得上“设施”的东西，当然我最终也没打开它。卫生间是公用的，还在楼下。其实有40块钱一晚独立卫生间的，不过还是省省吧。

手头终于闲下来，拿出手机看推，扫了两眼，就愣住了。来自自己的门神（mention），多了几条带图的推文，图片上显示的是自己在一个小时之前还在的柳州火车站，而发图的人是……是“从不见网友”的润音。

再仔细阅读推文，眼睛多少开始模糊。原来润音从自己的住处，将近10公里之外的地方步行一个多小时来到火车站，而只为看我一眼。也许是熟悉火车站的构造，她和因为不放心她而陪着她的表姐站在了出站口的右侧，她既知我坐的车次，必然已经看到我；而我，偏偏没有往那一侧看，自然，便是错过。润音推上来的图中，有她那时的照片，我承认，我没有印象，一是确实想不到会如此，二也是心依然平静不下来，总有“要做的事情”，也就忽略了身边很多近在咫尺的细节。这也是人的通病吧。我已经躺下，而她还在步行回家的路上，经济拮据，不愿多出一块钱坐车，却还是步行来到了火车站。这份情意，就算你口中不言，我口中不言，说不被感动，也都是在装。何况，作为一个不久前，或者说就是在之前一天刚为女子所负的人，感动无疑还要扩大几倍。无论见与未见，墙头马上，也不及这一望。偏偏，我没有当时得知，这也是天注定的。我太钝了。

在那一刻想到了什么？几米的《向左走向右走》？也许吧，这是最经典的桥段。不过浮现在我的脑海中的，是《黄祸》里的一个片段，石戈在陈盼离开之后十分钟看到了陈盼留下的纸条，当他疯狂的沿着陈盼离开必然经过的那条路追去的半途，却被正事拦截了下来。这一停歇，便是永诀。当然，这样的比喻多少有些不伦，也不恭，而解释我当时的心境，却正合适。不后悔，是不可能的，也许多驻足一会，便会望到当望之人。相见是未必的了，而这相望的意义，会让人觉得如果真的相见，反而褻渎了。见不到，擦肩而过，听上去像是更美好的结局。

还有后来才知道的，润音为了看我一眼，来回步行3个小时，回到家之后发现左脚后跟的皮肤开裂，血染到袜子上并与脚粘合起来，泡了一个小时的热水才分离。真的是冤家啊！我明白，再不有所表示，即使别人不说我负心，我自己也很难原谅得了自己。在夜幕降临，小睡醒来，沿着柳江边漫步，抬头观赏农历十六天上的一轮明月之时，主意已经抱定。

柳城区的中山路步行街，在柳江大桥北侧不远之处。周六的夜晚，格外热闹，人流如织。坐在中心的花坛上，牵手的情侣时不时地走过，迤逦徐行在流光溢彩之下。自己在最心存绮念之时，所思所望亦不过如此，看似装纯情，却是心中最真实之感。太classical了，只能摇头笑笑告诉自己。这是一个经典在不断死亡而又看不到重生的希望的时代，谈欲望显得反而更近情理一些，说理想，就未免太伤人了。纯纯的，用拼音一打，就是蠢蠢的。理想化的想法，会让人难以相信；而被现实所教育之后，极容易往另一个极端靠拢。自己会不会有这样的危险，尚不可知；只知道，用上一次的错误来修正下一次的作为，在人情一类的事情上，是行不通的。

第二天醒来，已近中午。润音公开了自己居



柳江夜景

住的小区，我提前一天便查阅到了该走的路线，走到当去的公交车站却颇费一番周折。没有走到一半用手机查谷歌地图的习惯，除了手提有拎包之外，定位不准也是问题。好在自己认路感一直是少有的真正能自豪的地方，最终还是找到了坐车之地，并很快搭上了一班公车。在车上坐定，拿出手机发了条推：“在公交车上，为了昨日来回步行两个多小时只为远远一瞥的还愿”。到了目的地，小区的门口，又发推说：“不求见到某人，只求心灵宁静”。其实，内心里何尝不希望最终能够邂逅。

想着7月11到13号这三天，自己正是如现在般，肩背身垮手提同样的三个包裹，漫步在成都的街头巷尾，就这么四处寻觅，幻想着，始终幻想着能和某人偶然相遇，而最终不得。当然，此时彼刻，心境完全不同。那时，伤心气愤；现在，感激惶恐。坐在小区内的长椅上，发了两张图，吹着风，宁静致远。

最终还是收到了润音的回复推文，原来她是在小区的另一端，而且已经在去别处的路上了。人生匆匆，旅途茫茫，缘分天定，坚信自己的理想与信念，期待自由花儿开。这不仅仅是润音对我的回复，想必，也是对所有在这个世间，在这片被诅咒了的土地上，尚存着赤子之心，尚相信人间还有真情，还有正义，还有良知的人们的鼓励与肯定。润音并说，一家很有名的螺蛳粉的分店离我很近，我只能谢谢好意，昨晚吃了两碗，有些腻了，承受不起了。能认识这样的奇女子，已经足矣。不敢再奢求过多。

很快，我便重新坐车离去。未曾相见，反而美好。让这朦胧维持下去，倒是一则颇值得提起的故事。来到鱼峰公园前，参观过大韩民国临时政府陈列之后，便一口气登上鱼峰之巅，俯瞰柳州城，阳光明媚，虽有些燥热，还是舒畅至极。这样的回忆，在未来的某一天，偶然被拾起的时候，还是会泛着甜甜的蜜意吧。

（本文来源：作者供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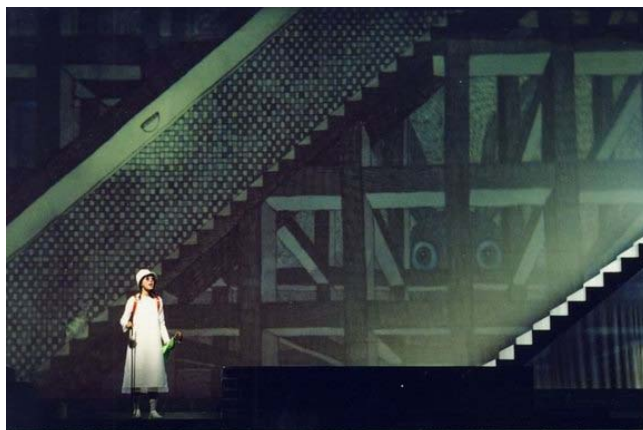
鱼峰山顶俯拍柳州城



地铁是一个狭小的空间，把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拉的很近，大家都在一个封闭的空间里，也只有这样小的空间里，诸多陌生的人才会产生一种联系，或者发生一段故事。

城市的夜归人

刘洋 / 文



临睡前，脱下外套似乎就是卸下身上的担子。这个时间，通常都在深夜。

我也是一名城市的夜归人，每天的 10:00 左右，家里总是给挂个电话问问在哪儿，什么时候回来。电话响起的时候，通常我都还在城市的夜幕之中。我也是城市夜归人中的一员，和上面的照片中的三个人不同。我既不是站台上的等车人，也不是马路上等接送的人，更不是乘坐出租车的人。我习惯于地铁，哪怕是地铁总是出事儿的那阵子，也不例外。

对地铁，有一份特殊的情节。手上正在拍摄的有地铁，其实并没有刻意的去做，只是每天生活中都离不开地铁，相机拿在手上，打发路上的时间罢了。在我三点一线的生活里，早晨要乘地铁，晚上回来也会选择地铁。因为地铁 6:30 左右是运营，23 点左右末班，所以我的城市生活也被严格的控制在 6:30 到 23:00 这个时间段。地铁快，不会堵车，没有红灯，安排起时间来相对的可控，乘坐地铁的习惯，不过是我性格的一个延伸。上海的地铁几乎无所不能，朋友告诉我在上海，能不乘公交就不做此选择。上海去了几次，别的没带回来，乘坐地铁的习惯倒是从那之后慢慢的养成。地铁是一个狭小的空间，把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拉的很近，大家都在一个封闭的空间里，有时候真有点一根线上的蚂蚱的感觉。只有在这样小的空间里，诸多陌生的人才会产生了一种联系，彼此之间才会多一个关系。所以才会有《地下铁》这部漫画吧，所以才会有《地下铁》的电影，才会有《地下铁》这首萧亚轩的歌曲。一个个互不相识的人在一个被动的情况下产生联系，这本身不就是一个神奇的事吗？不知道有没有地铁里相识相爱这样的奇迹发生，不知道上次把地铁站偶遇的美女照片发上微博的那位男士有没有找到他心仪的那个姑娘。

今天晚上是最近一个月里最轻松的一个晚上，上次看电影恐怕要追溯到《大武生》公映的时候了。鱿鱼还是一样的好吃，卖鱿鱼的老板今天看上去心情不错，尽管人多，还是操着南京话和我搭了几句。今天点的比前几次都多，可晚上回来以后，阿贝在微博上告诉我还想再吃。很特例的，这几日一到夜里就会饿，要加餐，今天吃了几串鱿鱼和炸的东西，吃了一碗并不是很喜欢的芋圆，到现在都还没觉得饿。或许真的是因为放松了，这个周五过的才像个临近周末最后一天上班日的样子。上午开会，开完会就已经中午了，食堂吃过饭困的不行，在报社的沙发上饱饱的睡了一觉，尽管中途醒了几次，睁开眼睛的时候也极不情愿，但还是在清醒之后状态良好。下午把昨天采访的照片发给编辑，把我留下来的那四个小时里了解到的东西告诉记者。和编辑讨论出了我们着手开始做的第一个方案。忙完所有的事情时，窗外的天已经黑了。把在报社整理好的片子拷进优盘，抓了东西就赶紧的去电影院，还是让阿贝等了我好一会儿。时间还来得及吃几串鱿鱼，狼吞虎咽的一盘子下肚，半饱的肚子也可安心的让我看电影了。以前不喜欢吃爆米花，今天的一个小份爆米花有我一半的功劳。一边看电影一边吃爆米花，喝着瓶装的奶茶，借着昏暗的灯光没人注意，懒懒的瘫在椅子上，很是惬意。

电影选的也很好，不是让我心血澎湃的柯南剧场版，是一部很小清新风格的台湾影片《星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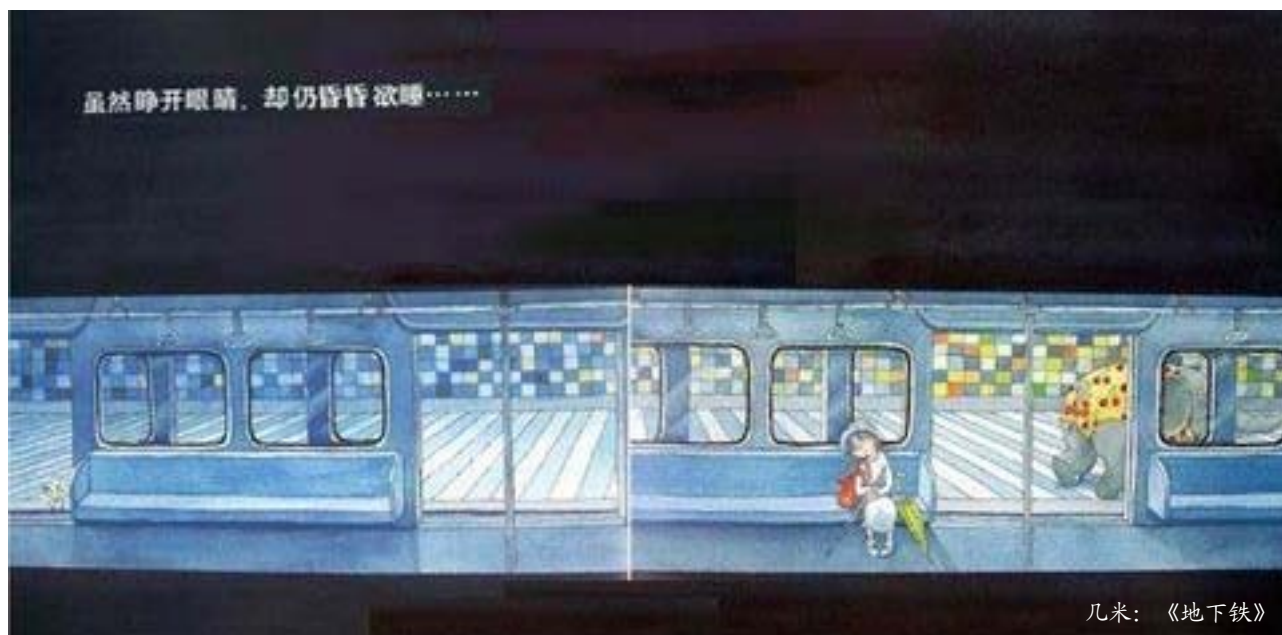
《星空》本是最敬仰的梵高先生的作品，在影片里虽然出现的不多，但从以此为题来看，就知道占据一个挺重的分量。星空下繁星点点，这可能就是几米想要的那个世界。我在微博里总是忍不住想说“电影改编自几米的漫画《星空》”，对几米，他的《向左走向右走》看过，《地下铁》也看过。翻这两本漫画册的时候，是去年书店姐姐没有毕业，小书店还在营业的时候，书店姐姐说从我选取的几句话能看出我是一个有故事的人。几米的漫画就是这样讨厌，总是让人想起自己。电影版的《向左走向右走》我也看过，而且似乎不止一遍，梁咏琪演的很好，我很喜欢。《星空》的感觉和那两部不同，把成人的爱放在两个孩子身上，纯纯的，只是感觉。这样简单的一种感觉让世界成了梵高《星空》的世界，小火车开向一个温暖的世界。片子里的小木屋我很喜欢，不过我知道我耐不住大山深处的寂寞。木头雕出来的大象我也喜欢，断了一条腿一瘸一拐的走在路灯下的画面很是难忘。小杰背着发烧的小美在草地上奔跑，一抬眼雾散了，星空露了出来。小美在小木船上对小杰说：“我真想你可以看一次星空”，我也很久很久没有见过星空，尽管我总是个城市的夜归人。

南京很少可以看到星空，后来看了大家的微博讨论我才知道，原来，没有星星的不仅仅是南京的天空。曾经在郊区上中学的时候经常在晚自习下课回宿舍的路上抬头看星星，不管心情好与不好总有一颗最亮的星星在看的见的地方出现。看到那颗星星，心就安定。后来上地理课知道那是金星，是指引猎人回家的星星。在这个问题上，我还是呆呆的相信那是我的守护星，直到现在，每天在家门的时候还会抬头望上一眼，确定它高高的在那儿再进门洞。星空下的草地是不是很美？星空下的世界又是个什么样子呢？希望有一天，我可以躺在草地上仰望星空。

这会儿的微博页面上有几米的《向左走向右走》中的一幅画，配的文字是：很多人闯进你的生活，只是为了给你上一课，然后转身离开。感谢那些曾经走入我生活中的人，虽然你们已经转身离开，但留给我的，我一辈子都会悉心呵护着。“在放手之前，能握多紧，就握多紧”这恐怕是《星空》里看上去最神秘的一句话了吧，我添一句：在放手之后，把紧握的手，慢慢松开，带着微笑，讲那些人和事送走。

习惯了晚睡，这个点是应该叫今天，还是明天？故事就写到这儿，关电脑睡觉。

（来源：作者供稿。）



对于人类这个世界，所有的矛盾终究都是利益与立场的冲突，所有的理论都是建立在假设基础上的一种努力。

人的理由

张志华 / 文



由于重温了李敖当年来大陆的三场演讲，我和王鹏都有所感慨，也由此引起我的一些思考与感念……我想李敖当初在拟题为“金刚怒目、菩萨低眉、尼姑思凡”应是饱有意蕴的，这是否是他从青年到老年的一种写照呢？是不是从天上金刚还俗为红尘男女呢？刘军宁原来谈及李敖时，他说他更喜欢年轻时的李敖，话头里稍有保留，我想也是在给自己的未来留一种可能性吧，好坏不置可否。

王鹏说，“李敖05年在北大的时候还是那么勇猛精进，现在倒是变得油滑和讨好了，没劲儿了”，而我思考的是一个人行为言语的归因，即“他为什么今非昔比”，“为什么”是我思考的核心，也是每个人提升认知境界的必经之路。因此，我回复他“所以我们需要警惕的是，我们年轻时像他年轻时的他，年老时像他年老时的他”，这种现象的出现是警惕，也是怀疑。警惕的是一个有才具的人被坏人利用，为虎作伥；怀疑的是每一个有感情的人被情感束缚，作茧自缚。

李敖的年数可以做我这一辈人的爷爷了，他年轻过，华丽丽的是一个历史见证人，而且感觉他的青春期特别久，才华与艳遇让所有少男眼馋。他所经历的一切，我们都没有经历，但是我想对于人心的历程，大致相仿吧。自从他做了前列腺手术后，那股顽强的生命力（也就是王鹏所谓的勇猛精进）也黯然归寂，不能说是消沉，只能说是仁慈吧，因为这是我从他一生的言语行为来判断，他的内心很善良，只是这种善良，有时候是会把原则暂时放在一边，所有我不由的想起罗素的一句话，大致是这样“我不敢永远坚持我的原则，因为我不知道我所坚信的原则是否会欺骗了我”。

所以生命力的顽强，看来真的是与荷尔蒙多少有关。但我更愿意从死亡的角度去看待生命与生命力，之前与一位生物学博士和一位文艺女青年讨论“生命”这一广博的概念，两者给出的答案完全不同，前者说生命是运动，后者说生命是光明，我稍微做了一点修正，对于前者，我说运动不是生命的本质，而是生命力的本质，至于生命，则是与死亡相对的一个领域，在此领域的管辖范围内，一切皆有可能。对于后者，我说光明不是生命的本质，而是生命所依赖的条件，深海中的微生物，没有光明与温暖，他们的存在难道不也是生命的一种表现吗？

套用我之前所谓的“在”与“存在”的关系来看，生命有如在一样恒久，而生命力则如存在一样短缺。自然界包含有生命与无生命，这是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的，如果从文学或物理学的角度去分析呢？什么不都是在做着或明显或隐藏的运动吗？而且恰恰是无生命的岩石泥土，比有生命的动植物所要存在的长久、稳定。

所以我原来在课堂上讲到，对于人类世界而言，死亡比生命更重要也更常见，因为这是宇宙自然中最不可更变的规定，如果人类永恒存在、不死不灭，那恰恰是最不自然的了，而且也不太可能产生出未来比人类更高明的动物来，我相信在人类的局限性范围内，要在时间维度的掌控下有所突破，还是有一定难度的。我以地球曾经存在过的恐龙为例，假如恐龙没有突然灭绝，人类又怎么可能有机会占领这个地球呢？那么同样的思维方式推理下去，若干年后的瞬间，人类会象恐龙一样突然灭绝、消失，整个地球上的生物也会重新分配权力。这是一个自然的规律，也是一个良好的状态，即从死

亡中获得新生。

我在课堂上还举出另外一个例子来说明 UFO 的存在或外星智慧生物的存在，这是另外一种思维方式。人类之所以了解周围的动植物，前提是人类比这些动植物在思维及行动方面高明许多，那么犹如人类在一个圈笼饲养猪牛羊、鸡鸭鹅一般，我们人类在这个宇宙中的小地球上生活繁衍，是不是一群由某种比人类高明的多的外星生物放在地球上的一群“猪牛羊、鸡鸭鹅”呢？

我每接触一个新的班级，第一堂课都是告诉他们，人类社会发展出来的诸多学科与课程，无外乎回答以下三个终极问题：the origin of universe, the origin of human being, the origin of knowledge, 所以对于终极性问题的回答，宗教对于人类而言必不可少。而这里的第二个问题，则是某种程度上的宗教性意义的质问，人类的英文有“humankind”和“human being”或“man”这三种，第一种是生物学层面的人“类”，强调与地球其他生物“种类”的区别，而后两者则是哲学意义与宗教意义的“存在”了，这也是学习外语的好处——语言的明晰性只有在对比中才能看出来，汉语缺乏英语这种系动词的变化，即 be, being, is, are, was, were。

因此，Hamlet 中的那句最经典的话 To be or not to be 并不能简单的解释为“生存还是死亡”，因为这句话的意思接近“存在还是虚无”，是对生命意义的一种回答，是对道德困境的一种解释，是对各种可能性的一种尝试——即面对死亡的沉寂，有意识的生命是开放的，这种开放保证了人生主体的多重可能性，我想这也是西方社会为何禁止死刑的一个因素吧。在此，我推荐学生们去看一下布拉德皮特所主演的《七宗罪》，电影最后的那个面对杀人犯把警察怀孕的爱妻杀死后赤裸裸的展现给警察的情景就是“To be or not to be”这样的一个困境，如果观者不了解英语词汇中所隐含的意蕴，要了解一部经典电影是很难很难的。



《七宗罪》剧照

因此，文化里面所隐含的语言的本意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可翻译的，对于语言中的这种不可翻译性，我提到的是中国的诗词中的意境，这种文化中的意境与韵味如果通过语言的转换或翻译，就完全会丧失掉。例如王国维所谓读书做学问的三境：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我还常举的一个例子是柳宗元的那首《江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一个老头去一个鸡不下蛋，鸟不拉屎的地方钓鱼吗？老翁恐怕乃是一位武功绝顶的世外高人吧。

我告诉王鹏我在课堂上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对于人类这个世界，所有的矛盾终究都是利益与立场的冲突，所有的理论都是建立在假设基础上的一种努力，这种努力试图去解释与解决人类社会这些冲突与矛盾的起源、发展、终结等归因与过程，那么既然诸多理论——包括科学中的理论——是假设而非真设，那么这些理论中就不仅包含有真理亦包含有假理，也恰恰如此，科学才能不断的向前发展，由一种假设去弥补前一种假设的不足或缺陷，甚至是推翻前一种假设的假理，而试图建造一种真理。这是我通过观察数学与物理学的发展所领悟出来的规律。因此，我上述的两种对于人类未来及自然宇宙的幻想均是对人类起源的一种尝试性解释。

2011年9月26号写于烟台南山学院

(来源：作者供稿)

■ PERSONAGE/人物

一个被杀害于法治荡然无存的疯狂时代的“被精神病者”，在冤魂回荡41年后，终于被彻底昭雪，有人称之为“迟到的正义”，也有人称之为“法治的胜利”。正义的确来得太迟，当事人等得太久，可这一案件折射出的各种背景却具有重大的历史价值。

王佩英之警示

杨银波/文



王佩英（1915年3月14日－1970年1月18日）出生于河南开封，原铁道部铁路专业设计院职工，因对毛泽东持异议并公开支持刘少奇，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名遭迫害、处决，后获得平反。

“被告人王佩英无罪”

“被告人王佩英无罪”这八个字，在2011年6月9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1高刑提字第304号）》中，终于每个字都昂首挺胸地站了起来。“被告人王佩英无罪”的第一个历史事实是，在没有共和国第一部刑法前的1970年1月22日，文革司法机构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法军事管制委员会，下达所谓“判决书”，判决王佩英死刑，罪名为“现行反革命”，5天后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10万人“公审”大会，将王佩英残忍杀害。第二个历史事实是，在有了共和国第一部刑法后不久的1980年3月7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王佩英有精神病”为由，作出“不负刑事责任”的判决，用心良苦、定论荒唐地为王佩英平了反。一晃，又是31年过去了，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终审此案，得出结论，依据现有证据不能证明王佩英具有“推翻人民民主政权，破坏人民民主事业”的反革命行为和目的，由此撤消此前所有判决书，换之以庄严的八个字，“被告人王佩英无罪”且一锤定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即法院对案件的最后一级判决。

一个被杀害于法治荡然无存的疯狂时代的“被精神病者”，在冤魂回荡41年后，终于被彻底昭雪，有人称之为“迟到的正义”，也有人称之为“法治的胜利”。正义的确来得太迟，当事人等得太久，可这一案件折射出的各种背景却具有重大的历史价值，唤起全民族对黑暗岁月的记忆与反思，唤起法律人对国家法治历程的追溯与审视，唤起公民重新考量法律与政治的关系，回首过往的道路上，法律如何成为了政治的奴婢和打手，政治又如何绑架了法律、践踏了法律。如今，王佩英的事迹已经传遍天南地北，社会公祭之，网友力推之，关于她不寻常的人生历程的纪录片和书籍，被民众积极传递，无论经历过或没经历过文革的人，都能从中找到震撼的警示。这个在文革中因为说真话把命都搭上了的烈女，越来越成为民族记忆，甚至有学者呼吁将她的事迹编入教材，让后人记住即使在那样一个万马齐喑的时代，也仍有王佩英这样的平民英雄“虽亿万人吾往矣”，为中国人挽回了一点颜面。

《公安六条》的破坏力

关于“王佩英是怎么死的”，这个问题郭宇宽在《王佩英评传》一书里已经做了许多剖析。我想再补充一些。1970年1月9日，离王佩英被杀害还有18天，离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还有22天，这一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发出了一个“只供内部讨论，不准张贴”的《通知》。

《通知》说：“为进一步搞好战备，加强对一小撮反革命势力的专政，准备最近再召开一次公审大会，宣判一批现行反革命分子，以狠狠打击反动气焰。现将杨淑辰等20名罪犯的材料发给你们。请各界革命委员会，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组织革命群众认真讨论，提出处理意见，速告公法军管会。”其中的杨淑辰等20名罪犯，就包括王佩英、遇罗克等人。这时的王佩英，已被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逮捕、游斗了近15个月。这就是当时所谓的“司法程序”，逮捕、游斗、讨论、公审、杀害，没有犯罪嫌疑人的人权，没有律师出庭辩护的机会，只有阶级斗争的仇恨与杀戮，以实现专政震慑，但这都还不算是最要紧的。

最要紧的是，公检法被砸烂，被夺权。先说公安部，当时的公安部长是后来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的谢富治，他同时也是北京市文革委员会主任。在共和国第一任公安部长罗瑞卿被林彪于1965年诬陷并被解除领导职务后，谢富治在第二年的12月，就炮制了《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即臭名昭著的《公安六条》。1967年1月13日，《公安六条》被中共中央、国务院以正式文件的形式发布，其最具破坏力的是第二条和第四条。第二条说，“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开张贴、散发反革命传单，写反动标语，喊反动口号，以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王佩英在1968年被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逮捕，就是依据这一条。虽说“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就是现行反革命，但在实际执行中，又扩展到了凡是对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中央文革小组领导不满的，也是“反动行为”，要“依法惩处”。



谢富治（1909-1972）
湖北红安人，新中国成立后曾出任公安部部长，文化大革命中为文革小组“碰头会”成员，1972年病逝。

至于第四条，更是一次性提出地、富、反、右、坏等21种人的名单，规定他们“一律不准外出串联，不许改换姓名，伪造历史，混入革命群众组织，不准背后操纵煽动，更不准他们自己建立组织，这些分子如有破坏行为，要依法严办”。因对21种人的各种“不准”、“不许”，导致红卫兵、造反派大规模地把这些人赶出城市，送农村监督改造。当时至少有33695户北京市民被抄家抢掠，有85196人被驱赶出城。后来，根据1969年10月18日“林副主席第一号命令”（战备疏散），在极短的时间内又实施了遣返，全国多达40万的城市居民被遣返到农村或边远地区，不少被遣返的人在遣返途中便被折磨致死，无法进行统计。《公安六条》支持了红卫兵的任意扑杀行为，但时任公安部长的谢富治却在北京市公安局会议上说：“民警要站在红卫兵一边。群众对坏人恨之入骨，我们劝阻不住，就不要勉强。”

如此公然煽动武斗的言论，加之有《公安六条》这样所谓的“法律”保驾护航，才有了后来各地屠杀、武斗的屡见不鲜。1968年湖南道县（邵阳）尚且发生一连串集体屠杀，另有著名的重庆武斗、广西武斗（从最开始的棍棒，发展到步枪、手榴弹甚至土炮、装甲车等武装冲突），则1968年北京一名普通的铁道部专业设计研究院勤杂工王佩英被以言治罪，思想犯罪被制度化、法律化，大量冤假错案层出不穷，也就不足为奇了。

自己人整自己人的浩劫

为实现对《公安六条》的有力执行，就必须让“自己人”掌控公检法。就在《公安六条》正式发布后的第二个月，北京市公安局等公检法部门由北京卫戍区司令部接管，实行军事管制，军管会派军代表接管各处、分（县）局及基层科、队、所，侦察、起诉、判决三家公然会并成一家，到处草菅人命，冤狱横生。当时的前局长冯基平、现局长邢相生以及其他领导成员吕展、闵步瀛、阎塘被隔离审查，换之以军管会二号人物刘传新当北京市公安局局长。

成员吕展、闵步瀛、阎塘被隔离审查，换之以军管会二号人物刘传新当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刘传新从市公安局的侦察案卷中搜集各级领导的审查批示，编写了《关于罗瑞卿、刘仁、冯基平、邢相生等一伙反革命集团里通外国的情况报告》，清查全局各类主要档案77万余卷、零散材料105万件，列出所谓“出卖情报”的材料8623件，“叛徒、特务、反革命线索”材料153374件，并将其中85344件编印成122册，转发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进行追查，严重失密，造成极其严重的恶果。



图为1967年4月20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

千万不要忘记罪恶的1968年。这一年，包括西藏、新疆在内的29个省、市、自治区全部建立了革命委员会。除了这一年年年底南京长江大桥建成通车是罕见的幸事外，整个中国已经国不像国。这一年，公安部长谢富治与江青、康生炮制《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将刘少奇开除出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并将他人身摧残致死。于次年。这一年，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刘传新将刘少奇、贺龙、叶剑英、彭真、李井泉、谭震林等人的子女70人关进市局少管所，将冯基平、邢相生等24名市公安局领导干部“逮捕法办”。这一年，王佩英因为公开同情支持刘少奇，被早已不配叫“公安局”的市公安局军管会逮捕。中国的文革史，绝不可忽略公安文革史。共和国的公安部长，至今已有十一任，其中：第一任公安部长罗瑞卿，在文革中被迫害入狱，被迫跳楼自杀，左腿致残；第四任公安部长赵苍壁，文革时担任中共四川省委

书记处书记，被迫害关押；第五任公安部长刘复之，文革时担任公安部副部长，被迫害关押；第七任公安部长王芳，文革时担任中共温州地委书记，被迫害关押；第九任公安部长贾春旺，文革时担任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教师，受运动冲击，后下放劳动。历史也没放过施暴一方。1972年，谢富治病死；他的重要爪牙刘传新，也于1977年上吊自杀，自杀前已被免去公安局长职务，而免职当日正是王佩英遇难七周年的祭日。

文革是自己人整自己人的空前浩劫，举国内耗，恐怖血腥，上有强权乱权，下有愚昧盲从。根据广东省汕头市塔园文革博物馆的统计，党史中一共存在过37次政治运动、11次路线斗争、100种刑罚和304个政治罪名，文革堪称黑暗之集大成者，其惨烈状况罄竹难书。王佩英立于如此黑暗无光的时代，早在1962年就公开质疑毛泽东指挥国家的路线有误，尤其是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刘少奇在中国经历了错误经济政策的大跃进并遭遇三年罕见饥荒后，尚能批评毛泽东，她据此朴素地认为刘少奇为民谋福利，能客观看问题，而毛泽东应当主动退出政治舞台，否则没有出路。她本着挽救党和国家危机的良心出发，写日记论政治，写标语传纸条，希望唤起民众觉醒。然而，她接下来所面对的，却是被关进安定医院三年，被确认为“无精神异常”后又被劳改、关押、毒打、游斗两年，直到不足55岁就义的那一刻，她都没有放弃心中的信念，始终认为“刘少奇是好人”。仅仅因为同情一个被迫害的国家主席，她就被杀心之后再杀身，尸骨无迹，留下可怜的六子一女无人抚养，又在死后十年内被当作恐怖的阶级敌人“现行反革命”对待，后人受尽歧视，即使第一次被平反，国家也给她留下了一个“精神病”的不实定论。



上图为王佩英的七个子女，上排从左至右依次为三子张大中、长子张运生、二子张贵生、四子张大江；下排从左至右依次为五子张大路、幼女张可心、六子张大圃。

法律应独立于政治而存在

王佩英的一生，两个阶段都可用四个字概括：抛家为国。建政前，为了支持丈夫张以成的地下党情报工作，她舍尽家产，在开封、郑州、兰考、密县一带，资助、掩护这一隐蔽战线；建政后，为唤醒统治者和七八亿人在文革中的疯狂荒诞，她最终舍下7个孩子，走向以身殉道、杀身成仁的不归路。她少女时期在有天主教背景的中学静宜女中（今开封八中）所接受的教育，她与有着国家终极忠诚信仰的情报人员张以成26年婚姻的相濡以沫、耳濡目染，她作为一个经历过太多风险、磨难和考验的女人、母亲，作为一个无数次阅读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党员，就像这本书里最后总结的那样，“经常采用正确的态度、适当的方式，去和党内各种不正确的思想意识，特别是对于影响到当时革命斗争的各种不正确的思想意识进行斗争”。即使被关在精神病院，王佩英也仍在一遍又一遍地回忆曾经的地下党岁月是如何不顾生死，如何怀抱纯洁梦想，如何解放劳苦群众，但眼下的政治危局、社会乱象，与她心中那种心系民众疾苦的理想主义实在有着天壤之别。为此，她斗争了，她呐喊了，但等待她的却是比一般死亡可怕得多的生不如死和公审而死。



张以成. 1943年秘密加入共产党，1960年11月因患肝病去世。

这样的专政迫害致死，在所谓“法律”上的体现是这样的：在各种通告上，先写上“最高指示：坚决地将一切反革命分子镇压下去，而使我们的革命专政大大地巩固起来，以便将革命进行到底，达到建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目的”；在各种判决书上，先写上“最高指示：不管什么地方出现反革命分子捣乱，就应当坚决消灭他”，或“最高指示：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无论是中国的反动派或是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等。再没有比这更赤裸裸的强权，杀人来自貌似神圣的“最高指示”。一个国家的最高指示应该是什么？是最高统治者吗？错，应该是最高权威性的宪法！然而，当年刘少奇拿着一本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即1954年的“五四宪法”）跟红卫兵讲道理，结果宪法还被踩了几脚。公检法已被砸烂，三大机关不能依法行使权力，许多国家机关单位的领导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中央文革小组凌驾于国家机器之上，早已无法无天。若真要说“有法”，那就是谢富治这样的运动杀手炮制的《公安六条》，以及一个又一个让天下大乱的运动令。法律在文革中是什么？是铲除异己、随意阐释、杀人无罪、造反有理的专政工具。

王佩英的惨剧，警示的正是法治之必须。法律应当而且必须成为公民最基本的信仰，它是社会规范的最低底线，如果这个底线被打破，法律转而只为政治专权服务，那么王佩英式的悲剧就会无数次上演。亚里士多德说，法治包括两点，一是有优良的法律，二是优良之法得到民众普遍遵守。我们应当时常检视我们的法律，对照其是否违宪，是否属于恶法，若是，则应由国家重新制定或修改，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文革中，公检法系统被驾驭为政治杀手，非但没有维护公平与正义，反倒鼓动枉法与邪恶，倒下了太多像王佩英这样有良心的公民，倒下了太多影响我们至今的道德、精神与气节。既然曾经倒下去过，为了不再倒下去，那么今天就应该得出一个血的教训，让文革不再卷土重来的生机，就是中国向真正的法治国家迈进，法律应独立于政治而存在，不受政治气候的影响，并且将政治也纳入到自己的管辖之下，使从政者不得不依据法律的程序与框架行事。法律是最高与最终的裁决者，是任何组织与个人都必须服从的对象。法治与政治的终结点，都应当是公平与正义，是人权与自由。

后记：更深层的追问

王佩英被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无罪后，其生前单位铁道部专业设计院（现名为中铁工程设计咨询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在9月29日作出了《关于为王佩英同志彻底平反的决定》：“王佩英同志表现出了一个共产党人和老铁路人心地无私、光明磊落的革命精神，是一位好同志，是一位值得我们纪念的好党员。”紧接着，10月19日，纪录片《我的母亲王佩英》在第六届北京独立电影展（栗宪庭电影基金举办于北京宋庄）放映参展。包括著名策展人栗宪庭在内的众多观众，纷纷落泪。10月25日，在广东省汕头市塔园文革博物馆，200余人在王佩英肖像纪念碑前公祭王佩英。她的女儿张可心在当日演讲中说：“改革开放30多年后的今天，文革浩劫已经成为历史，但文革的土壤还在一些人的心里，在社会的许多角落里飘荡、潜伏着。那种在被蒙蔽的情况下，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在受到邪恶挑动的情况下，人与人之间残忍、野蛮、愚昧的相互斗争，彻骨仇恨，并没有真正地消失。”张可心的演讲秉承了她母亲的忧患意识，其所论及的避免文革重蹈覆辙的着力点，已从法治层面走向更深层的人心追问。“文革的土壤消失了吗？”这个问题，已然超出法律人的思索范畴，拷问的是包括你我在内的全体中国人。

（文章来源：作者供稿）



立于广东塔园文革博物馆的王佩英纪念碑

海鸥之歌

林昭 / 文

(一)

灰蓝色的海洋上暮色苍黄
一艘船驶行着穿越波浪
满载着带有镣链的囚犯
去向某个不可知道的地方

囚徒们沉默着凝望天末
深陷的眼睛里闪着火光
破碎的衣衫上沾遍血迹
枯瘠的胸膛上布满鞭伤

船啊！你将停泊在哪个海港？
你要把我们往哪儿流放？
反正有一点总是同样
哪儿也不会多些希望！

我们犯下了什么罪过？
杀人？放火？黑夜里强抢？
什么都不是——只有一桩
我们把自由释成空气和食粮

暴君用刀剑和棍棒审判我们
因为他怕自由象怕火一样
他害怕一旦我们找到了自由
他的宝座就会摇晃，他就要遭殃！

昂起头来啊！兄弟们用不着懊丧
囚禁、迫害、侮辱……那又有何妨？
我们是殉道者，光荣的囚犯
这镣链是我们骄傲的勋章

(二)

一个苍白的青年倚着桅樯
仿佛已支不住镣链的重量

他动也不动像一尊塑像
只有眼睛星星般在发亮

梦想什么呢？年轻的伙伴！
是想着千百里外的家乡？
是想着白发飘萧的老母？
是想着温柔情重的姑娘？

别再想了吧！别再去多想
一切都被剥夺得精光。
我们没有未来，我们没有幻想
甚至不知道明天见不见太阳

荒凉的海岛，阴暗的牢房
一小时比一年更加漫长
活着，锁链伴了呼吸的节奏起落
死去，也还要带着镣链一起埋葬

我想家乡么
也许是，自小我在它怀中成长
它甘芳的奶水将我哺养
每当我闭上了双目遥想
鼻端就泛起了乡土的芳香

我想妈妈么
也许是，妈妈头发上十年风霜
忧患的皱纹刻满在面庞
不孝的孩儿此去无返日
老人家怕已痛断了肝肠！

我想爱人么，也许是
我想她，我心中的仙女
我们共有过多少美满的时光
怎奈那无情棒生隔成两下

要想见除非是梦魂归乡

我到底在想什么
我这颗叛逆的不平静的心
它是如此刚强
尽管它已经流血滴滴，遍是创伤
它依然叫着“自由”
用它全部的力量

自由！我的心叫道：自由！
充满它的是对于自由的想望……
象濒于窒息的人呼求空气
象即将渴死的人奔赴水浆
象枯死的绿草渴望雨滴
象萎黄的树木近向太阳
象幼儿的乳母唤叫孩子
象离母的婴孩索要亲娘

我宁愿被放逐到穷山僻野
宁愿在天幔下四处流浪
宁愿去住在狐狸的洞里
把清风当被，黄土当床
宁愿去捡掘松子和野菜
跟飞鸟们吃一样的食粮
我宁愿牺牲一切甚至生命
只要自由这瑰宝在我的身旁
我宁愿让满腔沸腾的鲜血
洒上那冰冷的枯瘠的土地
宁愿把前途、爱情、幸福
一起抛向这无限的波浪
只要我的血象沥青一样
铺平自由来到人间的道路
我不惜把一切能够献出的东西
完完全全地献作她自由的牲羊

多少世纪，多少年代啊，自由！
人们追寻你像黑夜里追求太阳
父亲在屠刀的闪光里微笑倒下
儿子又默默地继承父亲的希望
钢刀已经被牺牲者的筋骨磕钝
铁锈也已经被囚徒们的皮肉磨光

多难的土地啊，浸润着血泪
山般高的白骨砌堆成狱墙
埋葬的坟墓里多少死尸张着两眼
为的是没能看见你，自由的曙光

你究竟在哪里？自由！
你需要多少代价？
为什么你竟象影子那么虚妄？
永远是恐怖的镣铐的暗影
永远是张着虎口而狞笑的牢房
永远是对他们同类的迫害
永远是专制－屠杀－暴政的灾殃

不，你存在，自由啊！
我相信你存在！
因为总是有了实体才造成影象
怎么能够相信千百年来最受到
尊敬的高贵的名字
只不过是一道虚幻的虹光

那一天啊自由，你来到人间
带着自信的微笑高举臂膀
于是地面上所有的锁链一齐断裂
囚犯们从狱底里站起来欢呼解放

哪一天啊，千百万为你牺牲的死者
都会在地底下尽情纵声欢唱
这声音将震撼山岳和河流
深深地撼动大地的胸膛

而那些带着最后的创伤的尸体
他们睁开的双眼也会慢慢闭上
那一天，我要狂欢
让嗓子喊得嘶哑
不管我是埋在地下还是站在地上
不管我是活人还是在死者的行列里
我的歌永远为你——自由而唱

(三)

远远地出现了一个黑点
年青人睁大眼对它凝望
听见谁轻声说：是一个岛
他的心便猛然撞击胸膛

海岛啊！你是个什么地方？
也许你不过是海鸥的栈房
也许你荒僻没有人迹
也许你常淹没在海的波浪

但是这一切又算得什么？！
只要你没有禁锢自由的狱墙
只要你没有束缚心灵的枷锁
对于我来说你就是天堂

勇敢的黑眼睛燃烧着光芒
他走前一步，镣铐叮当作响
暗暗地目测着水上的距离
对自由的渴望给了他力量。

我能够游过去么？能还是不？
也许押送者的枪弹会把我追上
也许沉重的镣铐会把我拖下水底
也许大海的波浪会叫我身丧海浪

我能游到那里么？能还是不？

我要试一试——不管会 怎么样！
宁可做逃犯葬身在海底
也强似在囚禁中憔悴地死亡

不管付出什么代价
在我死去之前
也得要吸一口自由的空气
即使我有三十次生命的权利
我也只会全都献到神圣的自由
祭坛上

别了，乡土和母亲！
别了，爱我的你！
我的祝福将长和你们依傍
别了，失败的战友！
别了，不屈的伙伴！
你们是多么英勇又多么善良
可惜我只能用眼睛和心拥抱你们
愿你们活得高傲死得坚强！

别了，谁知道也许这就是永别
但是我没法——
为了追踪我们的理想
啊！自由，宇宙间最最贵重的
名字
只要找到你，我们的一切牺牲
便都获得了光荣的补偿……

(四)

他握紧双拳一声响亮
迸断的镣铐落在甲板上
他像飞燕般纵到栏边
深深吸口气投进了海洋

枪弹追赶着他的行程
波浪也卷着他死死不放





那个黑点却还是那么遥远
他只是奋力地泅向前方

海风啊！为什么兴啸狂号？
海浪啊！为什么这样激荡？
臂膊象灌了铅那么沉重
年青的逃犯用尽了力量

最后一次努力浮上水面
把自由的空气吸满了肺脏
马上，一个大浪吞没了它
从此他再没能游出水上

押送者停止了活靶射击
追捕的小艇也收起双桨
难友们化石般凝视水面
无声地哀悼壮烈的死亡
……

年青的伙伴，我们的兄弟
难道你已经真葬身海洋？
难道我们再听不见你激情爽朗
的声音？

再看不见你坚定果决的面庞？
难道我们再不能和你在一起战斗
为争取自由的理想献出力量？

海浪啊，那么高那么凉
我们的心却象火炭一样！
听啊！我们年青的兄弟
悲壮的挽歌发自我们的心房：
记得你，无畏的英烈的形象
记得你，为自由献身的榜样
记得你啊，我们最最勇敢的战士
在一场力量悬殊的战斗中
你从容自若地迎接了死亡

海浪啊，请抚慰我们年青的兄弟

海风啊，把我们的挽歌散到四方
象春风带着万千颗种子
散向万千颗爱自由的心房……

（五）

那是什么——囚人们且莫悲伤
看啊！就在年轻人沉默的地方
一只雪白的海鸥飞出了波浪
展开宽阔的翅膀冲风翱翔

就是他，我们不屈的斗士
他冲进死亡去战胜了死亡
残留的锁链已沉埋在海底
如今啊，他自由得象风一样

啊！海鸥！啊！英勇的叛徒
他将在死者中蒙受荣光
他的灵魂已经化为自由——
万里晴空下到处是家乡！

本诗转录于钱理群作序的谭蝉雪《求索》。1960年元月首刻《星火》时，题名是：《海鸥——不自由毋宁死》，且诗后有鲁迅“1949年跋于‘五四’前夜”的《跋》。

微博多党合作制

无俗韵 / 文

造谣党黑嘴一张，
辟谣党跑断肝肠，
钓鱼党笑饮江上，
打脸党辣手飞扬，
情怀党心灵激荡，
工业党数据辉煌，
普世党背靠西方，
五毛党拱卫中央，

软骨党恐惧惊惶，
铁血党似虎如狼。
贴图党不声不响，
才华党文采称王。
色情党淫荡疯狂，
围观党不明真相。
励志党豪情万丈，
末日党一夕数慌。

原创党思路飞扬，
转发党张贴如狂，
潜水党闷声不响，
酱油党观火岸旁，
历史党帝王将相，
卖萌党宠物吉祥，
毛豆党法理激昂，
截屏党证据嚣张，



词两首

醉仙望月/文

一剪梅

伊人心中寒秋意，举杯相视，形单影只。成则一世败亦随，此若非痴，如何为痴？酒到痛处穿心箭，难谱情词，难作情诗。绣帕唯恐密密缝，横不成丝，竖不成思。

临江仙

千里疾行巫山境，一江横贯西东。青丝长夜对周公。枕旁何漉漉，心上秋意浓。琴边衾里无缘分，任他随雨随风。往事且付遥忆中。倩影依稀在，花落水流红。

青春之乡

张志华/文

有一段青春的梦
稀稀疏疏，朦朦胧胧
花，开在家乡的那条小路

有一首青春的歌
三三两两，轻轻柔柔
花，漾在家乡的那湾湖泊

有一杯青春的酒
点点滴滴，昏昏沉沉
花，散在家乡的那截石桥

青春啊青春
家乡啊家乡
永远封存在
那遥远的回忆
遥远的天堂

油菜花

许超/文

去的时候你在我右边
春风满面
藏掖不住的欢欣
跟着火车一道摇摆起伏
人们把幸福锁在家里
车厢空旷
你是我唯一的旅伴

回的时候我在你右边
眼看你被春风陵压
零丁的身躯不堪点滴摧折
我要怎样
才能冲破这铁壳
去挽回那离散的欢欣
轰隆隆 轰隆隆
火车在孤独的旅途上
一路沉吟着你的心伤

人，诗意的栖居

荷尔德林/文

如果人生纯属辛劳
人就会仰天而问
难道我所求太多以至无法生存？
是的
只要良善和纯真尚与人心相伴
他就会欣喜地拿神性
来度测自己
神莫测而不可知？
神湛若青天？
我宁愿相信后者
这是人的尺规
人充满劳绩
但还诗意的安居于这块大地之上
我真想证明
就连璀璨的星空也不比人纯洁
人被称作神明的形象
大地之上可有尺规？
绝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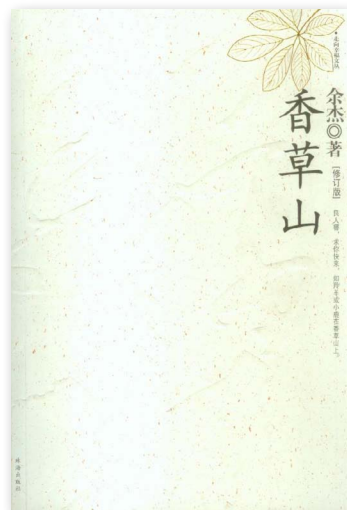
作者资料

荷尔德林，德国著名抒情诗人，死后乎被遗忘了近一百年，直到20世纪中叶，才在德国被重新发现，并在欧洲建立了声誉。荷尔德林的作品表达了自己使祖国摆脱专制主义的理想，他对古希腊的不倦的追求是对德国现状的批评。他主张对一代新人进行教育，使他们的个性得到全面而和谐的发展。

他被思想巨人海德格尔赞为“诗人的诗人”，认为其诗是“关于诗的本性的最纯粹的诗”。

■READ/读书

这是理想主义与浪漫主义者的圣经，也是一部自传性质的爱情小说。小说一定有不真实，有不真实才更像圣经，而怀有理想与浪漫情愫的人相信这是真实的。



他救赎了自己，背井离乡

袁本初 / 文

“事喧嚣，人生寂寞。我一直以为，支撑我生活的动力，便是罗素所称的三种单纯然而又极其强烈的激情：对爱情的渴望、对知识的渴求，以及对于人类苦难痛彻肺腑的怜悯。”

作者用一本书，用自己的行动，将这三种激情阐述地淋漓尽致。我在短评里写着，这是理想主义与浪漫主义者的圣经，当然前面要加上中国二字。“与其诅咒黑暗，不如让自己发光”，越是怀有理想与浪漫情愫的人，越是能体会本书的光芒。

余杰写文特点鲜明，笔下充满理想主义与浪漫主义的激情，文中旁征博引。我不敢用自己平淡的感情与匮乏的知识储备来写书评，但我想说说其他。

爱情中的浪漫主义与现实中的理想主义其流看似接近，其实相去霄壤。想到浪漫主义就是为爱浪迹天涯的景象，而想到理想主义，却是抛头颅洒热血之景，如谭嗣同那般“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

由故，两者皆可抛”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但余杰却将二者融合为一，因此他为爱而选择的人生是执笔抗争。笔杆子确实是一种武器，可以用来进行战斗，但却不能用来防身，因为对付笔杆子的人握着的是枪杆。

终于朝廷的鹰犬们让他几欲丧命，而他妻子的坚持让他捡回了生命。

确实，他说过，他决不离开这片土地。即使明确知道面前会有陷阱和暗箭，他也不会退却，“各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他说他需要的就是这样的一种“切肤之痛”。现在他领会了这种切肤之痛，所以他必须离开了，因为不离开，就不能再渴望爱情，渴求知识，怜悯苦难。

“渴望爱情，渴求知识，怜悯苦难”，在这三者中，罗素说最重要的是爱情，无可置疑。书中宁萱对廷生说，我将在背后默默地注视着你。我们赤手空拳，但我们都不畏惧那闪着寒光的刀剑，宁萱也将生命的全部交付给了廷生。经历了这些之后，他们确实得走了，“为了自由，为了写作，为了孩子，也为了未来”。

当时余杰写道：“我所经历的悲哀，与史铁生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呢？连史铁生残缺的生命中，也时常迸发出火焰般的渴望与激情，我又有什么理由悲观呢？”但我想，余杰已经经历了同样的悲哀，他最爱的国家给他的悲哀。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



作家余杰

土地爱得深沉”，让最爱她的人背井离乡，这是我们祖国最大的悲哀。

他还没能救赎这个国家，但已经救赎了自己。他说：“我要我写作的时候她就在旁边凝视着我”，他做到了。他认为与柏杨和李敖相比，哈维尔是幸运的，因为“哈维尔的妻子奥尔嘉一直与丈夫一起无畏地面对邪恶。她没有背弃他，相反，她给予了他最大的支持和慰藉”。我想余杰也是幸运的。

这是理想主义与浪漫主义者的圣经，确实，如简介中所说，这也是一部自传性质的爱情小

说。小说一定有不真实，有不真实才更像圣经，而怀有理想与浪漫情愫的人相信这是真实的——

她紧贴着我的耳朵，轻轻地说了《圣经》中的一句话：

良人属于我，我也属于他。

他在百合花中牧群羊。（《圣经·雅歌 2：16》）

百合花长在香草山上，羊群长在香草山上。

我和宁莹也生活在香草山上。

香草山上，蓝天白云，水草丰美。

（来源：作者授权。文章地址：<http://book.douban.com/review/5266944>）

卢梭是敞开了自由之门还是断绝了自由之路？
他的悲剧在于，看到了民众的力量，又把民众的力量绝对化，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评《社会契约论》

民主还是暴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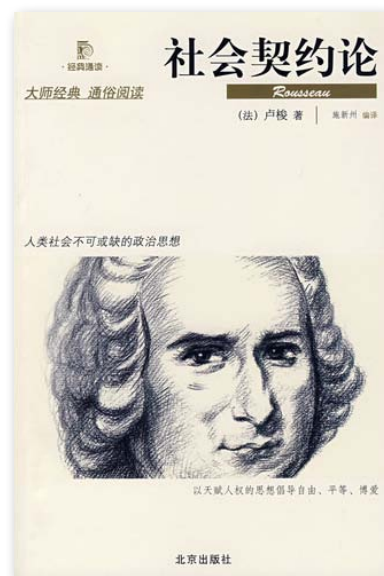
King Blade / 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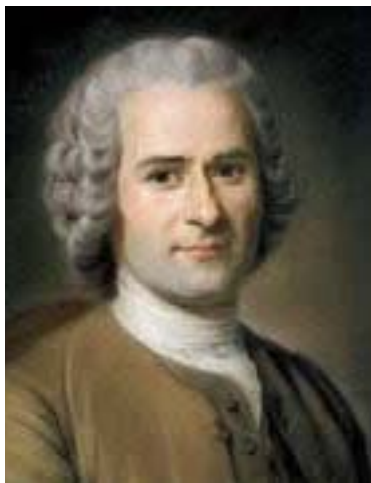
18世纪是哲学家的天城，而法国又是这个时期哲学家的王宫。如果说文艺复兴结束了旧的时代，新时代的开启却一直顾盼至此。卢梭无疑是这个时代的瑰宝，也是最受争议的一位。

一、社会契约只见国家不见社会

在《社会契约论》一书中，作者主要以社会契约为原理，在这之上推导出了一幅作者自认

为的“理想国”。在那里公意成为了压倒一切的力量，它不可能错误，也不可能被摧毁，更不可能屈从于其它的任何意志——它就是尘世的上帝。总之，它构成了一切合法与合理性的基础。并且，为了找到公意，我们必须实现直接民主。因此，这就使得卢梭的理想国必定是小国寡民的社会。“我们应该更加重视一个良好的政府所产生的活力，而不只是看到一个广阔的领土





让-雅克·卢梭(1712-1778)。思想的核心内容是社会契约的思想，他认为人民大众有革命的权利，有义务去创造一个新的社会契约，这种社会契约不取决于财富，不取决于国王的意愿，而取决于广大人民的共同意愿。卢梭实际上是创立了法国大革命的基础，甚至可以说他通过阐明革命的意愿是高于传统的国王和宗教的意愿，从而给了人民革命的权利。

所提供的资源。”在如此的小国，全民投票表决是唯一的立法方式，只有自己才能代表自己，所以现代社会的代议制是无法实现的。其实，卢梭的理想世界很可能就是回到希腊罗马时代。在那里，有着最普遍的公民大会。

可是，这样的国家真的有社会吗（尽管卢梭也有“市民社会”一说）？我们可以看到，卢梭的国家是很压抑个性的。尽管，卢梭也认为个人意见大过公意是符合自然本性，但他所设计的契约国要求从制度和理性上双重压抑个人意见。而近代以来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二元对立在卢梭那里是不存在的。因为无论是国家，政府还是宗教包括所有涉及他人的事件，都必须是屈从在公意之下的。我们可能就没有了两人，多人，一部分人的结社活动。更何况在卢梭看来，党派对于国家是有害的。所以只能统一，只能多数压倒少数。这样的结果，就是从国家的统一体中，无法分裂出独立的社会。任何一个细微的分裂都被认为是对社会契约的背叛。

二、自由的真意

卢梭自诩是坚定的自由主义分子。事实上，我们可以通过《社会契约论》中无处不在的“自由”口号感受到这一点。然而，正如作者开篇

时的名言“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作者到底是敞开了自由之门还是断绝了自由之路，笔者尚存疑问。“卢梭论述了三种自由，人生而获得的是以个人力量为界限的自然的自由，进入社会状态人们所失去的就是这种自由，这种自由使得人们对他所企图和所能得到的一切东西拥有无限的权利；而在社会状态下获得的是被公意所约束的社会的自由，这种自由对应的则是人们对他所享有的一切东西的所有权；道德自由才使人类真正成为自己的主人。”在这三种自由中，社会自由才是卢梭论证的重点，因此卢梭要求的自由是被公意决定了的自由。而按照自由的界分，无论是消极的自由还是积极的自由都和卢梭的自由观格格不入。Be Free From要求个人有不受干涉的界域，但卢梭的自由观却要求公意可以规制它所想要规制的任何界域。Be Free To Do要求人们有行为自由权，但是卢梭的自由观要求行为自由必须符合大多数人的公意，并且我们可以强迫一个人自由。

所以，伯克认为卢梭是打着自由主义的旗号搞集权主义便丝毫不奇怪了。自由的真意在于不违反某些特定规则的情况下能够做出与别人甚至是大多数人不同的事情。事实上，正如密尔在《论自由》中的例证，苏格拉底和耶稣都是被公意所迫害的。而卢梭的简单多数的立法并不能构成这种约束效力的正当性。而之后的法国大革命、法西斯主义都是打着公意的旗号立法，将少数人的权利置之不顾，酿成了惨绝人寰的悲剧。“在这里，每一寸土地都蘸满了鲜血。”

何以造成这种局面？笔者认为这是由于卢梭太相信理性的缘故。或许这并不是卢梭的错误。启蒙思想家对理性的热衷使他们看到了积极的未来。但是，人类的理性是靠不住的，尤其不能指望每个人在同一时间都同时发挥出相当的理性。在理性缺乏的时候，一个口号性的谬论就会导致全民的狂热。这时，你能想象出人民立法的结果吗？看看纳粹时的情景吧。正

如伯林所认为的卢梭“我始于不受限制的自由，终于不受限制的专制主义”。在公意的压抑下，我们甚至没有了对自己的处分权。

卢梭的悲剧在于，他看到了民众的力量，但“任何权力主体都要受到一定的约束，而不能容许存在至高无上、不受约束的权力主体。因为如果不这样做，而是把主权赋予某一约束的主体，所谓主权在民就会变成雅各宾式的领袖专政和暴民专政。”

三、立法权与行政权

有些学者认为卢梭在文中认为主权是不能转让、不能分割的，轻易地推导出卢梭是绝对反对权力分立的。然而，我们需要一分为二地看待这个问题。卢梭认为只有公意才是立法者、主权者，并且所有的政府行为都得依照主权者的法律，只有这样的政府才是一个好政府。但是在卢梭那里，并不是没有区分权力，只是把行政权从属于立法权之下，只是立法权力的委托而已。政府也有集体的意志，也必须按照效率原则行事，只是那必须符合法律的约束以及容忍被人们驱赶下台的危险罢了。同时他还指出，立法权行使是针对普遍不特定的公民，而行政权的行使是对具体的人和事进行的决定。



巴尔克岛上的卢梭塑像，面向日内瓦湖，神态自若地赤脚端坐在椅上，右手持羽毛笔似正凝神思考，身体微微前倾，椅下和脚旁边堆满书籍。基座上刻着“日内瓦公民——让-雅克·卢梭”。1961年，陈毅在此留下“汝是弱者代言人，总为世间鸣不平”的诗句。

因此我们可以说卢梭反对权力的制衡，但并不反对对权力进行区分，交由不同的人员行使。

从现在的法国政府建制中，我们也可以找到卢梭的渊源。尽管法国也是三权分立，但是它很多涉及基本性的法律也是要通过全民的投票。在某些事务上确实有直接民主的意味。具体的各个方面，在大革命时期的政府建制上有着更明显的体现。

（来源：作者授权。文章地址：<http://book.douban.com/review/1396042>）



风光秀丽的日内瓦湖

■MOVIE/影评

2011年N多国产大片的悲催境遇早已证明——不管你用的明星多大牌、画面拍得多牛逼，只要你剧本不够诚意，就根本挡不住观众的如潮劣评！

其实，苦逼的我们 都要像小强一样活着

——电影《像小强一样活着》创作札记

关尔 / 文



一个非常偶然的的机会，我拿到一本不K拉描写街头骗子题材的小说《像小强一样活着》，据说这本小说在出纸质书之前，已经在天涯、猫扑、盛大文学取得蛮高的点击率。

阅读这本小说的过程是愉悦的，中间让我笑喷多次，掩卷之余，发现颇有值得回味的东西，觉得蛮适合改成电影，于是立马跟不K拉童鞋取得联系，在一周之内跟他签下电影改编合同，然后进入实质性的项目操作。

可惜，项目初始运作不太顺，主要是因为原著小说的情节尤其是后半部分的情节连贯性不够强，线索头绪纷繁复杂，剧本不得不数易其稿，光编剧环节就整整折腾了一年有余。

然后在运作的过程中发现这种非主流灰色题材的电影在审查方面存在巨大无比的政策风险。（你懂滴！）《无人区》、《盲井》和《苹果》在阴沟里面翻船那是业内众所周知的悲剧。于是我们公司决定另辟蹊径，对影片进行冷处理，尽可能地以低成本运作，从而降低运营风险。

最后呈现出来的影片效果我本人是不满意的，主要是摄影、美术方面留下太多遗憾（都不敢跟人说我这导演还是专门拍胶片品牌广告出身的），这些遗憾主要跟低成本运营策略有关。但是事实证明我们当初的决策是100%完全正确的——如果这部影片做得稍微大制作一点，观众最多也就是多看到一些豪华些的演员阵容、以及奢华一些的场景和美观一些的画面而已，这些东西都与创作者的诚意没有一丁半点的狗屁关系！反而这部影片一旦做大的话，考虑到这种边缘题材所造成的社会影响会大大滴坏，在内容上广电总局的审片委员们也就根本不可能像现在这样对你手软，绝对会把咱们目前的棱角给“和谐”掉一半以上，那我端出来的这部《像小强一样活着》肯定会比现在获得多十倍的劣评。（2011年N多国产大片的悲催境遇早已证明——不管你用的明星多大牌、画面拍得多牛逼，只要你剧本不够诚意，就根本挡不住观众的如潮劣评！）



《像小强一样活着》最终在史上最惨烈的档期——《变3》与《哈7》之间与全国观众见面，不但没有像别的国产小片那样“一日游”，反而仗着自身的口碑，排片量逐日上升，一直坚持到第24天正式下片为止。

我们都知道，2011年中国电影的生产

高达 558 部，其中能够上院线的影片只有 180 部，而这 180 部上院线的电影当中，亏损率高达 90%！幸好托观众的福，《像小强一样活着》没有进入这 90% 的行列，这是最让我们聊以欣慰的。通过票房、广告植入和版权销售收入，本片顺利取得了预期盈利目标。此外，本片在迅雷看看的点击率目前已经接近 5000 万次，比起许多大牌明星云集的国产大片譬如《杨门女将之军令如山》（张柏芝、任贤齐主演）、《辛亥革命》（成龙、李冰冰主演）、《关云长》（甄子丹、姜文主演）、《赵氏孤儿》（葛优、范冰冰、黄晓明主演）、《新倩女幽魂》（古天乐、刘亦菲主演）、《我知女人心》（刘德华、巩俐主演）、《最强喜事》（古天乐、张柏芝、甄子丹、刘嘉玲主演）点击率都要高出许多，这也是我们所始料未及的。

总的来说，《像小强一样活着》或许能给小片的制作者们略有一点启示——那就是做片子归根到底还是要看剧本环节就给予观众足够的诚意，尽可能接地气一些。

要知道自从《疯狂的石头》之后，催生了无数的国产喜剧小片，大都以亏损告终，原因主要还是创作者诚意不够。而《像小强一样活着》跟那些山寨喜剧最大的不同在于《像小强一样活着》更关注社会现实生活。中国电影第一次将视角交给社会底层灰色地带的街头骗子，关注他们的灰色人生，同时透过他们的灰色视角，用灰色幽默的眼光去观照我们今天万花筒一般光怪陆离的悲催现实生活。本片带有强烈的批判现实主义的色彩，影片的主人公张小强作为一个街头小混混，他就像一个现代版的韦小宝、江小鱼，亦正亦邪的他无论是黑白两道都能两头吃得开，为什么呢？就因为他深谙当今社会的各种明规则、潜规则，所以他能够在这个社会金字塔的最底层也能活得游刃有余。这个打不死的小强，他的生活态度，他的价值取向，他的机智乐观，他的善良天性，乃至他的成功学本身，都能给现实中的 80 后带来很多启迪，这就是《像小强一样活着》区别于当下许多山寨喜剧的最主要特征。

近来，伴随着 CPI 的一路飙升，通货膨胀的红线不断被刷新，苦逼的 80 后生存空间更加紧窄，国进民退、贫富分化作为一种常态已经让我们的神经麻木。不管是蚁族也罢，鼠族也罢，个体户、企业家也罢，天朝下面的每一个人都活得越来越不易，像小强一样坚强乐观地活着成为我们的唯一选择。所以我希望小强的狡黠与智慧，能多少启迪一点你的灵光，我希望永不言败的小强精神，能多少激励一下你的斗志，或许它能给你提供一个鲜活的成功范本，让你获得一盅心灵鸡汤、一股精神力量，让你在这个压力重重的天朝从此活得顺风顺水、不再苦逼。



《小强》是根据不 K 拉同名小说改编，同名网络小说在猫扑、新浪读书、盛大文学连续三年点击率超百万。《像小强一样活着》揭示了很多深刻的社会现实问题，埋藏着对弱势群体生存方式的深切关注。

（来源：特约稿件。本文作者系该影片导演。）

导演很明显只是拼命地把那个历史时期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压缩进短短的两个小时，深度显然没有顾及。

《建党伟业》： 一触即破的漂亮气球

酣高楼 / 文



还是先说一下《建党伟业》的优点吧：这部电影的绝大多数演员，无疑都是演技精湛的实力派明星。他们在属于自己的不多的场景中，用高超的演技，传神地把握了历史人物的性格。可以说，这部影片的演员都是好演员，但编剧和导演则另当别论。

接下来是批评：果然不出所料，《建党伟业》和《建国大业》一样，作为献礼影片，就如同现代社会人们在结婚、商铺开业、乔迁等喜庆事儿时放的五颜六色的气球一样，虽然很漂亮、炫目，但是经受不起任何尖锐的触及。

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以及28年后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执政党，这几十年来中国，可以说是内外交困。或者说，具有五千年灿烂文明的中国在这个历史时期，正经历着史无前例的、无比艰难的历史转型。那么如何认识这种历史转型？有人说，这是一个民主与专制进行殊死搏斗的历史时期；有人说，这是一个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的历史时期；也有人说，这是一个中世纪国家向现代化国家艰难迈进的历史时期，也是一个农耕国家向工业化国家艰难迈进的历史时期……我的看法是：无论如何定义这个历史时期，我们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一点就是：在这几十年里，我们百分之百的中国人的命运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的衣食住行，我们的思维方式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袁腾飞曾经说过这样一个笑话：香港回归以后，一个记者采访陕西省的一个老农民，请他谈谈对香港回归的感受。这位老农民很可爱，说道：哎呀！香港不回归我种地，香港回归了我还是种地……的确，香港回归与否对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所造成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可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建立、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对我们中国人的影响也是微不足道吗？显然不是！

而这些变化，在这部影片中显然没有被表现。在这里我不得不提及20年前也就是1991年，同样作为一部献礼影片上映的《大决战》。这部战争片不但有广度，更有深度，它的视角时而聚焦于国共两党的政治领袖、时而聚焦于两军的军事统帅、时而聚焦于两军普通的士兵、时而聚焦于战区普通的农民，可以说既有广度又有深度。

而《建党伟业》的编导们，很明显只是拼命地把那个历史时期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压缩进短短的两个小时，深度显然没有顾及。影片中有几句台词给我的印象十分深刻：陈道明饰演的顾维钧说：弱国无外交。毛泽东说：洋枪洋炮对大刀长矛，胜负可想而知。陈独秀说（大意）：世界上谁最尊贵？我们劳工最尊贵！人们吃得、穿的、住的都是我们劳工做的，可是我们的生活仍然无比艰难，这合理吗？

那么，我们弱在什么地方？为什么我们生产不出洋枪洋炮？我们缺乏的是什么？是几条高科技的军工生产线吗？另外，当时劳工的生活艰难在什么地方？是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还是还不清地主的租子？既然影片中口口声声说“庶民的革命”、“劳工的革命”那么这些庶民和劳工在当时的生活状态时怎样的？影片显然没有很好地表现，相反我们惊奇地发现：影片中的工人既白，而且胖……在这里我不得不提及周星驰的一句话：群众演员也是演员，能不能专业一点！当然了，这不能怪群众演员，只能怪导演，在当初选择的时候就没在意。群众演员也是演员，筛选时能不能专业一点！这不能不说是近些年电影界的一个缺点，那就是不顾剧情，挑选的群众演员都是又白又胖！

影片对这种必要的深度没有表现，相反却对一些没必要的环节进行了刻意渲染，例如：年轻时期的朱德是个弹无虚发的狙击手，居然可以在瞬间扭转不利的战局！真是可笑，那为什么不直接把敌方司令直接干掉？那样岂不是更省事？

影片没有在深度上下功夫，没有把视角很好地聚焦于底层劳工的生活状态，直接导致了我们对这部影片产生以下观感，那就是：清帝退位后，国家一直没有一个令所有政治力量服膺的执政当局：袁世凯不行、徐世昌不行、张勋复辟不行、段祺瑞不行……谁都不行，就中国共产党行，所以中华民族就“伟大复兴”了、就“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了？中国共产党建立、建国的历史意义莫过于用暴力夺得了“城头变幻大王旗”中的最后、最持久的一面？中国共产党成功的秘诀莫过于影片中毛泽东所说的“手里有枪”，而且个个像朱德那样弹无虚发？

这难道就是该片编导们的历史观？这难道就是那段历史的历史真相？建议该片的编导们还是好好补补历史课吧！

（来源：友情合作媒体“电影一周酣”节目组特别推荐。）

（原文地址：<http://blog.m1905.com/viewspace.php?uid=3639889&do=blog&id=694631>）

《走着瞧》： 王小波精神维度里的电影挣扎

文 / 马庆云

《走着瞧》这部电影是2009年与观众见面的影片，导演李大为，主演文章，讲的是知情马杰与两头驴的故事。这个故事根据王松的小说《双驴记》改编而成。王松是天津作协成员，文笔一般，而且故事写作素材受到体制的严重限制，无法有深刻的小说出来。《双驴记》算是王松比较不错的作品之一，但是，整体看来，电影《走着瞧》的精神维度超越了原著小说，算是艺术的再次创作上的一个成功案例。

小说《双驴记》和电影《走着瞧》讲了一个基本相同的故事：知青马杰成为生产大队的饲养员，失手打坏叫驴黑六的阳物，致其不能继续为社会主义配种，最终被杀，但马杰杀驴过程被黑六兄弟黑七亲眼目睹，至此，黑七怀恨在心，报复马杰，直至最终牲畜自焚要火烧马杰而终。故事中间，穿插了知情马杰与一个农村姑娘的做爱事件。



小说《双驴记》因为作家王松的屁股问题，而决定了他的嘴巴和文字，致使其不能很好地表现出知青背景下的公社生活和各色人物的精神维度，算是成功地捏造了一个故事架子，而没有成功地制造出好的骨肉的东西。而电影《走着瞧》则因为这个架构的“先天存在”，造成编剧们可以更加自由地按着艺术电影的风格加入知青精神维度的戏份，和加入更多的对公社生活的艺术性嘲讽。至此，电影正式走向另一个作协之外的极端，没有院线公映的悲惨命运。这部电影，只在北京的一家电影城展映了几天，然后于09年拿了几个奖项，成功地塑造出了一个导演新人，李大为。



文章电影处女作《走着瞧》

如果说《走着瞧》比《双驴记》成功的地方的话，应该在于，前者在后者的基础上加入了王小波小说中的知青情怀的精神维度，从而成功地为小说的主人公马杰捏造出了一个符合当下的思潮的性格特征——叛逆的隐忍。知青题材于当下再次火了一把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当年的知青，如今已经是社会资源的掌握者，有能力玩知青题材的艺术；另一个原因则是，当下的青年叛逆情怀与当初的知青叛逆情怀是相通的，因此，利于交流。

但是，仅仅玩弄“叛逆”还是不足以成为优秀电影的。这个作为张扬表象的“叛逆”必须要与作为“隐忍”的内心实体相互结合，方有力量与味道。这种结合方式的技巧，其实是王小波先生教给我们后人的。我们当下在小说的艺术创造中，也会玩“叛逆的隐忍”这个母题了，但是，永远不会超越王小波。为何无法超越，我的知识层次造成，我无法解释这一眼见的问题。

性、生殖器和放肆的交配与性交，是构成王小波艺术的主要元素。这些，在电影《走着瞧》里边被很好的运用了。电影中，叫驴因为可以配种，为社会主义配母驴，所以，比知青还要金贵，可以吃得上大伙吃不上鸡蛋；叫驴黑六也是因为被毁掉了生殖器而最终走向被杀的结局；大队长因为黑六的不能交配而苛责主人公马杰的无能；马杰与接他的村姑在树林里边野合最终被叫驴黑七出卖公布于众……这些，其实均是王小波所开创的“叛逆的隐忍”这个母题里边的“精神维度”。

电影则通过艺术的形式，把这一精神维度更加具有讽刺意味的表现出来，做到了超越原著的程度上来。对生产队集体化生活的讽刺、对生产队长教条化的嘲弄、对底层民众愚昧与可怜的动态描绘等等，都是原著小说所无法企及的。当然，这些再创作，都无法超越王小波的精神维度，相反，只是在这一维度里边苦苦挣扎。影片的编剧和导演深谙王小波艺术的真谛，也清楚观众审美良知中所谓的好电影是什么样子的，因此做出了有板有眼的艺术电影《走着瞧》来。

有影评说，《走着瞧》是魔幻现实主义的电影，这显然是不正确的。2011年10月份上映的《树先生》这部电影也被部分影评人称之为魔幻现实主义的作品。缺少中国农村底层生活经历的影评人固执地认为，影片中所描绘的一切是电影杜撰的，殊不知，所有的他们看到的魔幻，都是底层生活的最大真实。《走着瞧》最可称之为魔幻的地方算是叫驴黑七的自焚式报复。而这个场景，在我看来，于我所眼见的现实中，也是真实存在的。

影片基本上继承了王小波先生的精神维度，算是电影艺术上的一次苦痛挣扎。该片唯一值得诟病之处便是，影片为了情节继续往前发展，把与知青马杰野合被农民们发现的女孩子远嫁，这是毁掉了王小波艺术风格的地方，隐忍有余而叛逆不足了。不过整体来说，《走着瞧》算是一部上乘之作，值得一看。

（来源：友情合作媒体“电影一周酣”特别推荐）

（原文地址：<http://blog.ifeng.com/article/15756914.html>）

Photography

影像



1月14日晚，现任台湾地区“总统”、国民党主席马英九以超过50%的支持率，超过民进党蔡英文78万票，连任成功。马英九冒雨在演讲中，表示未来将重视分配、青年就业、生态保护及农渔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缩小贫富差距，“让台湾再创奇迹”。并感谢支持者：“我们赢了”。



1月7日，在英国首都伦敦，打扮成关塔那摩监狱囚犯的抗议者展示镣铐。新华社（高塔姆/摄）



1月10日，意大利首都罗马上万名民众举行集会，悼念本月初在抢劫案中丧命的华人父女，并要求杜绝暴力。凤凰网。



菲律宾棚户区遭强拆 居民与警察冲突。网易网。

由于全球核危机加剧，《原子科学家公报》(BAS) 期刊日前宣布，把世界末日钟提前1分钟，如此一来，末日钟指针距离象征末日的午夜仅剩5分钟，意味着地球又向世界末日危机迈进了一步。



2012年1月7日，印尼哥打莫巴古，数百市场小贩举行暴力抗议，反对当地政府将他们驱逐迁移到其他地方。凤凰网



12月14日，江西九江，小学生在—间破烂不堪的教室里上课。这所小学建在一栋60年代的建筑里面，由于经费短缺，年久失修，教室地面损坏严重。网易网。



1月4日，广州增城，五十余名环卫工聚集在此，称历年均发放的年终奖今年没了，向公司讨要说法。公司方面称，年终奖都已经平均到了每个月工资里。图为环卫工人的工资单。网易网。



王依萌，江西省瑞昌市码头镇梁公村，2012年刚满10岁。1岁时，母亲患癌症去世，一个月前，父亲又因胃出血去世，撇下她和比她大一岁、智障又残疾生活不能自理的哥哥。幼小的妹妹，精心照料着智障残疾哥哥，小兄妹相依为命。“爸妈不在了，最亲的人只有哥哥了，我要照顾好他！”小依萌说。（凤凰网）



1月1日，大量旅客聚集在西安火车站售票大厅外排队买票。



中国最大淡水湖不足丰水期面积二十分之一。
1月3日，江西都昌县印山附近拍摄的干涸的鄱阳湖湖床。受长江上游和周边来水持续减少的影响，我国最大淡水湖鄱阳湖的水位急剧下降。2日，鄱阳湖标志性水位站星子站水位跌破8米关口，鄱阳湖正式进入极枯水位期，湖区水体面积萎缩至不足200平方公里，不到丰水期面积的二十分之一。



1月8日，一张冠名为“浙江温岭大小领导骑自行车体察民情 9辆警车鸣笛开道”的照片在网络热传。 凤凰网。

星词榜

收录时下最新或旧时曾有的具有国情特色的词汇，普及词义，畅通交流



【**伤肺跑**】2012 年元旦，甘肃兰州污染指数 216，属于中度污染，但该市的万人长跑活动如期举行。这个被网民讽刺为“伤肺跑”。

【**曲线回家**】据《劳动报》报道，为了从北京回昆明，一个白领竟然先“借道”曼谷，然后再转机回家，全程的价格与直飞持平，而且顺利买到两段的机票。1 月 8 日春运开始，“曲线回家”这个词儿频频出现在购票的人群中。

【**转型陷阱**】清华大学社会学系 1 月 9 日发布 2011 年度“社会进步系列研究报告”，指出中国目前最需警惕的是“转型陷阱”。既得利益集团用“维稳”的理由拒绝改革、绑架改革，是“转型陷阱”的主要症状。在今天，体制改革已经陷入困境，可以说是个不争的事实。

【**机关幼儿园**】由政府直接负责财政支出的公立幼儿园。就读者大多家境较富裕和当地官员的孩子，有能力付得起相对来讲比较高昂的学费，因为具有“事业单位”属性，按照我国财政体制，每年可获上级一定额度的财政补贴，因此教学环境、条件等往往比大多数幼儿园优秀许多倍，很

多家长为了使孩子赢在起跑线上，往往不惜一切努力使孩子能够入读此类幼儿园，使之成为“拼爹、拼关系、拼钱”的竞技场。

【**搜索依赖症**】现时上网搜寻资料很方便，大陆最近有调查发现，近九成受访者承认患有“搜索依赖症”，一旦遇到问题不是先翻书或问人，而是上网搜寻，有 80 后青年更坦承，自己的生活已离不开搜寻引擎。

【**微博监管会**】北京市政协委员赵保乐建议，应当对微博用户进行信用分级，对颠倒黑白、散布不实信息等微博用户，要通过加“黑 V”予以惩罚。他还建议尽快在证监会、银监会的经验基础之上成立微博监管会，可由精神文明办牵头，下设具体群众组成的协会。要定期举办微博评选活动，建立“正气杯”评选活动。



漫画作者：变态辣椒。原文地址：<http://94yu.net/archives/1185>

【新闻自由指数】是“无国界记者”组织根据各国新闻自由状况，每年都编译出版大部分国家的排名情况。该名单根据问卷调查而来，调查对象来自世界各地，包括一百多位无国界记者及其伙伴组织的成员，还有相关的专家，比如研究员、法学家以及人权活动家。近日该组织发表了2011年的全球“新闻自由指数”，芬兰再度名列榜首。台湾位居第45位，比2010年上升了3位，香港则名列第54位，比前一年大跌了20位。中国大陆则在179个国家中名列174位，比2010年下跌了3位。排在中国之后的依次是伊朗、叙利亚、土库曼斯坦、朝鲜和榜末的厄立特里亚。

【全球清廉指数】由世界著名非政府组织“透明国际”建立的清廉指数排行榜。它反映的是全球各国商人、学者及风险分析人员对世界各国腐败状况的观察和感受。2011年全球廉洁指数前十位的地区及国家，大部分为欧洲国家，前三位依次是新西兰、丹麦及芬兰，有9.5及9.4分；新加坡排第5，获9.2分。中国获3.6分，排名第75，索马里和首次成为调查对象的朝鲜仅得1分垫底，被判为贪污最盛的国家。



漫画作者：邱萌。原稿地址：<http://photo.weibo.com/14986425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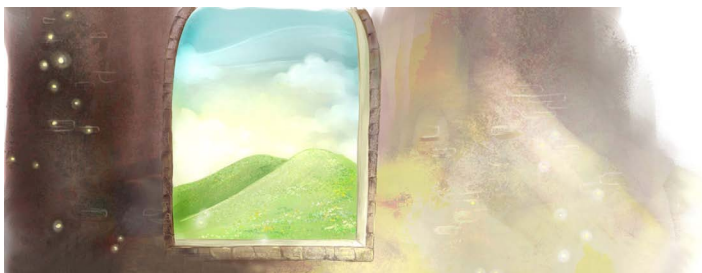
【和谐女神】广东两会，政协委员刘立平有一提案，建议面向全球艺术家招标，在连接香港、澳门和珠海的港珠澳大桥西端，塑建一尊和“自由女神像”一样高大的“和谐女神像”。永远矗立在中国东部沿海，预示着中国和谐社会的独特文化进一步繁荣壮大。

【维修性拆除】近日，位于北京市东城区的“梁林故居”（建筑大师梁思成、林徽因1931年至1937年间曾居于此）被违规拆除，媒体报道后引发社会各界高度关注，而官方调查称开发商此行属“维修性拆除”，“拆除”是为了“维修”，破坏文物变成了保护文物，官方无逻辑的推脱说辞再度引发舆论大哗。

【寻偶图书馆】雅加达有这样一家图书馆：图书馆里只有和爱情有关的书；读者必须是未婚男女；如果你不是非常令人讨厌一定会有异性坐到你身边。你可以在这里邂逅爱情——这就是著名的“寻偶图书馆”，配偶成功率65%以上，高于普通婚介所5倍。

【火箭市长】2004年1月，曾担任洪湖某小学教研室主任的胡纯玉直接晋升为洪湖市副市长。网友称是“火箭市长”。洪湖市委组织部人员回应：不是组织任命，是依法依规程序、人大选出来的。胡纯玉在副市长岗位连任两届，上个月任政协副主席。

【微博版权保护公约】搜狐微博30日发布《微博版权保护公约》，内容共8条，搜狐称认可并推动原创微博作者的内容版权，认为以微博形态呈现的原创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依法享有版权，在网络传播和传统出版渠道中，都不应该以各种方式损害其权益。



微小说

讲述微故事，记录微心情

王小童上学去，有位老奶奶在他前边走。刚下过雨路很滑，老奶奶摔倒了。小童赶快跑过去，把老奶奶扶起来，送她过马路。这时，一个过路的人问小童：“她是你的奶奶吗？”小童说：“不是。”“是你的姥姥吗？”“也不是。”“她是谁？”“我不认识她。”过路人伸出了大拇指：“你的胆子真大！”

宝钗说：“二爷觉得我骗了你，也罢，林妹妹不骗你？她的葬花吟全然中年人声气，正是她娘你亲姑的代笔。中年写那诗文乃是庸手，偏十五六的女儿写了，你就喜欢得不得了。倒是我心实，今晚洞房不找人捉刀，不然烛火一灭把我妈推给你……宝玉你怎么七孔流血了！袭人，快请王太医！”（拖尼熊）

舟子和韩寒对掐多日，未占便宜，反被群嘲。一怒之下潜心发明时间机器，回到90年代查探其作品何人代笔。舟子披上隐身衣，在韩家、学校、医院、书店等各处出入，发现彼时韩寒整天踢球，未写小说，毫无线索，只有快快返回。忽然觉得不对，一拍脑袋：“坏了，我把带去参考的韩寒作品集拉他家了！”（宝中堂）

问：外星人如果占领地球，美国有超人，日本有奥特曼，我们有什么？

答：我们有高铁侠和和谐女神。再加上草泥马，河蟹等神兽，以及城管护体，区区外星小儿能起多大风浪。抓起来一个个送上访办集体学习三个代表，八荣八耻。表现好的遣送回家，不好的一个个活埋。

问：为什么在南京枪击案发生五日后，警方仍在南京市内进行持械搜捕活动？

答：警方已经断定，在春运期间这孙子买不到逃离南京的车票。

刘备三顾茅庐，终于得见诸葛孔明，孔明一篇隆中对，令刘备如醍醐灌顶，不得不击节赞叹。刘备泣曰：恨不早见先生！只是先生隐居此间，怎么能对曹操、孙权及刘表等人形势如此熟悉呢？孔明大笑，附耳道：我悄悄关注了他。

儿子上小学，学校投票一般是用“正”字写在姓名后面计票，此为背景。终于儿子有天说，爸爸，我想改个名字叫X正正，这样每次投票，我就先有10票了。

他是官二代，父亲是军中大佬，兄长在西方企业工作，他的大学导师全国知名。天之骄子造就了他跋扈的性格，一次他在洗浴城与人争吵，先后杀死保安与闻讯赶来的老板儿子，还把想起诉的老板拦在法院门口毒打，社会舆论大哗，迫于压力被判处死刑，可没过多久却又堂而皇之地出现。他就是哪吒。

中国式家长。5岁：孩子，我给你报了少年宫。7岁：孩子，我给你报了奥数班。15岁：孩子，我给你报了重点中学。18岁：孩子，我给你报了高考突击班。23岁：孩子，我给你报了公务员。32岁：孩子，我给你报了《非诚勿扰》。

幼年看水浒，印象是奸官当道，民不聊生。可今天再看，感觉宋朝人真幸福：半残疾的武

大郎卖炊饼就可以养活潘金莲；不用顾忌城管突袭，军队军官打死个卖肉的郑屠还要亡命逃跑；监狱长的儿子被夺了酒店，要靠武松夺回；国防部长的官二代看上林冲媳妇，还需要骗林冲误入白虎堂那么费事。

台湾大选简直弱爆了，早上投票，晚上才知道结果。要是在“我们这儿”，明天投票，今晚结果就出来了……

一天 我们俩吵架了，吵得很凶，吵过之后又生气又伤心。一气之下把 QQ 签名改了：傻子 TMD 才相信天长地久。没过几分钟我就看见他的签名也改了：我 TMD 是那个傻子

她伤感地对朋友说：“我和老公吵架了，他冲我大吼，让我带上东西滚。我用袋子把老公装进去，哭着说你是属于我的。”“真感人，

然后呢？”朋友问。她答：“然后我装了四袋才把他装完。”

村里有个孤儿叫 Nasa，经常奔跑高呼“不好啦，外星人要来啦！”尽管村里连根外星人的毛都没出现过。乐此不疲的 Nasa 有个秘密，他是个超能力战士，每次外星人来袭都被他击溃了，次数多到数不清。而看到 Nasa 就会生气的村民们，其实也有个秘密，就是周末夜里，套上麻袋，扮外星人陪 Nasa 玩。

有个女生，爱上个男生，心甘情愿嫁给了他。没新房，就拿学生宿舍做婚居。没家具，就买二手货。没沙发，捡两个废轮胎冒充。女孩的姐姐在他们新婚时送了两床薄被，他们整整盖了 34 年。实际上这时男生已出人头地，可嫁了他的女生，出门还得挤公共汽车……这个女生叫周美青，嫁的男生叫马英九

（以上内容均取自网络）

“异端！去死吧！”

谭昊 / 文

一个人走过十字路口，看见另一个人想撞车自杀。他走上前去劝说：“亲，不要想不开！”

那人问道：“为什么？”

他说：“生活是充满希望的嘛！你是自干五还是带路党？”

那人答：“我是自干五。”

“太好了！我也是自干五。你是进步社，化学会，还是 SCer？”

“SCer。”

“太巧了！我也是 SCer。你是北音速的还是南朝的？”

“北音速。”

“我也是北音速的呢！你是七字党还是阉

党？”

“七字党。”

“太好啦！我也是。你是多炮塔神教还是 RPG 教？”

“多炮塔神教。”

“真是太奇妙啦！我也是。那你是挂路灯派还是挂电线杆派的？”

“路灯派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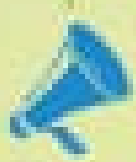
“我也更喜欢路灯。吃豆腐脑放甜的还是放卤的？”

“豆腐脑当然是要吃甜的。”

那人朝他屁股一脚把他踢进车流里：“异端！去死吧！”

众言堂

公共事件的言论场 观点碰撞的小平台



（本期话题：关于“梁效”）

袁依 / 整理

“梁效”的前身是1973年10月拼凑起来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批林批孔研究小组”，由当时的军宣队负责人迟群、谢静宜主持。1974年3月，人员调整后，改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它是江青直接控制、指挥的写作班子，设在北京大学朗润园湖畔的一座幽雅的小楼里。前后有数十人参加，多时保持在30人左右。这些“秀才们”根据钓鱼台的指令，炮制了200多篇文章，其中有30余篇“重点文章”，成了当时的“学习文件”。他们的文章，在《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上连续发表。当时绝大多数人都知道文章的来头，反对他们的文章也会被视为“反动行为”而遭遇打击。江青曾得意洋洋地对迟群、谢静宜二人说：“你们都是我的排炮。”而他们自己也以此为荣。江青把“梁效”叫作“我的班子”，而迟群也曾表示：“班子要对我负责，我对江青负责。”写作班子里的成员也声称，他们是在江青的“亲切关怀和指导下一步一步成长起来的”。

【话题】“文革”后期，冯友兰、魏建功、林庚、周一良四名教授进江青组织的“梁效”写作班子，舒芜作《四皓新咏》：“一、贞元三策记当年，又见西宫侍讲道。莫信批儒反戈击，栖栖南子是心传。二、诗人盲目尔盲心，白首终惭鲁迅箴，一卷离骚进天后，翻成一曲雨铃霖。三、射影含沙骂孔丘，谤书箠钥护奸谋，先生熟读隋唐史，本纪何曾记武周？四、进讲唐诗侍黛螺，北京重唱老情歌，义山未脱捋扯厄，拉入申韩更奈何！”

梁泽：舒芜和聂绀弩那段恩怨我至今都不敢判断，我总是离那段历史远远的，“男儿脸刻黄金印，一笑身轻白虎堂”，怪洒脱，可是“哀莫大于心不死，无多幻想要全删”，我几乎读哭。

胡翔：没办法，那个时代是那样子的，我们没必要这样去苛求前人，想想如果是我们自己，又会怎样？对于冯先生的功过是非绝对不能简单地评价，我们更看重他在哲学研究上的重要贡献，而且对于冯先生的人格我们绝对不可怀疑，冯先生面对一些对自己的

指责，说过一句话，你们去问那个时代……

梁泽：舒芜在此冷嘲热讽四人，但后来对聂绀弩落井下石，不一样让人垢病吗？梁效成了很多人的魔窟，像陈寅恪那样得以自全的有几个？中国知识分子还真是被玩弄的命。

崔迅铭：“但是，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主要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没有学好毛主席思想，没有用毛主席思想来武装自己，所以阶级观点有的时候很模

糊……”老一辈学者有这等句子的颇不在少数，读之几欲落泪。不知各位先生这样大义凌然的糟践自己究竟是出乎本心还是形式所迫。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实在是可悲之极。

袁依：“老一辈学者有这等句子的颇不在少数，读之几欲落泪。”迅铭兄果然是性情中人。一直以来感觉你的骨子里仍葆有五四的遗存血液，表现在你的文字里便是带着一种自主批判而又不过激的担当意识，颇有学人之独立风范。我也一直在想，没有五四精神的时代也正是呼唤五四精神的时代，希望我们能共同担当。

董勇：郭沫若的不幸在于他被党树立成了“正面典型”，他固然是受害者，但是相比之下，他较马寅初等少了一些正气与骨气，不敢讲真话，明哲保身，所谓“识实务者为俊杰”，郭沫若即止步于此。那首诗“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土时。若是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说的太好了。

郭兆臣：为了理想壮烈的死去其实并不难，难的是为了理想卑微的活着。

李浴洋：在大陆同样可以有成果啊，陈寅恪不就是个例子吗，呵呵。在台湾主要是心情也未必好，很多去台的学者不也是成就平平吗。对大陆和对台湾来说，其实都一样，都经过了一个天地玄黄的阶段，自然有的人适应，有的人要被淘汰，跟具体在哪里其实没有太大关系，主要能时势能否造英雄了。饶宗颐在大陆同样可以有这样的成就，因为他的领域基本跟现实不发生关系，季羨林不就是个例子吗。除去89年以后的事情不说，季羨林不是取得了很高的专业成就吗。社科院里有很多老先生，搞语言，搞考古，成就都非常高。

张洪涛：梁效、康梁皆以顶尖学者、文化大师、思想英雄之身份，辅佐时代领袖，欲开旧邦新命之时代新政治格局、新文化风尚。惜光绪以其式微，百日即败，毛氏乘其望重，道行十载。梁效、康梁皆以寄生阶级、敝旧世风、权贵官僚为寇仇，联合民间士子，欲除祖宗旧法之陈年大吏治积弊、大文明死角。惜光绪以其仁厚，不敌旧党，毛氏以其慈悲，遗贼为患。梁效、康梁皆以结党乱政、隐图煽惑、迫害朝臣之罪名，连同晚生后学，备受复辟势力之经年恒出入其罪、恒迫害有加。惜光绪以其羸弱，饮恨夭

折，毛氏以其老迈，抱憾归天。梁效、康梁皆以辨证古人、反思时代、正本清源为正途，启蒙民众百姓，并彰官民伦理之陆沉老民权火种、老民主范式。惜光绪以其时限，未忍深察，毛氏以其高致，惟传心法。梁效、康梁皆以历史视野、世界眼光、天下大势之理据，倡导内外兼修，实继往圣绝学之道统成大化流行、成翕辟之变。惟光绪以其时艰，西风东渐，毛氏以其远瞩，东学西传。因文称誉者，以其章法显正、秉笔直书也。以笔致祸者，因其讪谤权贵、著文行世也。

袁依：关于“梁效”，有人说是文革种下的毒瘤，有人说是经世之学的登峰造极，有人觉得应该具有一种对于历史的“了解之同情”，有人觉得对这些败坏气节士风的读书败类应当“一个也不宽恕”。这其实不关乎“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只能权作“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来看待。以今人的眼光悬想陈年往事，特别是陈年的大事件大团体，以及大团体中的这些大人物，我们将永远无法仅凭着眼耳之见偷窥到历史的真实面目。但我们又实在不忍心顺从“无可无不可”的虚无主义态度，我们注定要立足于自我的理性经验，去判断历史进程之中的那些“已然”。任何历史的内部都自发地具备一股莫名的张力，它逼迫着我们正视其间“道貌岸然”似的律令以及四分五裂的客观形态，我们无从逃避，注定要承受这生而为历史囚笼中的个体之间的苦痛共鸣——而在试图逃避历史的同时，也往往意味着将要首先掏空我们自己。



梁效写作班子作品

谢谢阅读

听话并不是一个孩子必须具备的品质，独立思考才是。

